

中国共产党台前县历史

第一卷

(1932. 7~1949.9)

台前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中共台前县委党史研究室

本页环衬

本页为内二封
背面为版权页

编审委员会

- 顾 问 张悦华 （县委书记）
贾祖贫 （县委副书记 县长）
- 主 任 樊相奇 （县委副书记 县政协主席）
- 副主任 王孟合 （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
常仲吾 （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
祁炳杰 （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
杨素青 （县委常委 办公室主任）
梁浩国 （县委常委 副县长）
- 主 编 岳耀喜
- 副主编 丁同勇
- 校 对
- 编 务 段瑞生 周长华 谷松巧 徐柱玲
黄庆福 崔凌霄 赵红燕

谨以此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献礼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地了解过去、全面地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要注重总结和发扬我们党在革命时期保持先进性的历史经验,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和认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全面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扎实做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各项工作,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记“两个务必”,切实把党的先进性体现到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各项工作中去。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 2006 年 7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本页为台前县政区图

本页（一下四页）为历史图片

- 1、解放寿张县城照片
- 2、刘邓大军在孙口渡口云集待命强度黄河
- 3、华东野战军西兵团某部有孙口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
- 4、台前人民迎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渡过黄河南征
- 5、黄河司令部机关军政干部合影
- 6、台前民工在支前途中（2张）
- 7、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
- 8、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纪念牌
- 9、

序

值此改革开放暨台前建县 30 周年之际，县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台前县历史》（一卷）即将付梓，这是我县党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成果。该书的出版发行，将为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提供一部开展党史教育的好教材。为此，我们谨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为该书编写出版付出艰辛劳动的党史研究工作者，以及热情支持本书编写的老领导、老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国共产党台前县历史》（一卷）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党在台前的历史发展为主体，以贯彻落实党在 1932 年 7 月至 1949 年 9 月期间的路线方针政策 and 领导台前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活动为基本内容，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台前人民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进行抗日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奋斗足迹和光辉历程，反映了台前儿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解放而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总结了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建设台前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台前境内开始活动起，就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已任，领导台前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台前人民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减租减息，组织抗日武装，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成为台前全民抵抗外侮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台前人民掀

起了大规模的参军支前运动，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动人诗篇。17年风雨历程，17年波澜壮阔，期间，有成功，有经验，有失误，也有教训。我们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就是要科学地总结过去，充满信心地面向未来。

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视党史工作的优良传统。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对研究党史工作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邓小平**指出：“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江泽民**多次强调学习党史的重大意义和党史工作的重要性，他说：“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历史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胡锦涛**总书记始终把党史工作放到全党工作的一个重要位置，他多次对党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赋予党史工作“以史鉴今，以史育人”、“围绕大局，多出成果”等重要职责。他强调：“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党史工作和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并把它视为关系党的巩固、发展和人民事业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台前县历史》这部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台前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必将助于我们在今

天建设和谐台前的进程中少走弯路、少受挫折。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编纂《中国共产党台前县历史》(一卷),缅怀那些为解放台前这块热土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其他革命先辈,追思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就要学习和弘扬他们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学习和继承他们为真理和理想不惜牺牲生命的大无畏献身精神;学习和继承他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学习和继承他们立足实际、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精神。希望全县各级党组织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认真通读学习这本书,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创造性地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业传承下去,为建设一个更加文明、富裕、和谐的新台前再创辉煌。

中共台前县委书记

台前县人民政府县长

2008年11月 日

编辑说明

一、《中国共产党台前县历史》（第一卷）坚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为指导，以时间为序，以大事为重点，以事实为依据，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力求如实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台前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奋斗历程和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以及此期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

二、编写本书的目的是试图通过比较系统、全面、丰富而翔实的资料，揭示台前作为革命老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干部提供一部较为生动实际的历史教材，为深入开展群众性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服务，为新时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加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服务。

三、台前于 1978 年正式建县，历史上隶属多变。本书记载的内容，实际上是 1932 年 7 月至 1949 年 9 月期间，台前绝大部分区域隶属寿张县和张秋县（1941 年 6 月，寿张县 3 区即今台前吴坝、夹河、打渔陈一带划入，至 1947 年 6 月张秋县撤销复归）相关的革命历史。在记述中，以台前现在的辖区为主，涉及县域以外的事实，尽量简略记述。书中多用“台前境”、“台前一带”等笼统名称表述，其本义即今台前县。

四、本书上迄五四运动，下至 1949 年 12 月，基本上按历史发

展阶段记述。

五、本书编写采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和原县委党史研究室历经 20 余年艰辛收集而来的有关档案资料、老班干部回忆文章、调访笔录，以及《中共台前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台前县志》、《中国共产党台前县历史大事记》等，还吸收了一批党史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成果等。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第一章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 | |
| 在台前一带的活动（1932.7~1937.7）..... | 4 |
| 第一节 台前一带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党组织的 | |
| 政治思想条件和社会基础..... | 5 |
| 第二节 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 8 |
| 第二章 抗日战争初期党的主要工作（1937.7~1939.2）..... | 20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初期寿张一带的形势..... | 21 |
| 第二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 | 25 |
| 第三节 寿张县抗日县政权首次创建与被扼杀的经过..... | 33 |
| 第四节 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和中共寿张县工委的建立..... | 41 |
| 第五节 组建抗日武装，建立群众抗日团体..... | 42 |
| 第三章 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 创建发展 | |
| 抗日根据地（1939.3~1941.5）..... | 45 |
| 第一节 聊城失守后寿张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 | 45 |
| 第二节 日军三次占领寿张城..... | 48 |
| 第三节 寿张沦陷后的局势..... | 50 |
| 第四节 日伪侵占寿张初期的野蛮统治..... | 51 |
| 第五节 县、区委和县、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 | 54 |
| 第六节 创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 | 58 |

| | | |
|-------------|--|-----------|
| 第七节 | 党组织的发展、整顿和巩固..... | 60 |
| 第八节 | 组建抗日武装..... | 63 |
| 第九节 | 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 65 |
| 第十节 | 实行合理负担，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 68 |
| 第十一节 | 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日、伪、顽..... | 70 |
| 第十二节 | 抗日战争初期城区内党的地下工作..... | 77 |
| 第十三节 |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工作..... | 79 |
| 第四章 | 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抗日战争（1941.5~1944.1）..... | 83 |
| 第一节 | 寿张县抗战困难局面的形成..... | 84 |
| 第二节 | 日军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 86 |
| 第三节 | 相持阶段的对敌斗争..... | 89 |
| 第四节 | 改造地形，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 93 |
| 第五节 | 实行民兵联防，粉碎日军的“蚕食”和进攻..... | 94 |
| 第六节 | 打击叛徒刘怀良、武朝秀及其他伪顽..... | 96 |
| 第七节 | 突破日伪“九·二七”铁壁合围..... | 98 |
| 第八节 | 粉碎日军“十·十二”大扫荡..... | 104 |
| 第九节 | 进行武装斗争 努力扭转被动局面..... | 106 |
| 第十节 | 武工队的建立及其活动..... | 110 |
| 第十一节 | 建立敌工部，分化瓦解日伪军..... | 115 |
| 第十二节 | 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以减租减息 为中心的民主民生运动..... | 118 |

| | | |
|------------|--|------------|
| 第十三节 | 建立健全群众组织，开展参军运动和 拥军优属活动..... | 126 |
| 第十四节 | 军民团结一致，战胜严重灾荒..... | 128 |
| 第十五节 | 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的建设..... | 136 |
| 第十六节 | 实行精兵简政和改造村级政权..... | 143 |
| 第十七节 | 发展宣传文化教育事业..... | 145 |
| 第十八节 | 深入开展敌占区对敌斗争..... | 149 |
| 第十九节 | 大力加强交通联络工作..... | 153 |
| 第五章 | 扩大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1944、1~1945.8）..... | 156 |
| 第一节 | 寿张地区的形势和任务..... | 156 |
| 第二节 | 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 159 |
| 第三节 | 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经验..... | 166 |
| 第六章 | 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1945.9~1946.6）..... | 170 |
| 第一节 |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党组织面临的任务..... | 170 |
| 第二节 | 进行反奸诉苦，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 173 |
| 第三节 | 积极发展县、区地方武装..... | 176 |
| 第四节 | 大力做好支前和拥军优属工作..... | 177 |
| 第五节 | 加强政权建设，清除匪特武装..... | 179 |
| 第六节 | 大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 183 |
| 第七章 | 全面加强解放区建设，支援人民解放军 进行内线和外线作战（1946、7~1947.6）..... | 185 |

| | | |
|------------|--|------------|
| 第一节 | 全面内战爆发后寿张的形势和任务..... | 185 |
| 第二节 | 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 188 |
| 第三节 | 开展扩军运动,充实壮大主力部队..... | 192 |
| 第四节 | 解放战争初期的支前活动..... | 196 |
| 第五节 | 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经济工作..... | 200 |
| 第六节 | 依靠群众 镇压还乡团..... | 202 |
| 第七节 | 大力做好情报和交通联络工作..... | 204 |
| 第八节 | 黄河归故斗争与人民复堤自救..... | 205 |
| 第九节 | 加强河防斗争..... | 210 |
| 第十节 | 黄河司令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 213 |
| 第十一节 | 为刘邓大军过河造船抢造渡船..... | 219 |
| 第八章 | 全力支援战略进攻,迎接全国解放(1947.6~1949.9) .. | 222 |
| 第一节 | 支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 222 |
| 第二节 | 支援鲁西南战役和华东野战军..... | 231 |
| 第三节 | 开展土改复查运动..... | 233 |
| 第四节 | 开展整党运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 236 |
| 第五节 | 支援淮海战役..... | 242 |
| 第六节 | 组织干部南下..... | 245 |
| 第七节 | 抢建黄河浮桥,迎送四野南征..... | 248 |
| 第八节 | 设立兵站,救护伤员..... | 251 |
| 第九节 | 开展参军归队运动..... | 252 |
| 第十节 | 大力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 254 |

| | | |
|------|----------------------|-----|
| 第十一节 | 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 | 257 |
| 第十二节 | 台前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巨大贡献..... | 260 |
| 后记 | | |

前 言

台前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黄河、金堤河汇流的三角地带，历史上曾是连接冀鲁豫交通枢纽，为历代军事战略重地。台前人民为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不畏强暴，英勇抗争。境内先后发生过东汉黄巾起义、明末榆园军起义、清代“红头军”起义和王伦、林哲领导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权，留下了一幅幅悲壮的斗争画面。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开启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中国随即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动荡局面。台前境内，土匪猖獗，反动政权实行黑暗统治，封建租税沉重，加之，旱涝蝗灾和黄河决口灾害频仍，广大群众深受其害，普遍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反剥削、反压迫斗争此起彼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1919年5月，以北京学生为先导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在全国蔓延，并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马列主义和民主科学的思想逐渐传播到台前一带，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受此影响，开始自觉地承担起唤醒民众的责任。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己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台前境内的革命面

貌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在台前一带的活动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由甘草固堆和寿张八乡师两个地方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展。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台前境内的吴坝、夹河、清河、侯庙及县城附近皆有了共产党组织，他们在不断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的同时，发动群众同反动当局和地主阶级展开斗争，并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台前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台前境为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抗日中心区“濮范观”边缘地带、对日本侵略军斗争的前沿，南、北、东三面先后被日军侵占，革命斗争极其残酷。台前境内的抗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9年8月~1941年5月，是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从1941年5月~1943年6月，是根据地斗争最艰苦的阶段，主要是面对敌人经济上的严密封锁、军事上的疯狂扫荡、政治上的残酷统治，开展了反“蚕食”和反“治安强化运动”；第三阶段，从1943年6月~1944年12月，是收复敌占区，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扩大根据地，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阶段。其间，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台前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诗。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从实际出发，灵活地把党的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具体实践相结合，致力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面对困难与挫折，他们不屈不挠，发

动群众，依靠广大群众，与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用坚强的革命意志构筑起共产党人不朽的丰碑，成为台前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台前县境始终为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台前人民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大力发展生产，加强政权建设，整顿基层武装。同时，积极响应冀鲁豫区党委的号召，掀起全民性的参军支前高潮。党领导台前人民全力支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天险，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又支援 30 多万华东野战军过黄河转战，运送 50 多万东北人民解放军南征，并组织 110 名干部分三批南下支援解放区政权建设。台前人民先后出动 11463 副担架救伤员，出动大车 13640 辆送军粮，62000 名支前民工跟随部队转战鲁西南、陇海铁路和淮海战场，行程数千里；输送青壮年 8000 余人参军参战，其中 1000 余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台前人民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革命历史风云激荡，可歌可泣；千秋伟业光明灿烂，当载史册。《中国共产党台前县历史》（第一卷）全面、真实、客观地记述了台前县境自有党的活动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台前人民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它是各级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是党领导人民群众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开展抗日民族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赢得胜利的历程。这段辉煌的革命历史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

能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一章 抗日战争爆发前, 中国共产党

地方党组织在台前一带的活动

(1932. 7~1937. 7)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消息，在全国各大城市和一大批中小城市陆续传播。在此期间，也传到了台前一带的知识界。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出了解放的正确道路，也使台前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此后，台前一带一批具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率先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台前一带的活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1934年秋，中共鲁西党组织负责人赵健民主持成立了中共省立寿张第八乡村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八乡师）党支部，这是台前一带知识界成立的最早的党支部；1936年秋，中共直南特委负责人刘晏春主持成立了中共甘草固堆党支部，这是台前境内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他们在台前一带的早期活动开始便呈燎原之势。这些共产党人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在白色恐怖下，不顾个人安危，在秘密发展壮大队伍的同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带领群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官僚腐败政府的斗争，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台前一带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干部条件，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一节 台前一带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党组织的 政治思想条件和社会基础

台前县于197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建县。它位于濮阳市东北部，黄河、金堤河汇流的三角地带，地型呈犀角形伸入山东。东、南分别与山东省东平县、梁山县、郓城县隔黄河相望，北依金堤与山东省阳谷县接壤，西与范县毗邻。总面积393.97平方公里。现辖城关、侯庙两镇和吴坝、夹河、打渔陈、孙口、马楼、后方、清水河七个乡，共有370个行政村，总人口35万人。台前县境绝大部分区域，历史上隶属山东省寿张县，直至1964年寿张县撤消，划归范县。其间，1941年6月，寿张3区即吴坝、夹河、打渔陈一带，划归张秋县，1947年6月张秋县撤销，上述地区复归寿张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台前境内共产党的活动，主要是在寿张县委、张秋县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一、中共党组织建立的政治思想条件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爆发，同样激励了寿张境内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投身于工农运动实践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理论与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并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在思想上和组织上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寿张境内的进步人士，尤其是进步师生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5月下旬，聊城的爱国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并派学生代表王风级、胡学羈等到寿张境内开展爱国运动。他们在县城旧书院内召集商民、学生等四五百人，进行演讲，号召以实际行动反对卖国贼，拒绝对德和约，废除与日本订立的卖国二十一条，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取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项权利；同时揭发北洋军阀政府对外媚外，对内袒护卖国贼、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丑恶行径。当时，群情激昂，纷纷咒骂日本政府和卖国贼，尤其是学生更加气愤，县政府未敢阻止。此后，境内的学生和知识界、商界越来越关注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并纷纷以实际行动给予支持和声援。

农历六月初，聊城二中、三师学生十人救国团派学生宋汝敬、赵金璞、崔士诚、蔡润堂等到寿张县发动爱国运动，在县城内示威游行，散发传单，贴标语，呼口号。在县城西关大会上（六月古会），救国团的学生利用说书的场地进行演讲，宣传抗日救国，揭发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人丧权辱国的罪行，并讲了高丽（朝鲜）亡国的惨痛教训，号召抵制日货。他们义正严词，声色俱厉，听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从此，抵制日货、销毁日货的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展开。

“五四”运动，使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各大城市和一大批中小城市陆续得到传播，也传到了台前及周边地区的知识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6月，寿张县境一些学校

里，如寿张八乡师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讲课，唱进步歌曲，演进步戏剧，办墙报和组织读书会、教员联席会、共产主义青年小组等形式，宣传爱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这些学校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舆论阵地。

马克思主义在台前一带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在寿张县境内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提供了政治思想条件。

二、中共党组织建立的社会基础

1920年到1936年间，台前境内旱涝、蝗灾频繁发生，黄河多次决口，军阀混战，战火不断，土匪猖獗，再加上租税重，利息高，城乡广大劳动人民普遍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富有斗争精神的广大人民，为了自身的生存，强烈要求翻身解放，纷纷进行反抗。

1922年，寿张在军阀县知事罗天民的统治下，大小官吏贪污成风。粮房污吏孟宪龄、刘世英等吞食地方款一万余元，被群众查出，但他不倒出脏款，引起群众怨怒沸腾，抗粮不纳。刘、孟慑于群众威力，被迫倒出脏款四千元，在县城内唱大戏四天，向群众道歉。是年，县境黄河北地主武装团总张行珍胡作非为，私立公堂，压榨群众，罪恶滔天，激起群众的反抗。当地进步人士孙之华、彭振怀等发动群众四五百人，在城内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打倒欺压人民群众的恶霸团总！”、“打倒恶霸张行珍！”要求政府取消其团总职务，终于取得了胜利。

1928年，国民党派来县长孟仲璞，开始接管寿张县，并成立县党部。孟仲璞私征地方款8000元，在离任时吞没，被地方人查明。当时，开明绅士闫万铸、赵明泉、闫学堂等发动群众集合在县府标帐，经新任县长尚焕章调解，迫使孟仲璞倒出脏款3000元，交地方款内开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攻东北，炮轰沈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仅三个月时间，东北三省沦陷，三千万同胞落入魔手。寿张境内的市民和学生得知后，开大会，贴标语，发传单，举行游行示威，反抗日军的暴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台前人民先后掀起的反捐税、反饥饿、反压迫和反对日军侵略、反对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等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第二节 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台前一带的建党工作，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和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状况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最初的建党工作由西南甘草固堆和县城寿张八乡师两个地方开始，甘草固堆一带党的活动隶属中共直南特委，县城附近的党的活动隶属鲁西北党组织。二是国民党在台前一带的统治力量，县城相对强，其它地方较弱，党的活动基本没有遭受大的挫折，党组织的发展较为顺利。

一、中共寿张省立第八乡村师范支部

1、建党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思想指导下，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1930年后，临寿张县的阳谷县、冠县、清丰县、南乐县和濮县等地都有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而寿张境内还是个空白。寿张境内的建党活动是从寿张八乡师开始的。1931年，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在寿张筹建省立寿张第八乡村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八乡师）它是鲁西一带的最高学府。

1932年7月，八乡师开始招生，一些进步青年入校学习，第一届学生沙延孝在家乡由济南一乡师冠县籍学生共产党员赵健民发展入党，把党的关系转到八乡师，成为寿张县城一带最早的共产党员，从此，沙延孝受中共鲁西北党组织指示，开始在八乡师学生中发展党员。1933年先后发展段延明（段斌三）、冯干才、王福昌、时玉泉张仪亭等20多名共产党员。同时，建立党的组织，沙延孝、段延明为负责人。是年冬，针对“九一八”事变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八乡师党组织积极组织学生在校内外开展抗日宣传，秘密传播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唤起广大群众投入抗日战争。台前人民的抗日烽火开始由八乡师点燃起来。

八乡师的建党活动同党领导的全校学生读进步书刊活动是紧密结合的。他们一方面与学校当局的限制和阻挠作斗争，一方面大力发动和组织学生读进步报刊杂志，宣传中共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启发

诱导同学们不要读死书、死读书，要关心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抗日救国的大事。一批进步青年入校后，通过阅读革命书籍，开始接触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

1934年3月3日，杨耕心、盛北光在阳谷建立安乐镇临时中心支部，领导寿张、阳谷、东阿等县的党组织，杨耕心任支部书记。

1934年6月，冯干才（党内化名马英哲）介绍本班同学冯月秀（冯子华，莘县人）、路绍禹（戈力，东阿人）、张汝霖（张向善）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月，时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的赵健民首次到寿张检查指导工作，住在寿张城内西大街路南的民生饭店，约见一些党员，对他们进行了考察教育和布置工作，主持成立了中共寿张八乡师党支部，书记沙延孝，后由段延明、王福昌继任，时有党员十多人。是年冬，冯干才又介绍二年级一班的王宪武（王维群，冠县人）、司银章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4月，冯干才、王福昌介绍一年级的孙怀清（东阿县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冯干才介绍三年级一班的高清远（梁山县人）、二班的时玉泉（冠县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冯干才介绍刘懿祥（菏泽县人）、王汉雨（东平县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段延明先后介绍訾修林（阳谷县人）等五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二年级一班的司银章（阳谷县人）发展本班同学张道昌（阳谷县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四年级同学谷传增入党。

八乡师党支部在学生中发展的党员还有高孝风、王增秀（王毓亭，

鄆城人)、秦观海等。寿张八乡师党支部将党员多的班编一个党小组，党员少的班合编一个党小组。到 1936 年底，八乡师八个班有六个班建立了党小组，共有党员 37 名。

1936 年春，八乡师党支部为了团结教育学生中的进步同情分子，还成立了读书会，由当时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的高清远负责。党组织在领导同学们的读书活动中又发展了一批党员，提高了绝大多数同学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觉悟。

2、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八乡师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经常得到上级党组织的关怀和指导。自 1933 年 7 月山东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和中央失掉联系，中共山东省委政治交通员赵健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独立地继续进行党的工作，在全省到处寻找党员，以建立联系，恢复组织。1934 年 6 月主持建立了中共寿张八乡师党支部。是年秋末，八乡师党支部与阳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杨耕心介绍王伯瑾（后化名朱涛）入党，并一同到寿张与八乡师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年底，中共鲁西总支部委员会负责人申云浦离开聊城师范，到阳谷教书，领导寿张、阳谷、聊城一带党的活动。

1935 年 2 月 4 日，在堂邑县城徐运北的家中，利用春节会友之际，赵健民主持成立了中共鲁西特委，徐运北任特委书记，申云浦任宣传部长，钱洪勋任组织部长，领导寿张、阳谷、聊城、堂邑、冠县、博平、东阿等县党的工作。中共直南特委负责人刘晏春参加了这次会议，段延明代表八乡师党组织参加这次会议，八乡师党组织始归中共

鲁西特委领导。

1935年初夏，刘晏春到寿张检查工作。1935年秋，赵健民自濮县寻找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返回济南途中至寿张，住在县城北关路西的一个小店里，约见了八乡师支部委员，介绍自己去濮县找上级党组织的情况，并对八乡师党组织作了重要指示。是年冬，赵健民再赴濮县途中，在县城北关路西小店住下，黄昏后，约王福昌、沙延孝、冯干才等八乡师党支部委员于县城西北金堤南侧一树林子里开会。王福昌等人汇报了八乡师党支部建党情况，。此时，该支部的党、团员已达到30多人，各班都建立了党、团小组。赵健民介绍了国内抗日斗争的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政策，以及自己寻找上级党的情况。他要求八乡师党支部继续领导同学们多读马列主义的书，多看报纸，多讨论形势时局的发展；要严密党的组织，为迎接全国抗日救国高潮作好准备。次日，赵健民从寿张起程西去濮县，在濮县徐庄找到直南特委负责人黎玉，同上级党组织联系上了。从此，和中央失去联系达三年之久的山东党组织，又重新回到了中央的怀抱。赵健民在返回济南途中，赶到寿张县城，再次约见王福昌、冯干才、时玉泉、刘懿祥等人，介绍了自己找到上级党组织的情况，并指出：现在党的中心任务是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共同抗日，我们思想上要有一个转变，一切拥护抗日的人都要联合；要好好注意形势的发展，积极地发展学生抗日救国组织。

1936年春，赵健民、刘晏春到寿张县城约见王福昌、冯干才、时玉泉、高清远等人，赵健民先讲了形势和任务，刘宴春说要在寿张

建立寿张县委地下党组织，要求八乡师的党员暑寒假期间在家乡发展贫农入党。根据工作需要，过了数天以后，八乡师党支部进行了改选。王福昌任支部书记，时玉泉任组织委员，高清远任宣传委员，冯干才负责同上级联络。

1936年4月，黎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委托，到山东重建省委和恢复各地的党组织。黎玉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兼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赵健民为组织部长。在省委成立的大会上，黎玉说明了重建山东省委的重大意义，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坚决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一切抗日爱国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展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壮大抗日救国运动的力量；接受过去省委遭到破坏的教训，积极谨慎地恢复那些与党失去联系的县委、支部和党员的组织关系，反对关门主义，注意发展新党员；巩固党和进步群众团体的关系，防止敌人破坏。

1936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工作需要，选调人员，建立印刷机关和交通系统。寿张八乡师党支部学生党员刘懿祥担任刻印工作。是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原冀鲁豫边区（又称直南）特委所属的濮范一带的党组织与鲁西党组织统一建立鲁西北特委，隶属中共山东省委，辖寿张、阳谷等12个县。1937年5月，中共鲁西北特委分为鲁西南特委（又称鲁西）和鲁西北特委，刘晏春任鲁西南特委书记，寿张、阳谷隶属鲁西南特委。

3、在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中，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八乡师建党之际，正是国际和国内政治动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

侵占我东北三省和热河省，并图谋侵占华北，亡我中华。值民族危难之际，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屈膝退让，同日本签订了三个卖国的协定，对内疯狂进行“剿共”内战，镇压抗日活动，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积极号召国民奋起抗日，拯救华北，拯救中国，针锋相对地批驳和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八乡师党支部积极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组织发动党员进步学生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开展针锋相对地斗争

八乡师刚建校时，学校当局不仅招来一批反共的教职员工，招生时还特意从其他学校带来一批政治倾向国民党的学生，校方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反动体系，并在地方关系上结成乡党帮派，以对付进步势力。八乡师校长王冠英、教导主任高秉然、训育主任田漱芳是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的亲信，国文教员刘见高（刘培誉）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他们对学生实行愚民教育、施压政策。校方每星期搞纪念周，对学生灌输反动思想，严禁学生阅读进步书籍，不得人心，激起同学们的气愤。同学们把国民党的国歌改为：“杀民主义，吾党所宗；帝国主义，惟命是从……”

针对学校当局的反动行为，八乡师党组织根据当时特定的环境采取了比较隐蔽而又灵活的斗争策略，和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他们以党员为核心，通过建立一些灰色组织作为掩护，如“文学研究会”、“学生会”、“读书会”、“讲演会”、“同乡学术讨论会”等，传阅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学生的革命觉悟和民族意识，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引导发动学生同学校当局作斗争。

1935年4月，八乡师党支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进步青年，走上街头演讲，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号召人们抵制日货，抗日爱国。8月，八乡师党支部以同学会的名义，向临清十一中、武训中学、兖州四乡师等学校发出邀请，组织旅外同学读书会，以共同学习的名义，团结革命同学，培养党员发展对象。“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受其影响，寿张县的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小学教员，在党的领导下，纷纷订阅进步刊物，成立读书会，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八乡师党组织发动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他们办壁报，抨击时弊；举行演唱会，演唱救亡歌曲《开路先锋》，谱唱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演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忘国耻的古装戏等。上述活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抗战热情，为共产党在台前一带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逐步扩大。

1936年初夏，八乡师举行建校五周年庆典活动，党支部积极准备文艺节目，在校庆纪念会上演出爱国京剧《王佐断臂》，激发了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1936年9月27日，赵健民在济南被捕，因特务从他身上搜查出赵健民给王福昌的电报稿，10月初，韩复榘派特务奔赴寿张，到八乡师抓捕了王福昌，王福昌没有暴露党的秘密。此次事件发生后，官方配合学校当局对八乡师实行严查，他们审问学生，没收了一些进步

的刊物、书报，清查共产党组织，禁止抗日宣传。县政府召开教训会，疯狂镇压学生运动，扬言要抓一批共产党员。学校对进步学生以“共产党嫌疑”为名进行驱赶，共产党员被迫离校，党的活动暂时中止，八乡师党组织遭到破坏。王福昌被捕后，被特务押到济南监狱，在监狱中受尽敌人的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次年夏，王福昌病故于济南山东高等法院看守所。

1936年10月，刘晏春派冠县县委书记王维群到八乡师恢复党组织，王维群指定时玉泉为临时支部书记，恢复了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八乡师党支部是寿张县第一个共产党的党支部，党组织在领导学生的读书活动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培养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学生，提高了大多数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觉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作了准备。这些党员和进步学生后来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多数成为党在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

二、中共甘草固堆党支部

甘草固堆村位于台前境西南，北依临黄大堤，和郟城、鄆城隔黄河相望，地理位置偏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该村属范县，与寿张接界。当时，这一带旱、涝灾害频繁，加上兵慌马乱，土匪横行，地主豪绅鱼肉乡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2年春，在范县师范读书的中共直南特委负责人刘晏春来到黄河北岸的甘草固堆村，结识了有正义感的王性钦等人，经常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王性钦等人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33年底，刘晏春介绍王性钦、陈友福、王性聪三人入党（另有卢兆德，是刘晏春带

来的党员)，并成立中国共产党甘草固堆党小组，王性钦为组长。党小组建立后，在直南特委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开展革命斗争，发展先进分子入党。1936年又发展王福荣、王性尧、王性善等人入党。是年秋，刘晏春在王性钦家里主持建立了中共甘草固堆第一届党支部，支部书记王性善，组织委员王性尧，宣传委员王福荣，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台前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37年春，上级党组织在甘草固堆村建立情报站，主要任务是传送鲁西北特委和泰西特委的往返文件。1937年秋，范县、寿张县遭受水灾，甘草固堆党支部一方面组织贫苦农民抗洪救灾，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员。1937年至1938年，党支部先后发展陈有贤、王性林、于士杰、陈兴理、王性和、陈有岭、陈有德、孙连元等人入党。1938年底全村共有党员23人，1939年至1942年又发展了卢召太、王福连等十几名党员，进一步壮大了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逐步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并很快成长起来。

在抗日战争时期，该村党组织把许多党员干部送往抗敌前线，同时，领导群众开展了艰苦卓越的斗争，始终是一个攻不破、压不垮、不变色的坚强堡垒。

三、中共寿张刘楼村党支部

1936年12月，刘晏春、丁汉三介绍魏金加入中国共产党。魏金家居侯庙刘楼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在外祖母的资助下，曾上三年私塾，其间，开始读革命书籍，接受进步思想，立志走革命救国道路。

1936年，他被推举到本村教书，将地主剥削农民的实情编成歌谣，当成课本，教学生朗读说唱。当地豪绅们极为恼火，告到县府，他被迫停止教书。是年，魏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积极宣传党的思想，开展革命活动，年底，发展魏存心、魏存德、魏继更、蒋怀礼等7名党员。从此，直南特委领导人刘晏春、王镜如、卞涛、丁汉三等经常到这里秘密开会，通报情况，研究工作。

1937年初，刘晏春派白玉光找魏金，研究共同配合发展范、寿、朝、阳一带的党组织。魏金先后动员李耀亭、袁庆合等23人入党。6月，成立刘楼村党支部，魏金任支部书记，组织委员袁庆合，宣传委员李耀亭。党支部成立后，发动群众，割电线，贴标语，散发传单，同国民党当局、地主阶级开展了斗争。

四、中共寿张东门中心支部

1937年初，中共鲁西北特委派赵风升到寿张发展党组织。赵风升在寿张东门发展阎龙光（原名李景贤，后又改为岳川）为党员，阎龙光又发展徐波（原名徐昌禄）、罗秀伦、张传伦三人入党。是年4月1日，建立中共寿张东门支部，书记阎龙光，组织委员徐波，宣传委员罗秀伦，隶属阳谷县委。同年6月初，中共寿张东门支部改为中共寿张东门中心支部。是月，赵风升根据中共鲁西北特委指示，将中共寿张东门支部的党员徐波、罗秀伦、赵强、杨朝柄调出，建立中共寿张北门支部，由徐波任书记，赵强任副书记，罗秀伦、杨朝柄任委员；将东门支部的党员阎代哲、李坤、姜德和、姚义远调出，建立中共寿张南门支部，书记姚义远，组织委员阎代哲，宣传委员李坤。以

上两个支部隶属中共寿张东门中心支部。

另外，1936年夏，共产党员汪洋利用回家探亲之机，在夹河、吴坝一带开展党的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台前一带的陆续建立和发展，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大量发展党员，建立各级抗日政权和开辟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干部条件，奠定了组织基础。

附、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台前党组织分布示意图
(1932.8~1937.7) 见《组织史》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台前党组织隶属关系序列表
(1932.8~1937.7)

第二章 抗日战争初期党的主要工作

(1937.7~1939.2)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勇敢地肩负起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历史重任。1938年1月,在国民党军队南撤、境内土匪武装四起、国民党政权瓦解、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人民群众陷入极度灾难的危急关头,中共台前一带的党组织毅然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在中共鲁西北地方党组织争取与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合作的有利形势下,建立了以共产党员管大同(范筑先委派)为县长的寿张县抗日政权。是年3月,中共寿张工委建立。自此,台前境内各级党组织,按照上级党组织的部署,大力发展党员,积极组建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团体;广泛宣传动员各阶层人民群众拿起武器,奋勇抗战;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一切进步力量合作,共同抗日,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迅速形成,同时,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是年4月,管大同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撤职,改由国民党党员接替寿张县长。此后,寿张县的中共党组织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大局。11月,范筑先殉国,聊城失守,寿张县与鲁北各县一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但此期共产党卓有成效地工作,为以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从多方面做好了准备。

第一节 抗日战争初期寿张一带的形势

1937年7月到1939年2月，寿张一带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强烈的地震、黄河水灾、日军的侵入、国民党军政人员大部南逃。天灾人祸给寿张一带造成巨大的灾难，整个地区变为敌后，出现了空前的大混乱、大动荡局面。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由于对待抗战的立场、态度不同，出现了大分化和重新组合态势。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和各种抗日的社会力量，都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组合、发展，并积极开展抗日斗争。留在寿张一带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除了少数将领率部参加抗日斗争外，大部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部分叛变投敌，部分变为土匪。全县抗战形势日趋严峻、复杂。

一、强烈地震和黄河水灾，给寿张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1937年8月1日4时35分-48分，山东省菏泽发生7.5级强烈地震，烈度达9度，14时又发生6.75级地震。此次地震波及寿张地区，18时复震，寿张县死伤20余人，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1937年7月14日22时，黄河决口范县大王庄和寿张县境王集、陈楼。寿张境内尽淹，房屋倒塌过半，居民流离失所，死于霍乱、痢疾、麻疹等传染病者达2000人。1938年1月24日，黄河发生凌汛，寿张临黄堤南尽成泽国。同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侵，国民党军队炸开郑州花园口大堤，企图以黄河之水阻击日军西犯，结果不但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反而使滔滔黄河水将人民置于史无前例的黄泛灾

害之中。自此，黄河改道东南夺淮入海，寿张境内断流8年有余，县境西半部被丢下一片黑沙，每次刮风时，飞沙遮天盖地，数年不生庄稼。1938年8月到11月，境内霍乱、缩筋病流行，传染快，死亡率高，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

二、混乱的政治局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日军大规模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共赴国难宣言。面对日军的严重威胁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蒋介石终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宣言，次日又发表蒋介石关于国共合作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调集大量兵力，从华北到华东、华中，形成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体系，进行了忻口、淞沪、台儿庄、武汉等几个比较大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的爱国将领和士兵英勇奋战，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由于蒋介石集团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出现严重的大溃败局面。

10月初，日军占领德州，威逼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命令黄河以北的所属部队和地方政府官员向南撤退。一时，寿张县境到处都是渡黄河南撤的国民党军队。其中，很多国民党士兵在撤退中携枪逃跑，一些散兵游勇东窜西扰，烧杀抢掠，

搅得到处鸡犬不宁。国民党寿张县长齐体元等政府官员和封建势力的上层人物纷纷搜刮资财携眷南逃，全县整个国民党统治势力土崩瓦解。由于日军进攻的重点是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其统治势力在寿张县境尚未建立起来，全县很快陷入混乱局面，各种杂色武装四起。这些武装主要有：（一）国民党下台的党、政、军人员，因政治上失势，为争一席之地，自称团长、司令而建起的武装；（二）绿林、土匪武装。这些绿林、土匪武装，他们自称团长、司令，任意向群众要钱要粮，甚至公开抢劫；（三）联庄会（有些地方称杆子会、红枪会）。它是由一个大的村庄或若干个村庄联合组成的保卫地方治安、防御土匪抢劫的群众性的武装团体，会员多系青壮年农民，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联庄会在保卫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这一组织得到了发展；（四）会道门。这一时期会道门较多，有不少是反动的，有些被封建地主阶级所操纵，其首领大都与日伪军、国民党反动分子相勾结，破坏抗战，危害群众。

此外，县境土匪姜次敏、刘庆扬、叶思棋、于其水、王廷怀等，各霸一方，杀人抢掠，祸殃百姓。地主、劣绅也组织反动武装“民团”，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三、党的战略方针和寿张县党组织面临的任务

为挽救华北危局，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中国共产党洞察抗战全局，勇敢地肩负起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七七”事变爆发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

电》，指出：“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并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工农红军迅速集结，准备奔赴抗日前线。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就必须实行坚决的抗战方针，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并指出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从华北战局的具体情况出发，迅速把共产党的主要力量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以城市工作服从于乡村工作，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游击队，确立了全党搞武装、抓政权、放手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为华北人民的抗战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任务。

寿张县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由于千百年来封建剥削阶级的统治，黄河失修，旱涝灾害不断发生，战乱连绵不断，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由此铸成了这一地区民性强悍，豪侠仗义，崇尚勇武，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光荣的斗争传统。“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高潮对此处民众的影响日益加深，抗击日军的侵略，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和迫切愿望。

“七·七”事变爆发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寿张地区党组织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北方局的号召，发展党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组建抗日武装，就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国民党地方官员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其抗日；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各种群众抗日团体，掀起声势浩大的人民抗日战争的高潮。

第二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

1937年10月，日军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南撤，寿张县国民党政权解体，全县很快陷入地方民团、土匪武装、散兵游勇蜂起的混乱局面。在此危难之际，寿张境内的中共党组织毅然奋起，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积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县城各界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号召下，纷纷成立抗敌动员会，宣传抗日，组织发动群众募捐，慰问前方抗日将士。

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和行动的感召下，在新成立的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团结争取下，断然拒绝韩复榘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撤军令，11月19日，通电全国，誓死抗日。电言：

“南京陆海空大元帅 蒋

山东省政府主席 韩 均鉴

慨自倭奴入寇，陷我华北，铁蹄所到，版图易色。现我大军南渡，黄河以北，坐待沉沦。哀我民众，胥陷水火，午夜彷徨，泣血椎心。职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以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惜。惟望饷项械弹，时与接济。俾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引领南望，不胜翘企。

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

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叩皓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

范筑先的皓电，震动了全国，振奋了鲁西北民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标志着中共鲁西北地方党组织和范筑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寿张县的抗日救国和统战工作开始出现新的局面。是月，范筑先委派中共党员管大同等20多人到县城筹备举办政训班，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学习，共举办两期，培训60余名抗日骨干。管大同还以政训班学员为骨干，组织成立“同学抗敌会”，出版《老百姓》、创办《向导》报，向民众宣传抗日道理。12月，在范筑先和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建立了县抗日政府，管大同任县长。随之，县政

府组建特务大队，并对选举产生的乡长、保长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再让他们任职。同时，组织成立“抗日民族先锋队”、“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金堤上下，黄河南北，呈现出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然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日益遭到国民党顽固分子的仇视，他们暗中加紧破坏活动。1938年4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以省政府的名义，下令免去管大同的县长职务，由国民党CC分子冯谦光接任县长。冯上任后，积极反共，禁止“民先”等进步群众团体活动，发展三青团，出版《寿张动员日报》，进行反共宣传。6月组织成立反动的“抗战动员委员会”，将原聊城政训处驻寿张办事处撤销，干部转入“动委会”，并以动委会的名义开展工作。“动委会”一时为国民党顽固分子所掌握，与原办事处干部摩擦甚为激烈。中共党组织及时发动群众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大局。

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民先”和“青救团”十分活跃，成了宣传抗日运动的“火车头”。它带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宣传大军，广泛宣传日军的侵略罪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写标语，画漫画，散发传单，唱抗日歌曲，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同时，他们还组织了剧团到处演戏，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进一步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热情。他们还成功编演了讽刺华北大汉奸殷汝庚的戏剧《殷汝庚的下场》。他们演出的《巧》和《松花江上》对群众的鼓舞也很大。抗日救国，保卫家乡，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宣传

抗日得到了群众的同情和广泛的响应，打击了国民党顽固分子和亲日派的气焰。

同时，党组织为了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也展开了文笔斗争。冯谦光一上任，《向导》就停刊了，党组织就用《寿张抗战日报》的名义接着办，继续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发动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揭发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行径，主要内容有新闻时事、报导、评论，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除了采访就是通过听收音机和看《聊城抗战日报》等其他报纸获得。他们办报是义务的，经费靠募捐，许波任主编，赵强负责刻版，赵西祥负责印刷，王俭斋、李文献（李景显）等负责采访，收听收音机上的新闻，崔影负责分发，周伯乾负责对外联络。每天油印，有时还套色油印一二百份，分给机关、学校、商铺、居民、驻防县城内外的抗日五支队官兵等，很受群众欢迎。

国民党也不甘示弱，指令国民党领导的“动委会”、政治大队出刊《寿张动员日报》，宣传“一个政府即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领袖即蒋委员长。”《寿张抗战日报》与之展开笔战，在报头上加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汉奸、土匪、亲日派！”《寿张抗战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洒囊饭筒的作风》，揭露评击国民党包括办《寿张动员日报》的人不关心国家危亡和群众疾苦。在笔战中，《寿张动员日报》理屈词穷，节节败退。冯谦光为打垮《寿张抗战日报》，一方面加强种种限制，使《寿张抗战日报》在经济来源上、物资供应上都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最后，县政府公然下令《寿张抗战日报》停止出刊，命令许波、赵强参加《寿张动员日报》，经过交涉，《寿张抗战日报》月底停刊，《寿张抗战日报》人员不参加《寿张动员日报》的编辑。《寿张抗战日报》停刊时，发表了《告全县人民书》，号召全县人民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家卫国而继续斗争。

寿张地下党还利用公开的场合和国民党顽固分子进行斗争。驻防县城的五支队营长共产党员王化亭在文庙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讲了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和全民总动员问题，听众凝神静听，接着国民党代表、县党部负责人姜明谦上台叫喊：现在不是国共合作的问题，而是共产党投降国民党，放弃赤化，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抗战。五支队的士兵和群众高呼：“胡说，破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就是汉奸！”接着，“国共合作万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的口号响彻全场。县保安大队的人没敢动，姜明谦没敢再讲下去就下了台，灰溜溜地出了会场。

面对共产党领导的以抗日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国民党不断寻机进行威胁和镇压。冯谦光在各机关朝会上说：“现在有的人活动很厉害，紊乱秩序，一定要严厉镇压，我不管‘民先’民后，民左民右，只要活动，一律杀头。”这更加激起了群众进行爱国活动的激情。为了团结抗日，共产党组织更加注重了活动的方式和方法。

国共斗争愈来愈烈，八路军东进支队杨勇旅某部政委苏怀智、连长于焕文到侯庙一带宣传抗日，被国民党二区区长武朝秀逮捕，交给了冯谦光，冯谦光计划次日将2人活埋。我地下党组织闻讯通过关系

派人趁冯谦光酒醉之际，将一张布告贴在他身后的衣服上，又请有威望的开明人士万寿堂的老板闫九鼎去说服冯谦光。闫九鼎给冯谦光讲了许多道理，他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战，国共合作，你活埋八路军，这个责任你负不起来。”冯置之不理，要恣意孤行。闫九鼎又说：“你如果杀了这两个八路军，你就活不到明天！”冯谦光冷笑着说：“那好吧，等着瞧吧！”闫九鼎接着说：“你回头看看你背上的布告！”冯见到布告，惊恐至极，开始动摇了，经万寿堂做保，冯谦光放了这两个八路军干部。

中共寿张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群众工作的开展，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1月聊城失守，范筑先殉国，寿张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

1939年3月，寿张县城沦陷，“动委会”解散。是年8月，在八路军东进支队的支持下，成立了以少数共产党员为领导骨干、无党派民主人士占多数的县抗日民主政府，它是按照共产党的“三三”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此，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寿张县全体共产党人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勇敢地担负起领导本县抗战的历史重任，把工作中心转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创建根据地。

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政府机关共产党员虽然不多，但工作一直是顺利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党的正确的统战政策与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共产党领导干部对党外人士是信任，而不是

利用；是真诚的合作，平等对待，而不是居高自傲，自命特殊，因而形成团结友爱互敬互助的一个“战斗集体”。当时，县政府五个科长中，只有一科科长是共产党员。各科科员中最多只有一个党员，有的没有。

建设抗日根据地一开始，共产党就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都通过各种方式，对地主富农上层人士进行争取、团结、教育工作，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当时，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下，统战工作是县、区政府的重要任务，除了个别来往交谈之外，就是由县长、区长出面，在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的时候，召开县的、区的士绅名流座谈会，讲形势，讲共产党的政策，对他们提出要求，征求他们对政府的意见。有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对事不对人的批评教育，即团结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在群众中流传一时的王鲁光“舌战群儒”，就是个典型的事例。

1940年春，二区召开第一次士绅名流座谈会，会议由青年共产党员王鲁光区长主持，到会的人都是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的，他们中的少数人表现较好，多数人顽固守旧，正统观念浓厚，不相信共产党、八路军能战胜日军，更瞧不起年轻的区长，说什么“毛孩子”懂什么，并提出一大堆难题。王鲁光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首先，他宣传共产党坚决抗日的立场、全民抗战的主张、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严正指出：“八路军武器不如国民党正规军，而韩复榘拥有装备精良的十万大军，却一枪未发把整个山东让给了日本人，这样的军队武器虽好又有何用？八路军武器不好，但有不惧牺牲的精神，在国民党部队纷纷

南逃之时，挺进敌后，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照样可以打胜仗，平型关大捷不是铁的事实吗？县境内的梁山战斗，八路军仅一个团消灭了日本人四百之众，难道诸位不知道吗？有的问杨县长（杨朴民1939年8月至1940年10月任职）有没有省政府的委任状，大概是说这个县长不合法，而韩复榘派到寿张的县长齐体元在日本人还未到寿张之前，就携款潜逃了，后来沈鸿烈派来个县长冯谦光，日本人占领寿张后也逃之夭夭，这些都是有委任状的合法县长，他们不抗战，人民能拥护他吗？现在大敌当前，抗日救亡，人人有责，谁能领导抗战，人民就拥护谁，谁就合法。”一席话驳得这些人哑口无言，从此不敢小看这个“小毛孩”区长了。会后，一位进步乡长说：“这叫王鲁光舌战群儒。”王鲁光制服了这些乡绅后，二区抗日民主政府深入发动群众，建立起区队武装，从此打开了统一战线的工作局面。

由于党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第一阶段作了大量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扩大，参加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本县民主人士的言行，对全县统战工作都有较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各区政府当时叫区公所，也都相继建立起来，有的区区长、副区长是由本区的民主人士担任的。

当时，群众踊跃参加地方部队，但枪支弹药一时难以解决。为此，党开展了一次广泛而深入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宣传运动，以动员地主富农把手中的枪支子弹捐献出来，用于抗日。许多地主富农捐献的热情高、行动快，县、区政府在短期内收到大批的枪支、子弹，装备了县区机关、公安部门和党政群领导干部，这是地

主富农爱国抗日的表现，是对建设抗日根据地的贡献。

第三节 寿张县抗日县政权首次创建与被扼杀的经过

一. 筹办政训处

1937年10月，范筑先为了抗日，一方面收编土匪绿林队伍和散兵游勇组建抗日武装，另则接受中共山东省委派来的一批青年共产党员和北平、天津的流亡学生到聊城参加抗日，并设立政训处，依托共产党人培训抗日军政干部，同时为动员组织群众抗战，有计划地向所辖各县派遣政治服务员，设立县政训办事处。

10月下旬，范筑先派原在六专区政训处工作的中共党员和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第三集团军政治处少校干事管大同到寿张县任政训干事，负责筹备组建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驻寿张办事处，宣传动员民众抗日，同来的还有许法、于笑虹、姜克夫、马梦蛟（马端）、郭洪隽、孙兴诗、高元甲、党自强、张翼（张汝琦）、高衡、李清波、杜宗禹（杜平）、梁范九、李文远、李宗白、姜维扬、陈大安、张兆栋、李茂轩、岳树梅（岳克寒）等20余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其中管大同、许法、孙兴诗3人是共产党员，受鲁西北特委的领导。

当管大同等人到达寿张时，国民党县长齐体元还在任，县政府机关还保留着，管大同以干事的名义出面与县长及各机关接洽，把寿张政训处设在城东北角县立第一小学内。这所小学遭水灾墙倒屋塌，仅有一座二层的砖楼和两间小茅草屋，砖瓦残破，门窗全无，夜风侵入，

被冷如铁，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最寒冷的季节。

11月下旬，宋哲元第一集团军在大名战败，国民党军纷纷经范县、寿张南退，寿张县长齐体元率县属各机关职员、省立寿张第八乡师校长国民党人王冠英及乡师数百名学生退往梁山，城内的群众也纷纷外逃。管大同派陈大安骑自行车向东去探听日军的情况，陈大安在张秋镇附近发现日军骑兵出没，立即飞奔回城报告情况，管大同召集寿张政训处全体人员和撤退到寿张的聊城政训处上尉服务员林友申（林茵如）、郭鸿等开会决定：管大同和孙兴诗率12名服务员出城避往黄河泛滥淹没的村庄。姜维扬率领许法、高元甲、张翼、梁范九、李文远、李宗白、陈大安、李茂轩等9人渡黄河奔赴梁山，聊城政训处驻寿张办事处设于后王集张坊的馍冶。

败军退完，寿张形势又趋于缓和，管大同、孙兴诗、林友申等返回寿张城内，依靠共产党员申云浦、赵凤生和爱国小学教员王明智等联络知识分子组织救国会，并由孙兴诗主编寿张政训处的机关报《老乡月报》（油印），后又创办《抗敌日报》，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鼓动人民起来抗日。他们在街头用石灰浆涂写抗日标语，散发传单，组织“先锋剧团”上街演出，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国纲领，使这座古城的抗日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县政训处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当时由于齐体元和政府官员外逃，县城外四乡开始骚动起来，各处流窜成股的绿林势力（所谓的土匪）打家劫舍，惶惶不安的地主绅士组织武装“民团”与土匪对抗，老百姓在这两种势力对抗中煎熬。县政训处想方设法把

工作重点放在把这两种各自利害相反的武装团体引上联合对敌共同抗日的轨道。根据实际形势需要，县政训处的人员以公开的身份进入民团中工作，以秘密身份到绿林中去做工作。但是，无论对绿林或民团的工作都是很困难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范筑先已经宣布坚持鲁西北抗日的形势下，这两种势力的头头们表面上也都是把抗日作为口头禅，但是行动上他们有各自的打算，前者的目标只在拦路抢劫，大吃大喝，后者的目标只在打土匪，保护财产，这样只用抗日大道理去宣传很难见效。不仅如此，有些民团头头一旦坐大之后，倨傲不可一世。其中，好一点的民团头目对政训处的人员客客气气，表面敷衍；不客气的，就把政训处的人晾在一边，给他们以冷遇，不准外来的人接近自己的队伍。县政训处要想顺利开展工作，就必须进一步掌握县政权。

二、建立县抗日政权

1938年1月初，寿张、范县两县部分政训处人员在寿张县城内的县文庙集合过新年并检讨工作，他们认为这两个多月的工作成绩不大，主要是旧政权体制阻碍发动群众。范县少校干事红军老干部王幼平和寿张的林茵如认为打开局面的关键是将政权抓到手，他们以地瓜干刻图章顶冒寿张县商会会长、农会长和著名士绅的名义，领头起草公文，请专员范筑先委派管大同出任县长。范筑先随以他的名义委任管大同继任寿张县县长，寿张县政训处由林茵如接替。

管大同就任当晚来到县政训处，和大家共同商讨组织县政府领导班子以及施政工作。初步制订了以下施政措施：（一）施行财产累进

税；（二）救济灾民；（三）废除苛捐杂税；（四）推行抗日教育；（五）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六）加强对县武装的纪律整顿；（七）组织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建立县特务大队。接着，他们认真研究确定了参加县政府的成员。除第一科（民政）科长已经由礼聘的一位旧人员担任外，其余都是从政训处中推选的，大家推选孙恩白任县政府秘书，岳树海为二科（财政）科长，李宗白任会计主任，杜宗禹任金库主任兼鉴印，王明智任典狱长。其后不久，第一科的科长改由于笑虹担任。这样，以管大同为首的寿张县抗日政权正式建立，为以后动员群众抗战，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发展武装，筹备给养等，提供了政治保障。寿张抗日县政权建立后，首先征集数万元现款支援范筑先扩编军队。同时，他们把县政府的大门打开，平民百姓可出入县衙，有求必应，改变了过去“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腐朽之风。由于新政权的所作所为深得民心，寿张人民十分拥护他们，到处传颂“寿张县换了清天”。

三. 加强政权建设

（一）改造杂牌武装

为了广泛开展宣传和政治鼓动工作，与进步力量建立联系，积极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1月，寿张县政府办了一个油印的报纸《向导》，主要是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爱国、保卫家乡为宗旨，发行量很大。县政府在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开始整顿县境内的武装，派一些人去争取土匪、杂牌支队，并以县政府的名义派遣马梦蛟、李清波、张兆栋、李茂轩、张翼等分别到城关和其他四

乡民团任政治指导员，做改造地主武装的工作。派梁范九利用他和盘据在范县的绿林武装刘耀庭、袁寿山的参谋长刘子章的师生关系，打入内部做争取工作。是年5月，范筑先收编刘耀庭、袁寿山的武装为二十一支队，派于笑虹任该支队的政治部主任。

（二）开办政训班

随着抗日工作的深入开展，县政府拨款开办“寿张政治人员训练班”，积极培养进步力量。管大同兼任主任，许法任教务主任，林友申（林苗茹）任班主任，于笑虹、张翼、王幼平、梁范九、姜维扬、金维国、陈大安、马梦蛟兼任教员。他们自编教材，课程主要有《帝国主义侵华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资本论》、《游击战术》、《政治常识》、《国防地理》、《中日战争之前途》、《帝国主义论》等。政训班每期四、五十人，40天为一期，一连办了两期，马达、王俭斋、宋云周、赵强（赵连元）、赵西洋、党自强、周伯乾等都参加了学习。同时，政训班还培养了一批女学生，有孟兰英、孟兰芝、刘桂香、孙光华、薛兰贞等。政训班开办的时间虽短，但为党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抗日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实际上，寿张县政训班就是寿张县培养党政军人才的大学校。从1938年春天起，全县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走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前线，形成了“北上”高潮。政训班的学生立场坚定地到范筑先领导的支队去做政治工作，刘颖、倪子春、张兰英、徐秀娟等一批青年女子也挺身而出，投入到聊城范筑先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张郁光的军政干校学习。没有“北上”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部分倾向“青救团”和“抗敌会”，在地下党的领导

下，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斗争。当时，以政训班为主，成立“同学抗敌会”，出刊《同学抗敌会报》，后又改成“教育抗敌会”，出刊《寿张抗敌日报》。

（三）建立抗日群众团体

为加强政治宣传和民运工作，由李兆龙（当时的积极进步人士）、徐继颜（地下党员，后为寿张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赵凤升（地下党员、中共阳谷县委书记，他是党派来在寿张一带活动发展组织的）等组织成立政治处，主要成员有：许法、张翼、许世禄、赵西祥、赵海、刘怀生、陈永嘉等。这样，开展抗日群众运动有了坚强的组织。

政治处成立后，秘密发展“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把思想进步、立场坚定、活动积极的先进分子吸收到“民先”组织里。当时，参加“民先”的有张效令、马达、党自强、李呈瑞、刘桂香、刘敏书（刘颖）、孟子华、饶紫春、孟兰芝、赵连元、许波、王同昌、许世禄、赵强、赵西祥、刘怀生、陈永嘉等。政治处在秘密发展“民先”的同时，公开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团”（简称青救团），由“民先”直接领导，许多有爱国思想、愿意抗日的青年纷纷加入。“民先”和“青救团”的活动非常活跃，是寿张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力军，这两个组织成立不久，许多成员响应党的号召，北上抗日，参加了中共鲁西北特委和范筑先领导的抗日武装。

（四）组建抗日武装

抗日政权建立开始，工作阻力很大，地主绅士仍然掌握着地方政

权，政令行不通。寿张的地主绅士分为河（黄河）南派和河北派，河北派的有姜瑞五、姜次敏（一区区区长）、姜益轩（姜明谦，寿张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刘庆锡（城关保安团团长）、王梦孔、岳崇爵、武朝秀（武俊卿）等人。两派都有自己的武装（多为民团），他们都企图左右县政权，让县政府顺从他们的意愿。两派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嫉恨，河北派因为近水楼台，更是频繁地到县政府纠缠，经常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给县政府的威胁最大。河南派则是盯住县政府，不让河北派分享权力。但是，在统一战线的政策下，地主绅士们口头上也表示“拥护抗日”，对县政府推行的政策却总是明里暗里进行阻挠，甚至故意向县政府出难题，气焰十分嚣张。

除封建地主势力外，境内土匪一时蜂起，活动猖獗。较大者有叶思棋，盛拥千人，占据县境北部和东部；于其水、王廷怀部有千余众，占据县境西部和西南部。他们割据一方，祸害百姓，公开对抗县政府，甚至抓捕毒打县政训处的干部，对新政权危害很大。官方武装原有二部分：一是县警察大队有 50 余人枪，二是城关保安大队（又称保安团）有 200 余人枪。在名义上这两部分武装都隶属于县政府，受县长的指挥，但是警察局长陈义勋是国民党右翼分子王金祥的亲信，保安大队长刘庆锡一贯听从绅士们的指挥，他们都不是县政府的武装。

为了排除地方势力干扰和镇压土匪，继而组织发动民众抗日，县政府决定建立“寿张县政府特务大队”，由中共鲁西北特委军事部派红军营长金维国任大队长，姜维扬为大队政治指导员兼大队党支部书记，队员由地方党组织和政训处从各方面物色，公开选拔，招收青壮

年加以军事训练。县政府警务所原有 100 余支枪，原县长齐体元逃走
后，枪支全部被刘庆锡带走，管大同责令他交回枪支，刘千方百计阻
扰。在中共鲁西北党组织的支持下，王幼平派姜维扬到阳谷将特委骨
干武装廖云山的第一支队（张维翰第十支队的前身）共约百人调入寿
张，帮助管大同开展工作。在形势逼迫下，刘庆锡交出枪支。这些枪
支武装起县特务大队。县抗日武装政权的建立触犯了士绅们的利益，
引起了他们的嫉恨，他们暗地里派姜明谦、姜次敏、武朝秀等人前去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临时驻地曹县，向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告状。沈鸿烈
早把范筑先将军为旗帜的鲁西北视为眼中钉。1938 年 4 月，沈鸿烈
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令，免去管大同寿张县长职务，又以他个人的
名义委派国民党 CC 分子冯谦光接任寿张县县长。至此，由管大同领
导组建的寿张县抗日政权，被封建势力和国民党顽固派所扼杀。

（五）县抗日政权的财政工作

寿张县抗日政权建立后，首先开展田赋征集工作，征集数万元现
款支援范筑先扩编军队。寿张县在当时是中共鲁西北特委曾经掌握的
山东省第六区九个县中最完整的一个县，其他县均被土匪占领过，地
方财政凋敝。寿张县的财政收入除上交专署和地方开支外，还借给阳
谷 8000 元。管大同在被沈鸿烈撤换后，便带着还未曾入帐的阳谷归
还的 8000 元现款上交鲁西北特委，作为鲁西各县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和为党领导的骨干武装十支队购置机关枪。寿张县是共产党员任县长
被国民党夺取政权后，给党上交款最多的一个县。

第四节 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和中共寿张县工委的建立

“七七”事变后，中共山东省委按照中央精神，决定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展抗日救国民众团体。是月，颜华（今山东省阳谷县颜营村人）和姜农受党组织委托，到张秋、夹河一带开始发展党组织。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成立了以颜华为首的抗日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公开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动委会的宗旨是宣传抗日救国和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颜华到吴坝后，先后发展高庆春、葛心贞入党，继而发展王坝村的伍合明、周庄村的王玉明、赵桥村的陈伯文等人入党，并建立了党小组，葛心贞任组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乡师和台前境内的各学校组成宣传队，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8月下旬，日军飞机在寿张城东街扫射轰炸，数人遇难。9月，八乡师由寿张城迁往梁山，八乡师党支部自动解散，部分学生奔赴延安。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华北局，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为唯一方向”。华北局根据这一指示，决定在各地发动和组织游击队，在农村开展抗战。寿张城区的党组织和甘草固堆、刘楼村等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3月，中共鲁西北特委为加强党对寿张县抗日工作的领导，派中共阳谷县委负责人赵凤生再次到寿张，主持建立了中共寿张

工作委员会，阎龙光任书记，徐波任组织委员，赵强任宣传委员，罗秀伦任交通委员，张传伦任锄奸委员。接着，批准丁汉坤、李春平、赵西洋、刘福生、李健民、李保洪、李保贞、曹华亭等人入党。寿张工委成立后，着手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年5月，遵照上级指示，集中力量开展“红五月”建党活动，把党组织的发展由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展转移到农村。张庄有阎代哲任书记的党支部，姜庄有姜德和任书记的党支部……全县很快建立了近30个农村党支部，发展党员300人，迅速壮大了党的队伍。但由于采取突击式的发展，影响了党员的质量。

第五节 组建抗日武装，建立群众抗日团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平津陷落，日军南侵，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7月中旬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十条纲领，要求共产党员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号召，“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号召全省人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中共寿张县党组织遵照中共山东省委的部署，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宣传抗日，组建各类抗日群众团体和抗日武装。

1938年1月，由红军干部洪涛为司令的聊城抗日第一支队——堂邑游击队进驻寿张县境，搜捕土匪，维护社会治安和保卫以管大同为首的抗日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鲁西北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抗日队

伍。

同年3月，根据鲁西北特委的指示，阳谷县抗日游击总队一部分转移到寿张。不久，他们和寿张的抗日武装及廖云山部汇合，由熊义吾、廖云山率领到冠县加入范筑先的抗日十支队。

是月，魏金受刘晏春委托，在刘楼村组建了台前境第一支抗日游击队，魏金任指导员，田光任队长。游击队建立后，首先打垮伪区长房延漠的区队，没收了他的全部枪支。魏金又动员争取国民党军队的排长李宗学率部参加了共产党，带回步枪53支、手榴弹80枚、大刀10多把，壮大了抗日力量。随即又在寿张、范县交界地带扩军，并没收地主武装的枪支300余支，游击队发展到500多人。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挺进鲁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同年9月，魏金带领这支游击部队投奔八路军主力部队，被编为鲁西军区直属的特务营，魏金和其他四人留政治部学习。

1938年4月，农民出身的打渔陈乡王堂村人杨朝炳，受阎龙光的指派，组织寿张、阳谷、东阿3县青年学生和部分农民成立抗日游击队，杨朝炳任队长，队伍发展到150余人，但很快被国民党寿张县政府强行解散。杨朝炳为避搜捕，将枪支隐藏后，带部分人奔往黄河南。不久，杨勇带领八路军六八六团挺进鲁西，开辟抗日根据地，杨朝炳率部即参加了八路军。

抗日三支队原为国民党山东第六区督察专员范筑先收编的“杆子”武装，司令张新泽。1938年11月，范筑先殉国后，这支队伍孤立无援。当时，中共鲁西区党委出于抗日和统战工作的需要，将其收

编，由鲁西军区领导。1940年4月冀鲁豫军区成立后，改番号为冀鲁豫军区抗日三支队，司令仍是张新泽。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冀鲁豫军区派10多人充实到三支队。其中，派政治部主任杨进任政委、李德方任副司令、焦剑侠任战斗连长、付士范任政治部指导员、李传思任总支部书记、许子善任供给处长、张崇业任战报编辑。抗日三支队经过改编后，英勇善战，参加战斗近百次，后和县基干大队合并，主要活动在寿张县境，是县境内规模最大的地方抗日武装，为抗击日军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章 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 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9. 3~1941. 5)

台前境抗日根据地是于抗日烽火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大力支持下，在敌我斗争异常尖锐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在日、伪、顽、匪和封建统治的夹击之中，建立、巩固、发展起来的。

为了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部队挺进鲁西。是年7月和8月，在八路军的支持下，中共寿张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先后成立。从此，台前境内的各级党组织在中共寿张县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把中心工作转向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创建抗日根据地，并迅速在境内掀起全民抗战的高潮。在中共寿张县委领导下的台前境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在台前的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第一节 聊城失守后寿张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

一、政治军事形势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武汉、广州后，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日本在侵华战略上，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诱

使国民党妥协投降，加紧将主要兵力逐步调回后方，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重点是华北。为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为一体的“总体战”。日本向国民党诱降的同时，英美等国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劝降，国民党内部的投降危险日益增长。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等公然叛国投敌，蒋介石集团也由于本身作战中的多次失败和对人民抗日力量的恐惧，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对日妥协，把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共上来。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1939年春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大搞“磨擦”，捕杀抗日人员，使团结抗战的形势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随着日军侵华战略的转变和其主力回华北，尤其是聊城失守后，寿张县所属的鲁西北抗战形势急转直下，抗战力量迅速分化。日军占领了部分城镇和交通要道，在占领区扶持伪政权，建立伪军组织。国民党顽固派借机大力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加紧和共产党制造磨擦。原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极力收拢范筑先的旧部。盘据在寿张一带的原范筑先部第三支队齐子修也趁机收拢范筑先的旧部，占领寿张一带，图谋发展。从而形成了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夹击之势。

针对聊城失守后的严峻形势，为加强对抗日斗争的领导，193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建立中共鲁西区党委，下辖鲁西、

鲁西北、泰西 3 个特委。是年 3 月，鲁西区党委决定撤销 3 个特委，改设 5 个地委。寿张县属二地委（即运西地委），申云浦、万里、段君毅（董君毅）先后任二地委书记。二专署专员由杨勇兼任，后由邹鲁风继任。二分区司令员周贵生，政委刘星。

1939 年 3 月 1 日，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师直属队和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杨勇任团长兼政委）等部近 5000 人（代号为东进支队）挺进鲁西，留杨勇率六八六团直属大队部和第三营，以及张国华、匡斌率师直属队两个连在运西地区，积极帮助中共地方党组织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建立各界群众抗日团体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从此，中共寿张党组织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持下，开始了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阶段。

二、社会各阶级对抗日的基本政治动向

面对日军的侵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伪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国民党顽军抓兵派款，寿张一带社会动荡，秩序混乱，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普遍惶恐不安，都为国家的安危和个人的生存而担忧。有些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很快就可以打败日本；有的人则认为日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中国是一盘散沙，要亡国了；有相当多的人把打败日本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拥有的几百万军队上。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对待抗战的基本政治态度是：地主阶级大多数人同情、赞成抗日，少数人动摇；投降派是个别的；富农和中产阶级、小业主绝大多数赞成、拥护、支持抗日；中农和雇农、贫农及小手工业者积极

拥护，热烈支持抗日；游民阶层中的大多数拥护并积极参加抗日，少数人动摇甚至投敌当了伪军；大批进步教员、青年学生和贫雇农出身的青年农民，踊跃参军，拿起武器走向了抗日战场。

第二节 日军三次占领寿张城

1938年11月15日，日军以重兵围攻聊城，聊城军民激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聊城沦陷，民族英雄范筑先和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守城健儿700余人壮烈牺牲。从此，中共建立的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彻底破坏，抗日斗争形势急转直下。

1939年3月22日（农历二月二日），日军从聊城出发，沿运河南侵，在阿城（今属阳谷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月二阿城惨案”后，继续南侵，张秋失守。日军顺金堤向西进犯寿张，国民党县长冯谦光闻讯逃窜，全城群众慌做一团。当时的县保安大队第一中队和县第一区队受进步思想影响，奋起抵抗。他们分别据守在县城东金堤口的南北坡上，伏击日军。敌步兵进至东纸房村，架设机枪、大炮向城里轰击，日军骑兵大队从何那里村迂回向西包围过来。敌人的侦察兵刚进入我方伏击阵地，战斗打响，日军当场被击毙7人。日军受阻，遂用大炮猛烈轰击区队阵地。阻击士兵浴血奋战，一区队军事教练袁敬超、陈士海等中弹负伤，士兵萧玉清、孟广银阵亡，一中队李希善牺牲，共计死伤12人，终因敌人火力太猛，县中队和区队被迫后撤

至白蜡仝村。日军长驱直入，并占领县城外东、南大堤，把附近村手无寸铁的群众赶到堤上，强迫跪下，然后把机枪架在群众的头上向城内扫射，以恐吓群众。进城后，敌人更是烧杀抢掠，奸淫妇女，遇难群众 30 余人。日军在路经县城东北隅许堤村时，烧杀抢掠，并闯进许昌贵的宅院，将许家大儿媳、三儿媳李春风及孙女许庆仙轮奸，后用刺刀剖腹，残不忍睹。是日，又窜到北台村枪杀 67 岁的老汉岳修林，在东关杀死体弱多病的农民陈二黄，在吴家街杀死馍房主人吴景福，北街居民孟昭之被抓去后为日军挑了一夜的水，日军天明撤离时仍将他杀死。在东官路，被抓给日军带路的岳存新也被拉下汽车用枪打死。日军还把从阿城带来的原国民党二十九军冯寿彭部俘虏 17 人全部刺死在县书院门前，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日军进城施暴一夜，次日凌晨撤走。

5 月 13 日，（农历三月二十日），日军二次进攻寿张城，新任国民党县长王启新闻风而逃，百姓再次罹难。日军进城杀人放火，浓烟弥漫整个城区。居民大部外逃，尚未逃脱的妇女不少被强奸，有的奸后又杀死。日军将居民家里的锅碗瓢盆砸得粉碎，家俱举火就焚，并到处拉屎拉尿，为所欲为，将城内闹得天翻地覆，乌烟瘴气。日军这次进城，当日随即撤出。

6 月 25 日，（农历五月十九日），日军秋川司令率 2000 日伪军再次进犯寿张，他们先用机枪、大炮轰击县城，火力侦察后列队进城。国民党县长王启新早已逃跑，城内居民大部逃避。日军仍是一番烧、杀、淫、掠。东门的陈景兰等人均被惨杀。日军进城后，由酒井上尉

率 100 日军和伪警备 320 人长期驻扎县城，其余日伪军向梁山进犯。占据寿张县的日伪军连续出兵下乡“扫荡”，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一片哭喊声和鸡飞猪嚎的惨景。日军以轮奸妇女后再杀死取乐，还有的在群众锅里拉屎拉尿。群众扶老携幼四处逃难。在通往县城的路上，经常撒满日伪军丢弃的从百姓家中抢来的鸡、咸菜、瓜果、面粉等物品。

日军三次占领寿张城，给寿张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损失之大，是难以估量的。

第三节 寿张沦陷后的局势

1939 年寿张沦陷后，境内一片混乱，一时出现三方势力割据的局面。日伪军占据县城周围和公路沿线；中共寿张党组织面对日军入侵，人民罹难，毅然领导人民在黄河以南开展抗日活动，后扩展到黄河北岸清水河、裴城寺一带，其武装力量主要活动在县境南部；寿张县国民党流亡政府及其所属武装先后占据夹河、打渔陈乡东影唐一带和侯庙西部的何庄等村，后又招集国民党部队冯寿彭、齐子修残部及散兵游勇，扩建武装，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他们忠实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妥协，有的暗中与日伪勾结，破坏抗日；封建地主为了维护其利益，成立民团，横征暴敛，敲诈人民。此外，境内土匪乘机四起，兴风作浪，活动猖狂，危害人民较深的有啸聚县境西部和西南部的于其水、王廷怀、李建邦、孟召存等一伙，还

有袁寿山部(后接受共产党改编抗日),他们到处抢掠财物,骚扰百姓,有的打着抗日的旗号进村催粮逼款,有的小股土匪“牵牛架户”、“指户喊项”,祸殃百姓。帝国主义的洋教会和封建帮会势力也一时骤起,他们利用各种宗教进行反动宣传,干扰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活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在日、伪、顽、匪和封建势力的夹击之中,处境十分艰难。

第四节 日伪侵占寿张初期的野蛮统治

日军占领寿张县城后,贯彻“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政策,大肆宣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联合反苏反共”……企图用怀柔和恐怖相结合的办法,巩固在寿张县的统治。他们首先联合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物色收买忠实汉奸,建立伪组织机构和伪武装,成立维持会,帮助其统治寿张人民。地方土绅李希先任维持会会长,不久李被杀,由兵痞出身的沈广训继任会长。接着建立伪县公署,由山东省伪政府省长唐社委任汉奸李兴朋任伪县长,下设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四个科及仓库处、经理处(支应局)、商会、政务警、看守所、兵房、竹房。其所属人员大部是愿当汉奸的旧政府人员,有搜刮统治人民的经验。另外,日伪还建立了一些特务组织:(1)公安局(警察局),下设特务系、保安系、警务系,每区设一分所,有警士和剿共班。(2)新民会,专搞反共宣传,替日本进行奴化思想教育。日军在扶持建立伪政权的同时,建立了伪县警备

大队,先后下设 17 个中队,盛时达到 2000 余人,沈广训任伪警备大队副队长, 后任伪县长兼警备大队长。日军司令部又单设日军宪兵队,负责监督伪军政人员。日军司令部是县里的太上皇。伪县公署设日军顾问,伪警备队设日军指挥官翻译官。

1940 年,日军为了“强化治安”,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连保连坐法。即 一个人与共产党有联系,本甲内其他人也犯“连坐罪”。同时,县下设区,区下设乡,乡下设保(一般以村为单位),保里分甲(一般十户为甲),各单位各有长,多是日军走狗充任。他们“狗仗人势”,欺压群众,有自己的爪牙武装,区有区队,乡有乡兵,保长也有打手。凡敌占区群众不分男女,逐村调查、登记户口,每人都要照相,按手印发给身份证明书,这就是所谓“良民证”。没有“良民证”,不能在日伪统治区通行,被日伪军查着,轻的受刑坐牢,重的是被砍头。抗日军政人员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日军还积极收罗土匪、地痞流氓,按乡要兵,定期训练,成立农村自治人员训练班,培养基层汉奸骨干,扩大其统治力量。如在 1940 年,日军给费楼乡要人 6 名,地痞流氓徐金峰、吴兴仁等都当了汉奸,土匪流氓赵连生、张造领、徐登兴、刘亥芝等都参加了剿共班。他们充当地下指挥,搜集抗日活动情报,绑架抗日干部,无恶不作。

日军除了用官职金钱引诱外,对地方有影响的土绅人物还“聘请”充当汉奸。对其中有民族感、有影响力且不愿参加日伪政权的地方人物,都进行登记调查,监督其活动,进行百般迫害,或者逮捕下狱,或者借故杀害。

日伪政权的思想核心是“新民主主义”，名曰“新民”，实则复古，在思想上倒退到封建主义。他们大力提倡所谓的“东方文化”，讲所谓“尊孔尊儒、忠信礼教”、“中日亲善、共同防共”、“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中日满提携”、“建设王道乐土”等，大力宣扬卖国投降主义。他们通过“宣传班”、“新民会”进行投降卖国、歌颂日军的奴化宣传，借以迷惑群众，瓦解群众的抗日决心和信心。他们大办奴化教育，到处设立伪新民小学。小学普遍设有修身科（政治科）；高小普设日语，开设经书。他们在学校里向学生大讲“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

日军在占领区还建立了一套汉奸组织，培植了汉奸力量，用“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策略来统治。他们经常向百姓要物，要粮，滥加摊派，加紧搜刮，大肆掠夺，以充实侵略战争的财力、物力和给养。他们还不时进行清乡和扫荡，大修公路，安据点，实行法西斯统治。

1940年9月，日军由寿张城到根据地马楼、清水河一带“扫荡”，返回时，闯进玉皇岭村，将群众赶到晒场里，逼审“谁是共产党员？”后抓走村民孙学周、王安吉、杜宣凤等7名所谓八路军嫌疑人，令其趴在地上任意踏来踏去，后剥光衣服，四肢绑起，仰面倒悬吊在树上，下面燃起大火，烧得浑身流油，惨叫不止。是日傍晚，日军返城时行至张庄村，将这7名村民砍头。

1941年5月22日，日军抓来4名无辜壮年农民，绑在县城西门外4根木柱上，当做练兵刺杀的靶子。4个凶残的日军士兵站在10

丈远的一条线上，听到指挥口令，猛窜上去“哩哩”两声，端起明晃晃的刺刀，刺入这4名中国同胞的胸膛，后又将刺刀抽出，插进水里涮去鲜血，反复轮刺，惨无人道。

第五节 县、区委和县、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

一、中共寿张县、区委和县、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

1939年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代理师长陈光，率领师直属队和三四三旅六八六团组成的东进支队，挺进鲁西，创建抗日根据地。3月1日抵达鄆城地区。3月4日，一举攻克郛城县樊坝据点，活捉伪县长刘本功的弟弟、伪军团长刘玉胜以下50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战马20匹，解救被关押村干部20人和被蹂躏妇女30人。这是八路军正规部队到鲁西地区的第一次战斗，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随后，杨勇率六八六团在黄河两岸坚持抗日斗争，极大地促进了寿张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根据形势的迅猛发展，1939年6月，鲁西二地委决定建立寿（张）阳（谷）东（平）边区县委，徐坤任书记，阎士光任副书记，组织部长张绍虞（张朝云），宣传部长杨岗。7月，边区县委撤销。7月底，杨勇率部在梁山围歼日军三十二师团一个大队，击毙日军少佐大队长田敏江以下300余人，俘日军24人。八路军威望空前高涨。为加强党对寿张抗日工作的领导，上级党委决定成立寿张县委，在寿张一带开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7月，在中共运西地委和八路

军杨勇部六八六团的支持下,于黄河南唐坊村成立了中共寿张县委员会(对外称政工室),隶属中共鲁西二地委(运西),徐坤任书记兼组织部长,杨岗任宣传部长,马达任民运部长,郭少川、王珏为委员。

为落实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1939年8月1日,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杨勇在寿张县黄河南碌碡庙村(今属梁山县)主持召开士绅名流和乡村代表会议,成立了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并一致推选四区较有声望、抗日坚决的知识分子杨朴民(启煌)为县长,一一五师民运部干部郭少川任秘书(一年后任县长),鲁西区党委下派干部王珏任动委会主任。县抗日民主政府是按党的统战政策“三三制”原则组建的。从县政府组建情况看,共产党人数少于三分之一,无党派、民主人士均占三分之一,是以少数共产党员为领导骨干,多数是积极抗日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政权。抗日民主政府下设5个科。一科(民政)科长杨瞻鲁、二科(财政)科长何杰、三科(建设)科长张振国、四科(教育)科长陈克己、五科(司法)科长崔义斋。后增设交通局,局长李震;公安局,局长赵新亭;供销合作社,主任张尧阶。每科局有干事2-5人。在5个科的领导干部中,只有1名科长是共产党员,其余4个科长都是忠实于抗日事业的人士。

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除三区(夹河一带)于6月率先建立抗日政权和武装区队之外,其它各区先后建立区委或区抗日民主政府。其中,四、五、六、八4个区在黄河南,一、二、三、七4个区在黄河北(今属台前境内)。当时,县境一、二、三、七4个区除

一区（县城附近）北部是敌占区外，其余均为根据地和游击区。

1939年9月，中共寿张县城关工作委员会成立，张传伦任书记，后于1942年10月改为寿张县一区委员会。1940年春，中共寿张二区（侯庙）委员会成立，崔影任书记；中共寿张七区（清水河）委员会成立，由崔影兼任书记。当时，三区（夹河）未建区委。

1940年3月，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开辟黄河北抗日根据地，在寿张城南（陈楼、毛河一带）建立了第一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于清源，后由周跃西（代理1941.6~1941.7）、于俊峰（1941.8~1943.10）、李景（1943.10~1943.11）、赵凤生（1943.11~1944.春）、刘玉清（1944.春~1945.8）先后接任。

1939年春，日军侵占寿张县城，国民党地方政权土崩瓦解，名存实亡。中共党员张立亚受组织委派进入国民党二区政府，开展夺取改造二区政权、掌握二区武装的工作。是年冬，在寿张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寿张第二区（侯庙）抗日民主政府。区长李潘林，后由侯杰（1940.夏~1940.冬）、徐波（1940.冬~1941.春）、王鲁光（1941.春~1945.8）先后接任。

“七七”事变后，姜德和和杨朝炳等在寿张、阳谷、东阿三县交界（夹河套）处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9年冬，在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的支持下，民选成立了寿张第三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姜德和，后由孔庆恒（1940.10~1941.6）接任。1941年6月，该区划归了张秋县。

1939年夏秋之季，共产党员杨萃民、王子典和于俊峰受党组织

委托，进入国民党阳谷县六区作抗日争取工作。1940年春，争取该区区队参加抗日政府。在此基础上，经地委批准，成立了寿张县第七区（清水河）抗日民主政府，区长李执在，后由徐波（1941.初~1942.初）、王正霆（1942.初~1945.1）、邵立群（1945.1~1945.3）、杨杰三（1945.3~1945.夏）、王子典（1945.夏~1945.8）先后接任。

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及区委和区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积极发展党组织，建立基层政权，组建地方武装，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等工作。

二、中共张秋县、区委，县、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

1941年6月，鲁西区党委为加强对东阿、阳谷、寿张三县交界地区的领导，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在三县交界之寿张三区、阳谷五区、东阿二区组建张秋县，并建立了中共张秋县工作委员会和张秋县抗日民主政府，夏仲远任县工委书记兼县长。9月，工委改称为县委，由王化云任县委书记。1941年6月至1945年8月，张秋县辖6个区，其中三区（夹河）、五区（打渔陈）现属台前县。抗日战争期间，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驻郑三里村（今属台前县吴坝乡）。张秋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和组织动员群众抗日救国，并迅速建立健全了县、区、村三级抗日政权。

1941年6月，三区（夹河）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谢惠玉（1941.6~1943.6）任区长，后由周子臣（1945.春~1945.8）接任。1941年9月，三区区委建立，刘云清任区委书记，后由徐刚（1944.夏~1945.5）、刘传友（1945.5~1945.8）先后接任。

1941年6月，五区（打渔陈）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林宪楷（1941.6~1942.9）任区长，后由伍九真（1944.冬~1945.8）接任。1941年9月，五区区委建立，崔康（1941.9~1942.10）兼任区委书记，后由伍合明（1944.冬~1945.8）接任。

从此，台前东境成为张秋县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节 创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

1939年3月，寿张县城沦陷。寿张县内党组织配合八路军着手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6月，三区率先建立抗日政权和武装区队，主要活动于夹河一带。七、八月份先后建立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全县6个（一、二、三、四、五、六）区政府迅速建立起来，其中一、二、三区在黄河北岸（今台前县境）。梁山战斗大捷后，八路军威望空前提高。全县各级党组织趁机广泛宣传党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抗日主张，组织地主士绅捐款支援抗战，并分别组建抗日武装——县政府警卫连和各区队。根据中共鲁西区党委关于创建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决定，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首先把黄河南岸的三个区作为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重点，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依靠群众，实行民兵联防，打击土匪和伪顽势力。是年冬，全县范围内开展改造地形和破路运动，为配合八路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创造条件。

1940年春，县各界抗日救国会纷纷成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县抗日民主政府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及为贫雇农增资

等政策，改善民众生活，调动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的热情，根据地建设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6月，黄河南岸3个区建立健全了乡村两级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此后，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开始向黄河北岸辖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至7月份，黄河北岸的一、二、三、七4个区先后建立了区委和区抗日民主政府及其领导下的群众抗日团体等。随之，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改造村级政权，发展农村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等工作。9月，八路军一部两次围攻并最后拔掉敌伪张楼据点，黄河北岸4个区的根据地迅速扩大。10月，县抗日民主政府配合八路军设计铲除活动于境内黄河以北县城以南势力较强的反动地方武装——“九团”，巩固了黄河以北4个区的根据地。随之，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从黄河南岸移到北岸二区和七区，抗日斗争活动逼近县城，全县抗日根据地开始进入兴盛时期。

八路军九团常在台前境西南二、七区活动。在主力部队时常驻扎的情况下，寿张县独立营和各区区队，常常逼近县城和耿王楼敌据点活动，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敌人被孤立寿张县城、耿王楼和梁山三个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全县根据地连成一片，约占全县面积的70%多，征收公粮面积将近100%。这一大好形势保持到1941年5月。

寿张县在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过程中，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各项建设工作，做得是比较好的，发动群众比较充分，群众的思想觉悟提高较快，抗日根据地建设有了较强的群众基础。

第七节 党组织的发展、整顿和巩固

193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中共寿张各级地方组织根据《决定》要求，在学校、农村积极发展党员。特别是1939年3~9月，随着形势的变化，采取了突击发展的方式，全县党员的数量大量增加，到1940年10月发展到451人。在共产党员中，贫农成份占多数，不识字的占多数，其次是中农成份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当时，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与日伪顽军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残酷，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对每一个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严峻的考验，即个人要下决心，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不怕牺牲全家的利益。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多数党员，尤其是老党员，不畏残暴的敌人，不怕困难，不怕流血牺牲，在宣传抗日，组织各类抗日群众团体，建立自卫队，动员青年参军等方面，起了骨干作用。但是，由于相当一部分时期入党的党员缺乏建党工作经验，工作做的不细，把一些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政治上不坚定的人、极少数投机分子和个别阶级异己分子也发展成了党员，造成了党的队伍思想不纯、组织不纯。

1939年8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党在短时期内迅速发展，党的组织很不巩固。除个别地区外，一般应停止发展，以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同年10月，中共鲁西区党委就进行巩固党的工作作了具体

部署。寿张县委根据鲁西区党委的指示，为纯洁党的队伍，进行党的组织整顿，清除了一些不合格的党员。但是由于对《决定》的指示精神理解不够深刻，再加上调整区划，对敌作战频繁，致使这项工作进行缓慢。

1940年2月，运西地委在党委二次扩大会议上，重新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各地党委把巩固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不久，区党委又召开组织部长联席会，进一步部署了巩固党的工作。要求在一年时间内，进行审干，整顿各级党组织，加强党员工作，以达到巩固党的目的。1940年春，由地委书记申云浦、地委副书记万里主持，召开了由全区各县委组织部长参加的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全区巩固党的计划和措施，要求各地采取巩固党和根据地建设相结合、审查干部和整顿党的组织相结合、巩固党和发展相结合的办法，扎扎实实地搞好巩固党的工作。

根据以上指示精神，寿张县委全面开展整顿党的组织工作。

1、审干工作。在审查中，规定了三级审定、两级了解的办法，即区以上的干部要填表并写自传，上级机关审查后作出鉴定意见，同级干部之间开展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再到下级组织中去征求全体党员的意见。对于干部状况，县委了解到中心支部，区委了解到所属区的支部委员，支部党小组了解到所属党员。对于各级干部，要了解其年龄、籍贯、党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在各种环境中的思想工作表现、工作的优缺点等。通过审干，弄清了全县党员干部的基本情况，发现了一批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同时，发现了存在

的以下问题：干部的素质较差，大部分干部政策、理论联系实际水平较低，不能完全适应工作的需要，执行政策往往左右摇摆；许多新党员入党不久就担任领导工作，缺乏领导工作经验，工作能力弱；有些党员参加过会道门或反动组织没向组织交待；极少数党员经不起残酷斗争的考验，面对强敌发生动摇或逃跑，甚至有的被捕后叛变投敌。审干后期，县委对不适合做领导工作的党员进行了处理。并且取消了一批不合格党员的资格。审干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艰苦工作，遵守纪律，作风正派，是坚持抗日斗争坚强的骨干力量。

2、整顿基层党支部。这项工作是在1940年9月以后在全县陆续展开的。要求党的支部经过整顿达到的标准是：支部领导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按期开会、按时交纳党费、保守党的秘密等）；建立“四位一体”（即关心全村工作，推行进步法令，领导群众斗争，动员、组织参军参战）工作机制。整顿支部的方法是：组织党员学习《怎样做支部工作》和《怎样做共产党员》等教材，使党员了解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党员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遵守党的纪律；发展贫农入党，改变有些地方中农出身的党员占优势的状况；轮训支部书记，提高其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通过整顿支部，解散了被地主、富农操纵的支部，清除了一些不够条件的党员，基本解决了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阶级觉悟低、思想落后、宗教观念等思想作风问题，改进、加强了支部工作，提高了支部的战斗力和战斗力。

3、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在巩固党组织工作的中后期，

中共寿张县委采取在职学习和集中培训等方法，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举办党员训练班，对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进行培训。学习的文件主要有《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辩证唯物主义》、《论新阶段》、《党的建设》、《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基本政策》等。一般党员学习的主要文件有：《党员基本知识读本》、《支部工作》、《怎样发展党员》、《三大进步法令》（保证人权、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通过学习，使全县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普遍受到一次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党的路线政策的教育，分清了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界限，认清了党的性质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树立了持久抗战的思想，增强了政策观念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到1941年上半年，全县巩固党的工作基本结束。通过上述工作，使全县党员的阶级观点、政治觉悟、党的观念、纪律观点、保密观点和政策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党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同时，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以及以后在严酷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都起了重要作用。

第八节 组建抗日武装

1939年8月上旬，中共鲁西区党委在寿张东南小安山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创建平原游击根据地的问题，罗荣桓参加会议并作报告，他详细阐述了在鲁西创建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平

原虽无山地作屏障，但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抵御日本侵略者的人山人海，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只要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认真改造地形，创造和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就是可行的。”会议作出了创建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决定。

根据会议精神，鲁西区所属各县都开始筹建抗日武装。寿张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随之发动群众收集民间枪支，建立县独立营，下设3个连，共计300人，营长由杨朴民兼任，柴玉华为副营长，教导员史芳亭。独立营配合杨勇的六八六团，经常到黄河北游击区、敌占区打击日伪军。1942年初，改称县大队。1943年10月并入冀鲁豫军区抗日三支队。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还建立了黄河以南四、五、六区区队。并在此基础上组建县政府警卫连，连长许子善，副连长董杰轩，计100余人，树立了抗日斗争的大旗，进一步巩固了县境黄河南岸的抗日根据地。

随着黄河北岸寿张一、二、三、七区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各区先后组建了区队武装。1939年12月，三区抗日民主政府在夹河田湾成立，并组建了区队，区长姜德和兼任区队长，玄鹊桥任区队副，杨朝炳任动委会主任。三个月后，三区队拥有长枪100支、短枪10支。1940年3月底，三区队联合阳谷、东阿两县中共地方武装，打垮蚕食抗日三区的地痞、流氓葛泮芹的武装100余人。随后，杨勇所部一个连北渡黄河，于田湾一带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国民党三区区长马卓，至此国民党势力撤出夹河套一带。同时，杨勇、何德全率部到岱庙、河西一带活动，在地下党员颜华的联络下，改编了郑三里村郑

丹亭、郑海峰的地主武装。1940年2月，县委书记徐坤被捕，解往济南后被杀害。季丕显任县委书记继续领导人民抗战，把工作重点放在扩建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经过艰苦努力，不久，在清水河、马楼一带成立寿张县抗日第七区队。共产党员杨萃民、王子典、于峻峰等人做通原国民党区长张俊业的思想工作，将原区队40余人改编为抗日区队，同时，建立区抗日民主政府。后在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寿张、阳谷、东阿三县交界的张秋一带，建立三县办事处和三县基干大队，王作任主任、杨朝炳任大队长兼政委。同年10月，杨勇派人到寿张、阳谷一带扩军，在姜德和的帮助下，扩军30余人，组建寿、阳、东三县保安队，后改为张秋县警卫连。是月，杨朝炳协助杨勇部队建立聊、阳、阿三县独立营，并进行了扩充，张秋县建立后，编为张秋县独立营。1941年寿、阳、东三县基干大队改建为独立营，杨朝炳任营长，队伍很快发展到500余人枪，驰骋于寿张、阳谷、东阿三县，不断攻破日伪据点，收复大片土地。

第九节 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寿张县抗日政权建立后，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大力支持下，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宣传、动员、组织全县各阶层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共同抗日，各抗日团体应运而生，筑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抗日的“钢铁长城”。

1939年秋，寿张县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在县境南部

成立，赵镜如任主任。1941年6月，成立张秋县抗日青年救国会。（1948年2月，青救会改为青年工作委员会。青救会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动员鼓励青年参军上前线。1949年，青年工作委员会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39年8月，寿张县委为动员民众抗战，倡导成立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员会），王珏任主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会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参加抗战。

1939年8月，寿张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妇救会）成立，由路宾担任主任，1940年夏由张露接任。1941年6月，张秋县妇救会成立。随后，两县辖各区和村也先后成立妇救会。妇救会是由年满16岁以上的妇女组成的，不分阶层、党派、民族、职业、宗教信仰，只要赞成抗日，都可以自愿参加。其任务是：做军鞋，磨军粮，拥军支前，救护伤员，保护干部，传递信件和情报，送郎参军，参加反奸除霸、减租减息等各项政治运动；保护妇女利益，动员妇女剪发、放足，反对虐待妇女、买卖婚姻、童养媳等恶俗；组织妇女参加识字学习班，学习文化。抗日战争时期，妇救会工作热火朝天，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寿张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于1945年冬改为县妇女救国会，1949年春，改为民主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

在妇救会成立的同时，各村12—16岁的姑娘，组成姊妹团，负责站岗放哨、查路条、送情报、捉汉奸等任务，并积极参加识字班。

抗日战争时期，寿张县各村普遍成立儿童团。团内设正副团长2—3人，下设委员若干人，团以下设营、连、排、班。营设正副营

长2—3人、教导员1人。连设正副连长各1人，下有排长、班长。除地主、富农子弟外，广大儿童都加入了儿童团，其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监视地主、富农的活动，给八路军带路送信，拥军优属，编唱革命歌曲，宣传党的政策和法令等。他们还积极参加反奸、反特和民主民生等政治斗争。当时流传歌谣“不怕敌人来进攻，我们小孩是英雄，带着部队去打仗，打得鬼子乱哄哄”、“儿童团员不简单，站岗放哨用着枪，打鬼子、捉汉奸，每次都是俺占先”。

在这一时期，全县各级党组织还组织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救会）、自卫队等群众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农救会主要负责筹集粮种、磨面、碾米、送军粮等任务。

1940年6月，县境南部的抗日活动向黄河北扩展，随着黄河北各区委和抗日区政府的建立，各区也相继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和民兵组织，抗日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也由黄河南迁往黄河北的马楼、清水河乡一带（曾驻棘针园、黄那里等村）。抗日形势发展很快，黄河南北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干部纪登、黄文曾来一、二、七区（台前境王集村）总结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

1940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统一领导和组织社会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改为抗日群众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于耀任主任。

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之后，通过学习冲破了封建主义的种种枷锁，爱国主义思想空前高涨。他们在党的领导下，锄汉奸，杀鬼子，

在险恶情况下，不惜牺牲自己，保护抗日党、政、军人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抬担架、送公粮支援抗日战争等模范事迹大量涌现。“人心齐泰山移”，人民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克服各种困难，要粮有粮、要枪有枪、要人有人，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第十节 实行合理负担,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抗战前夕,地主阶级仍继续沿用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关系剥削农民,主要是通过租佃形式,其次是雇佣形式。不管是租佃形式还是雇佣形式,都是超经济压榨。地主阶级还通过高利贷剥削贫苦农民。当时,台前一带农村流行着这样的歌谣:“农民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要调动广大贫苦农民支持抗战,就必须减轻他们所受的剥削和压榨,改善他们的生活。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要求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其中规定,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改善农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尽管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开展得不普遍、不深入、对封建剥削制度触动不大,但却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

为了激发农民的抗日积极性,维护农民利益,保障抗日根据地军需供应,1940年春,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全民抗战方针,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

从社会各阶层经济实力出发，开展以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斗争。首先在未被日军占领的四、五、六区开展，1941年后扩展到一、二、三、七区。合理负担的主要内容是：按土地亩数征公粮，贫苦农民不负担或少负担，地主、富农多负担。主要措施是：发动群众，登记土地，土地搞清楚后，按抗日民主政府制定的政策交纳公粮，即每人平均1亩地的，不交公粮；每人平均4亩的，扣1亩，交3亩地的公粮；每人平均5至7亩地的，扣除1亩外，每亩交1.2亩地的公粮；每人平均8至10亩地的，扣除1亩外，每亩交1.5亩地的公粮；每人平均11亩地以上的，扣除一亩外，每亩交2亩地的公粮。这样既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又保证了军需供给。其次，在实行合理负担的基础上，开展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政策规定实行“二五减租，一分减息”，即从本政策实行前三年算起，地主每收入1石粮食要退还佃户2.5斗，今后每收入1石粮食，地主在原分配基础上给佃户增加2.5%。此外，给部分雇工增加了工资。

1941年6月，县长郭少川在清水河召开由全县雇工、佃户、贫困农民、区乡干部参加的大会，鼓励群众按照政策开展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强调限制地主高利盘剥，借债利率减到一分。与会500余人群情激奋。会后，各区、乡、村组织雇工、佃户与地主订立合同。地主按政府规定收租，不能任意剥削，不能打骂虐待佃户。

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的开展，保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增加了农民收入，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减少了部分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也未损害地富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巩固和发

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寿张县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畜牧林业，实行严厉禁止屠杀牲畜、禁止耕牛出境和奖励牲畜繁殖政策，并规定繁殖一头牲口，政府奖励1元；提倡每人养一口猪，使畜牧业得到大的发展。在发展林业生产方面，政府号召每人种一棵树，并大力组织民众在黄河两岸的沙地上植树，从而既增加了森林的面积，又改良了土地。同时，推广玉米、谷子等农作物优良品种，提倡植棉、植树造林和种菜。寿张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关心群众生产的实际行动，密切了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第十一节 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日、伪、顽

1939年2月底，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部队挺进鲁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寿张各级党组织在主力部队的支持下，团结全县一切爱国力量，勇敢地担负起领导抗战的历史重任，把中心工作转向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创建抗日根据地。他们拔据点、杀鬼子、打汉奸，反“扫荡”，广大人民群众在困境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逐步树立和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寿张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坚决贯彻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

则，设计铲除了反动地主武装——“九团”，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准备了条件。

一、打顽军

1939年7月，杨勇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在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于梁山黑虎庙成立一一五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治委员。独立旅成立后，根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在阳谷、台前一带将地方顽军齐子修部打跑，尔后在梁山附近赶跑了冯寿彭部。

1940年2月19日，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旅和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六支队各一部，在寿张、张秋一带歼灭国民党顽军高树勋部第13旅计1000余人。

二、姜庄反击战

1940年3月1日，日伪军300余人进犯三区姜庄（今属夹河乡），放火烧毁民房200余间。武委会主任杨朝炳带区队反击，因日伪军势众，三区区长姜德和奔往黄河东杨勇部报信，带八路军一部增援，实施两面夹击，日伪军溃退到临黄堤交通壕内，次日黎明仓惶逃回县城。

三、拔除张楼伪据点

1940年夏天，入侵聊城专署的日军大中指挥官，带领1千多名日军与汉奸中队长李井开、小队长沈广训的400名汉奸，开始向二区抗日根据地“蚕食”，并侵占张楼村。日伪军用皮鞭毒打群众，抢占民房，拔树木，推墙，强迫群众修碉堡。被拆房子的农民，无家可归，在倒塌的残屋旁，卧地而眠，猪、羊、鸡、鸭被吃得精光，粮食米面

被抢掠一空。此时，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张凤蛾用爱国道理说服伪区长甄宏勋把张楼据点的情报图交给了冀鲁豫军区第二分区。第二军分区经过研究，决定派已到黄河北帮助开辟一、二、七区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三旅第九团，在团长何光宇的领导下，担负起光复张楼的任务。8月16日夜间，何光宇率领九团1千余人把张楼据点重重包围，九团突击队员在南门外大声喊叫：“都是中国人，缴枪不杀！”驻守该据点的伪区队起义，并主动打开其防御的一个寨门，一阵激烈的枪声过后，其余的寨门也被攻下，八路军胜利地冲破了第一道寨墙。这时，被共产党策反的伪义和乡乡长王金松、和平乡乡长李长军、共和乡乡长赵朝海带领3个乡的民工赶到，他们抬伤员，扒寨墙，配合八路军作战。日军凭碉堡工事坚固和有利位置，集中火力还击。八路军武器不好，一时没有攻下。天刚黎明，寿张县大队赶来助战。八路军根据游击战术的特点，主动撤出。一夜战斗，共缴获日伪军500支枪，俘伪军600多人，经教育后全部释放。张楼据点遭重创一个月后，日伪军气急败坏地实施报复，在大中指挥官的带领下与沈广训的汉奸队再次到张楼讨伐，在附近农村抓万余民工，修寨墙，修炮楼，加高加宽，并在村外挖了两道宽约1.5丈、深约2丈的寨河。伪区长李克顺借修筑碉堡为名，横征暴敛，索取钱财。日军大中指挥官由于害怕人民的力量，张楼碉堡还没有完全竣工，便扔下20个日军，自己带领大队日军偷偷地逃回县城里。地下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个情况报告第二分区，八路军九团再次受命，于9月的一天夜里，在何光宇的带领下，包围碉堡，经过1小时激战，据守外围的伪汉奸小队

全部被击垮。八路军把敌伪司令部的墙壁挖透，采用火攻，烧死 20 多名负隅顽抗的日军和汉奸。这次战斗，共缴获日军机枪 10 挺，毙敌 40 多人，俘虏 400 余人，击退前来支援的日伪军 600 余人，缴获日军小钢炮一门。这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民心，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所散布“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谬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进一步在台前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在军民、党群关系上，空前密切。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侯庙爱国青年参加八路军的有 395 名之多。同时，日军经过这次激烈的战斗，被八路军和群众痛击得胆战心惊，被迫退到十里之外的耿王楼村按据点，不再敢轻易地进犯我抗日根据地。

四、汪庄阻击战

1940 年 8 月 23 日，驻聊城日军 180 人，纠集茌平、堂邑、莘县等地伪军计 1200 余人，到寿张、张秋一带围剿八路军。其中，一部进犯打渔陈汪庄。该村时为八路军七团一营驻地，一营得知情报后，留一个连阻击日军，其余撤走。阻击部队隐蔽于路边蓖麻棵下和临时挖的工事里。下午，日军官 3 人骑着高头大马，率领大队伪军，打着“太阳旗”，拖着炮车，逼近汪庄。当敌人进入埋伏圈后，八路军特级射手将 3 个日本军官同时击毙，敌军大乱，仓惶应战，组织三次反击，均被八路军击退。随后，日伪军从西、北、南三面包抄八路军，并用重机枪在村西南场里封锁路口，八路军坚持战斗 3 小时后，向东南撤退，突围时有 10 名战士因敌人重机枪扫射而光荣牺牲。此次战斗，共毙日伪军 32 人。

五、丁桥阻击战

1940年9月，县警卫连200多人和三区队在县城东丁桥击退了汉奸沈广训率领“扫荡”的300多名伪军，保证了秋收。

六、铲除地主武装——“联防九团”

韩复榘统治山东时期，台前一带的封建地主为镇压人民的反抗，纷纷组织民团。县城南（今台前境）成立了联防总团，下设9个分团，号称“九团”。九团占据白岭、张庄以南，大寺张、陈楼、黄那里以东，孙口、官路以西几十个村庄，拥有步枪1000余支、机枪17挺，有较强的实力。其成员多属地痞流氓、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的家卒。寿张县城沦陷后，“九团”依附于日本侵略军，与共产党为敌，破坏抗日，不准八路军进驻“九团”所在的村庄，拒交抗日公粮，并不时地骚扰我抗日根据地，绑架和杀害抗日军民，成为共产党开辟一、二、七区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障碍。

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多次派人与其联系，耐心劝其共同抗日，该团表面应付，暗地里继续与日伪同流合污，破坏抗日工作，坚持与人民为敌。因此，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彻底解除“九团”，消灭这股反动势力。报请上级批准后，立即制订了战斗方案。

1940年10月13日上午，县长郭少川在马楼黄那里村以会议和“宴请”民团头目为名，举行招待会。当民团大小头目到场后，二十二岁的郭少川铿锵有力地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袖手旁观啊。”“局势嘛，很清楚——日军压境，八路军坚决抗战。我一一五师深入敌后，樊坝、梁山两次战

斗，歼敌千余人。在胜利的鼓舞下，全县军民群情激昂，最后胜利一定是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固然有飞机大炮，我们的破枪照样能把他们赶出去！”郭少川压低嗓门怒斥道：“日军侵我中华，杀我同胞，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谁无父母，谁无姐妹？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是不能容忍的！”他手拍桌子大声责骂：“可是就有这样一伙人，他们宁愿拜倒在敌人的脚下，手拿日本人屠刀，杀害我同胞，他们是民族的败类、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今天把你们请来，就是给你们讲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枪的出枪，争取你们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在共产党领导下整编队伍。……”随后，郭少川郑重宣布：“反动民团一贯破坏抗日，顽固不化。我代表寿张县抗日政府宣布，将你们立即逮捕”。几个亡命之徒还没来得及还手反抗，就被埋伏的武工队员和警卫连战士上了绑，九团的大小头目除李金铭一人漏网外，全部被捕。

中午时分，这伙顽固分子被押送到审判会场。郭少川宣布了“九团”团首的罪行，并号召全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日斗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根据人民的要求，立即枪决了吕怀修、刘凤琴等四名罪大恶极的团首领，布告宣布他们的罪行。对包括团总岳崇瑞在内的其他大小头目，采取教育、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分团长以下的小头目和持枪人员，只要交出武器就既往不咎。岳崇瑞等人写了悔过书，愿意站在人民的一边进行抗日。整个会场欢声雷动，到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下午，反动民团武装闻讯赶来，妄图救回他们的首领。当这帮匪

徒冲到前赵一带时，正好进入八路军教导三旅第九团和县独立营的伏击圈。何光宇团长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齐开火，不到10分钟功夫，匪徒们被打的焦头烂额，抱头鼠窜。八路军紧接着捕捉俘虏，收缴了“九团”的全部枪支。其中，机枪一挺、长短枪500余枝。铲除“九团”，壮大了县独立营和一、二、七区区队，使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联成一片，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群众抗日情绪普遍高涨，抗日武装活动直逼县城下，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到距县城三、五里的村庄进行工作，甚至敌占区伪军政人员也给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送粮送款，派代表联系，赞成抗日。在此形势下，县委的工作重点开始由黄河南移至黄河北地区，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也从黄河南岸移到北岸二、七区，全县抗日根据地进入兴盛时期。

在瓦解“九团”的过程中，由于八路军和县抗日民主政府打击镇压准确有力，争取教育深入有效，取得很好的效果，八路军无伤亡。主要工作经验是：在军事压力下，对敌进行分化瓦解，贯彻执行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总团长岳崇瑞感激抗日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表示要为抗日政府做些有益的事。此后，他和他的儿子岳修芝成了抗日民主政府的统战对象，并进而成为一区统一战线中的代表人物。当一区再次全部沦为敌占区，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他们父子帮助抗日民主政府在伪组织中做了不少工作。如帮助区抗日民主政府掌握伪乡政权，征收公粮，应付敌人，减轻人民的负担。并大力营救了两个被捕的区干部，免遭敌人杀害。县委敌工部通过岳修芝说服教育了两个伪军中队长，争取他们抗日，建立了关系。这是

我党从实际出发，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的结果。

第十二节 抗战初期城区内党的地下工作

日军占领寿张县城后，共产党除进行外围斗争外，还开展了城区斗争。

1939年6月，日军占领寿张后，城区共产党人的抗日活动转入地下。面临日军重兵压境，“亡国论”甚嚣尘上的严重局势，党组织勇敢地树起抗日斗争旗帜，秘密印发抗日传单，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宣传战场上中国军队战胜日军的消息，以振起敌占区广大人民群众抗日信心，同时揭露日伪的残暴行为，以激励人民的抗战爱国热忱，树立群众抗日的决心和必胜信心。为坚持城区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抗日斗争，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并对其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打击”的指示精神，党组织在寿张县城东关张传伦家召开一次秘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在沦陷区开展抗日活动，必须全部转入地下，决定派部分坚定的共产党员打入敌伪组织内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会后，共产党员陈永嘉、曹华亭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王玉振以做货郎为掩护，姚义元等人以做小买卖为掩护，开始在敌占区开展地下斗争。当时，县城是日伪统治的大本营，中共地下党员赵西祥等人打入伪公署征粮处开展革命活动。日伪政权建立后，推行“保甲制度”，印发“良民证”，限制抗日军民进城活动，百姓出入县城，需持证接受检查。赵

西祥等人通过关系在警察所内搞出假“良民证”，上面印有相片，也有钢印及伪警察所专章，所填姓名、籍贯都是假的。这样，敌工干部只要不带枪支、文件，就可以在敌占区自由出入。当时，共产党员李健民不断进城活动，杨萃民也经常到县城附近活动。敌工部长李哲曾在地下共产党员陪同下，到县城附近的前三里村陈永嘉家布置地下斗争。另外，通过地下工作，伪组织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员日益增多。伪区长、伪乡长不少人掩护过抗日军、政干部。伪一区长王凤山曾掩护过张秋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柏洁民，伪影唐乡长马绪方曾掩护过寿张县委、敌工部副部长戴德。大地主、士绅蔡如清也掩护过敌工部长李哲，并为其完成搜集情报的任务。这样以来，敌人的“保甲制度”所起的作用也就十分有限。中共地下党员还利用打入伪财委会所掌握的权力控制伪军活动，伪军兵工为制造手榴弹，多次向财委会要钱购买药料，地下党员打着财委的招牌，经常以缺钱为借口不拨经费，使他们仅能维持生活，无法制造武器，被迫停产。

抗战初期的地下党组织象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地下党员都表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他们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和指示，不怕流血，不畏艰险，兢兢业业，在虎穴里斗争。1940年，地下党员曹华亭被日伪宪兵队逮捕，受尽酷刑，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和密秘，后又打入伪军任中队副，坚持地下斗争。寿张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徐继颜被俘后奉命打入伪军中队并发展6名党员。他被日伪逮捕后，受尽百般拷问，没给敌人吐一句真情，没暴露党的一点秘密，后被押解济南就义于千佛山下。朱汉三、石磊、周跃西、李景等五位共产党员被捕后受尽非

刑，威武不屈，亦丝毫没有暴露地下党组织。

第十三节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工作

一 财政经济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的财政经济工作，是党政军各界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不仅是供给问题，而且是抗战问题。抗日民主政权战胜敌人所吃的用的都是人民群众直接提供的，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相当重的负担。在日伪频繁的扫荡中，人民群众提供的粮食、经费，还是依靠人民群众保护下来。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会计科的具体业务就是负责经费的开支和保管。形势紧张的时候，会计科同样随部队与党政机关要经常转移，除了随军随身携带党政军日常生活战斗所用经费及帐本外，大多数钱财要就地寄存于群众家里，随时取用，“群众家里就是我们的金库”。群众把钱藏起来，日伪扫荡过后，又都如数交给会计科。

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建设，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是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是始终带有战时经济的特点。

起初，抗日力量的经费、粮食，由于各地政权建设尚不完善，基本上采取就地筹集的方法。随着抗日队伍的发展壮大，所需粮食越来越多。为了减轻人民负担，避免各地负担不平衡和浪费现象，支持抗战的需要，从1940年开始，县政府建立严密的财政制度，实行公粮统一收支的办法。由各单位各系统造出预算，经财经委员会批准，制定征收计划。所收之物，除公粮就地贮藏外，一并上交会计科。

国民党统治寿张时期，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是以公粮为主，有些地方换成现款征收。除此之外，另有少量的税收。共产党领导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取消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只对某些工商业及特产征税，先后开征了大麻特产税、牲畜屠宰税、房地产契约税。这样一来，简化了税目，降低了税率，减轻了人民负担。财政其他来源还有罚款、没收汉奸资财、没收走私物品如烟土等。所征收现款及没收物品交会计科统一管理，公粮采取就近贮藏的方式，由各村村长指定贮粮地点，将该村所征公粮集中一处或几处，机关、军队及其他脱产人员凭发粮、草票在就近之处领取粮、柴草，村长持收粮草票到区政府核销核减。

发行抗钞也是解决抗战经费的一项手段，鲁西行署成立不久建立的鲁西银行，发行一角、二角和一元的票子。当时，县境市面上流行的有国民党政府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个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因其系国民党政府的法定货币，故名为法币；伪政府发行的纸币，称伪币；国民党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称地方票；当地商人发行的纸币称杂票。针对金融混乱局面，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手段“排除”法币，抵制伪币，取缔地方票和杂票，大力调剂金融，基本保证了财政开支需要和根据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文化教育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中国的目的，在占领区和游击区极力推行军国主义的奴化思想教育，举办“新民小学”，宣扬“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中日联合反苏反共”的论调，麻痹和

腐蚀中国人民的民族意志。寿张县城沦陷后，日伪建伪县教育科，设科长1人、科员4人、会计1人，负责管理占领区教育工作，仍沿用国民党时期的教育制度，以消除中日界线、建立东亚共荣为主要内容，并以尊孔的名誉笼络人心。当时，县境“新民小学”的教师多数为强迫所至，也有个别的本来就属汉奸，这类学校不多，学校学生为数寥寥，且多为不懂事的幼童。

为粉碎日伪的奴化教育，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推行抗日文化教育，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后，就在县政府设立了教育科，区设民教助理员，吸收部分有抗日热情的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扩大了教育干部队伍。1940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黄河南孙庄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后在梁山和清水河乡岳楼村开办训练班，对思想先进又愿意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进行多次培训。继而，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全县轰轰烈烈地兴办抗日学校，每3个村设1处抗日初小，每8所——12所初小设1所中心小学，每区均建立1处抗日高小，全县先后在清水河、大杨、白岭等村建立了8处抗日高小。县教育科直接领导抗日高小，区民教助理员领导中心校，中心小学校长领导附近的村镇小学。同时，在各村开设夜校、识字班。游击区小学也学抗日课本。抗日文化教育在全县全面展开。当时，台前境抗日小学主要有：抗日二高（西桥村）、抗日中心校（郑三里村）、梁集小学、后门赵小学、抗日六高（西白岭村）、棘针园抗日小学、刘口抗日小学、苗口抗日小学、大杨抗日小学、儿童团小学、丁桥小学、顾庄小学、张广小学、汤庄小学等。

抗日学校的学习内容，先后有鲁西区和冀鲁豫区宣传教育部门编印的（毛头纸质）抗日课本和政治教材，也有学校老师自己编写的教材。抗日高小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音乐、美术及政治课，尤其政治课内容较多，主要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纲领》，及介绍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范筑先等抗战事迹的文章。同时，唱革命歌曲，一方面学习文化，一方面进行抗日宣传。当时流行的歌曲很多，如：“日本鬼子来扫荡，机枪、大炮叮咚响，沉着气、别慌张，坚决和他干一场，抗日军民齐参战，手榴弹、大盖枪，打得鬼子直叫娘，看你扫荡不扫荡！”还有：“鬼子来，地雷埋，叫你倒下起不来，地雷埋了三百三，看你鬼子往哪窜”，“翻译官，真汉奸，吃的中国饭，当的日本官，欺压老百姓，骂你万万年！”县抗日六高女教师吕月真每天晚上教学生和村中青年唱歌曲，其词曰：“秋天里、秋风凉，鬼子失败在太平洋，将军死了好几个，菲律宾群岛又起恐慌……”，“青纱帐，青茫茫，抗日英雄里边藏……”这些歌曲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为动员群众抗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抗战期间，冀鲁豫边区抗日中学和其他抗日学校也曾先后设在台前境内。

1939年6月，中共寿（张）、阳（谷）、东（阿）边区委员会成立后，八路军六八六团政治部主任欧阳文主持成立寿、阳、东边区文化救国会，开展抗日宣传教育。

第四章 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抗日斗争

(1941. 5~1944. 1)

1941年和1942年，台前境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统治，连续不断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和“蚕食”，并先后多次搞“治安强化”运动，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活动在抗日根据地外围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顽军以及土匪武装等，联合加紧对抗日军民进行政治破坏和军事骚扰。加之严重的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粮食奇缺，加剧了军民生活的困难。台前境抗日根据地除西南部和西部外，大部分相继沦为敌占区，抗战形势日趋恶化，中共党政军民处境危艰。为适应严酷的斗争形势，1941年6月，张秋县成立，原属寿张的夹河、吴坝一带划归张秋县。自此，不畏强暴、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台前人民在中共寿张县委和张秋县委的领导下，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全面的对敌斗争。中共寿张县委和张秋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和冀鲁豫区党委的指示和部署，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行整风学习，开展生产自救和时事教育，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灵活机动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加强敌军和情报工作，分化瓦解伪军，陷日伪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经过两年的殊死战斗，终于战胜重重困难，坚持巩固了寿张、张秋两县抗日根据地，成为冀鲁豫边区革命根

据地一个坚不可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面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寿张县抗战困难局面的形成

中国人民经过三年多的浴血抗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1941年起，敌后抗战进入空前困难时期。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签约结盟之后，他们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更加膨胀，侵略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电式的大规模地进攻。同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珍珠港军事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放手南进，急欲在巩固侵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稳定在中国的战局。特别是中共领导的百团大战后，日军在继续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的同时，调集大部侵华日军和伪军，疯狂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妄图彻底摧垮中共领导下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此，敌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力战”的方针。在政治上，强化敌伪政权；在经济上，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和掠夺；在军事上，有计划地连续对抗日根据地实行“讨伐”、“扫荡”。从1941年春至1942年冬，在华北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制造许多“无人区”，以巩固、扩大其占领区，不断蚕食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活动。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利地

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先后调集 30 万大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并与日伪勾结，用反动的“曲线救国论”欺骗人民。1941 年 1 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使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活动在寿张县抗日根据地外围的国民党军队高树勋部，不断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县境西部、西南部的石友三、齐子修部及县境东南部的冯寿彭部不断对抗日军民进行政治破坏和军事骚扰（后被八路军击溃）；盘踞在侯庙乡西部的国民党流亡县长吴寿祺及其党羽，收拢土匪，组织武装，极力反共，破坏抗日（后被八路军消灭）。

1942 年 4 月 23 日，国民党第三十九军、十三军及特务旅共 2.5 万人，通电投降日军，背叛了祖国，该部被汪精卫编为伪第二方面军。这些投降派变为伪军后，积极配合日军，围攻抗日根据地，屠杀抗日军民。同时，国民党为争夺阵地，派人打入伪寿张县公署，帮助日军监视抗日军民活动，借日本人之手杀害共产党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顽固派遣特务分子姚传斌到寿张拉拢伪县长沈广训，并带来山东省国民政府的“委任状”（委任沈广训为“国军”团长），使沈广训有了新的靠山，更加坚定了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在国民党的操纵下，沈率部跟随日军对根据地疯狂的进行“蚕食”和扫荡，逮捕杀害抗日干部。当时，抗日根据地处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中，县境内出现三方政权割据的局面：即日伪政权占据县城周围和公路沿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和人民武装主要活动在县境西南部黄河两岸农村，即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范、濮、观中心区的边沿地带；国民党政权及其武装先后占据夹河、打渔陈、影塘一带和侯庙西部的某些村庄。日伪顽相互勾结

破坏抗日。反共的会道门组织关门口村红枪会，在国民党顽固分子操纵下，发动武装叛乱，袭击抗日三支队，杀害八路军抗日战士数十人，制造了“关门口惨案”。人民群众在各方反动势力争斗、土匪骚扰、帮会横行的动乱中煎熬。

自1941年以后，寿张县又连续遭受旱、蝗灾害。1942年，从春到秋，数月无雨，小麦几乎绝收。1943年，旱情更加严重，旱灾之后，大部分地区蝗灾又至，严重的地方，飞蝗遮天蔽日，几天竟能把大片秋禾全部吃光。地主、富农趁火打劫，放高利贷，吃一斗还三斗、四斗、五斗。更有许多地主用几十斤粮食买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当姨太太，至于他们用便宜价钱收买衣服器具更无法估计。天灾人祸，给全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有的典卖土地、房屋逃往他乡，有的卖儿鬻女，妻离子散。

严重的天灾人祸，使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人口急剧下降，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寿张县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的夹击围困和蚕食下，除县境西南部和西部外，大部分相继沦为敌占区，全县党、政、军、民处境危艰。

第二节 日军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始，日军为巩固后方基地，回师华北地区，先后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调集重兵，大举进犯，实行“铁壁合围”、“梳篦扫荡”和“囚笼政策”，抗日斗

争进入极其艰难困苦的阶段。

1941年3月，日军在县内第一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占领区实行保甲制度，巩固伪政权。县下设区，区下设乡，乡下设保（一般一村为一保），保内分甲（十户为一甲），实行十户连坐法，一户反日，株连邻间。同时，强化反共武装，扩建伪治安军，区有区队，乡有乡兵，保有保手。逐村清查户口，登记造册，强迫成人照相，发放“良民证”、“登记证”、“旅游证”等，限制抗日军民活动。

1941年7月，日军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历时两月余。主要内容是：整顿内部，发展伪军，增设据点，封锁交通。时华北伪政务委员会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游击区）、“非治安区”（抗日根据地）。驻寿张县日军将县城周围所占的村庄划为治安区，对该区统治以一元化大“清乡”为主，村庄隔离，逐村逐户清查，强化保甲制度，企图肃清内部抗日人员。同时，轮训伪保长。对游击区主要以“蚕食”为主，步步进逼，逐步分割，竭力扩大伪军队伍，增设据点。此次“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安设在台前境内的据点有：三官庙、汪庄、郑三里、十里井、接泊浪、杨庄、马庄、姚邵、西官路、桥北张、孙口、王楼（原设在张楼，被八军拔除后迁王楼）等。日伪还在据点与据点之间，挖有深4米、宽4米的封锁沟，路口设在据点附近，别处不能通行，农民走亲访友、种田下地均需绕到据点路口，接受伪军检查后方可通行。台前境内的封锁沟主要有三道：其一是南北走向，从台前至孙口过黄河经蔡楼、小吴至郟城，并在沿线与公路线上修筑了碉堡群；第二道是东西走向，从寿

张往东经三官庙、西杨、曹堤口至张秋；第三道从张秋向南经郑三里、马庄过黄河故道至东平湖区。

日军为分割根据地，又在共产党活动频繁的寿、阳、东三县交界的张秋镇设立三县日军指挥部（又称司令部），对张秋县抗日政权造成重大威胁。寿张县境南部日军在郟（城）、寿（张）之间小吴村构筑了中心据点，聚兵数百人，企图割断郟城、寿张、范县三县抗日军民之间的联系。日军纠集重兵，对根据地连续实施分区扫荡，不少村庄被敌占领，原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有部分重新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

1941年11月，日军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其重心是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实行经济掠夺和封锁，进行“梳篦扫荡”，推行“三光”政策，进一步增设碉堡，建据点，修公路，挖深沟，建围寨，在交通要道路口和集镇设卡，妄图以此断绝抗日根据地的物质来源，围困破坏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中心裴城寺一带烧毁民房数百家。根据地深受其害，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越来越大。

1942年3月，日军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敌占区，主要是实施所谓“治安肃正”、“总力战”（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囚笼政策”和“保甲制度”等，并大肆抓壮丁，以肃清所谓“不稳定分子”；在抗日根据地边沿地区，继续修碉堡、围寨，扩建据点；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地“扫荡”和“蚕食”，使抗日斗争处于最残酷、最紧张的阶段。县境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南、东和中北部相继沦陷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占全县总面积的70%以上。

1942年9月，日军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狂热地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强化“反共自卫”组织，由分区扫荡变为集中扫荡，由分进合击转而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侵华日军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地带进行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详见第四章第八节）日军的残酷扫荡，使寿张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围困，绝大部分境域成了“抬头见岗楼，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第三节 相持阶段的对敌斗争

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面对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处于濮范观抗日中心区前沿的寿张县，对敌斗争异常残酷和复杂，县境南、北、东三面先后被日军所占领，处敌三面包围和日伪顽夹击之境地。根据地边沿与敌占区犬牙交错，时常处于“拉锯”状态。白天，日伪出兵“清乡”和“扫荡”，晚上，抗日军民出动袭扰日伪据点。四区区委书记高志启（于耀）、区长马达，由于环境恶劣，每到一处不能久停，有时一夜换二三个地方，采取昼潜夜出的方式开展工作。抗日三区区长谢惠玉白天大部分时间藏在老百姓的地窖里，夜间出来动员组织群众抗日，有次冒生命危险，夜闯三官庙伪据点，找伪区长谈判，勒令他弃暗投明。驻刘魁斋村的一区区长李景柱，因该村与敌占区穿插，被刘怀良伪军中队偷袭逮捕。台前区域的抗战形势比濮范观中心根据地更加残酷，台前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的牺

牲。

在敌人军事政治进攻猖獗的形势下，抗日政权中干部队伍里不坚定的分子和投机分子，经不住考验，少数人退却回家，个别人叛变投敌，引起了一些干部和群众思想上不同程度的波动和混乱。

这期间，地方党组织的对敌方针也不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环境。主要表现在：第一，抗日根据地军民缺乏对付日伪封锁“蚕食”根据地边沿区的斗争经验。第二，减租减息运动没有深入开展，基本群众发动不够。第三，皖南事变后，干部中出现某些“左”的倾向，认为国共关系已经破裂，不注重统一战线。反顽作战中，只打不拉；政权工作中，贯彻“三三制”原则不力；锄奸工作中，注意政策不够。第四，主力部队在扩大过程中，对地方武装编并过多，影响了地方武装的发展。第五，地方党和军队缺乏统一领导，虽有军政委员会，但实质仍是联席会议，对敌斗争力量不统一。

为了动员、团结全党和全体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党中央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号召全党全军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冀鲁豫区党委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断给地委、县委发出工作指示。寿张县委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党的骨干是坚定的，广大群众思想基础是好的，部分人一时的思想波动是由于对形势认识不清所致。县委决定一方面加强对敌斗争，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一方面在斗争中加强思想工作，提高广大干部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念，增强斗争意志。对敌斗争策略是：针对日军的

“多元的综合措施”、总力战，县委充分发挥党政军民整体力量，实行全面的对敌斗争。针对日军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适时转变斗争方针，广泛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斗争，并实行广泛的游击战，克服平原地区地形的弱点，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以逐步扭转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把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在根据地建设上，通过“精兵简政”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健全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促进广泛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开展整风运动，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性，巩固、改善党的领导；厉行节约，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增强坚持敌后抗战的物质力量；通过落实中央制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在农村进行经济、政治变革，改变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关系和权力关系，提高基本群众的经济、政治地位，使他们有参加抗战的基本能力和条件。

在粉碎日伪扫荡和“蚕食”的过程中，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抗日军民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在游击区，日伪军建立点、线、面的碉堡群，对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在这点、线、面的正面，抗日军民组织联防线，在日伪军还未站稳脚跟时给以沉重打击，粉碎日伪军的“蚕食”。如果日伪军深入到根据地，扎下据点，抗日军民就围困打击敌人，一直把敌人撵走或消灭。在这点、线、面的后面，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使敌人腹背受敌，难以应付。

在敌人的碉堡封锁区，抗日军民挖筑交通沟网，藏粮藏物，开展

小部队运动，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使敌人不敢轻易出动“蚕食”抗日根据地。对于敌人的据点碉堡，采取围困的办法，游击队白天埋伏在周围，待机打击出外敌人，夜晚在据点周围放冷枪，向敌人喊话或突击敌人，弄得敌人昼不能出，夜不能眠。县委还派地下人员打入日伪军内部或派受共产党控制的人充任伪乡长、保长，为抗日政权提供情报等服务。

针对敌人对根据地实行野蛮的“扫荡”、“铁壁合围”、“三光”等政策，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互相结合起来，正确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加强地下活动。有时，抗日武装力量“化整为零”，待机破敌或转移敌后去袭击敌人，提高了灵活性和战斗力。当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时，八路军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小股日伪军或打击其一部。

1941年到1943年，日伪军极为疯狂、频繁地对根据地进行“讨伐”或大扫荡，但始终冲不破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所构成的钢墙铁壁。敌人开始扫荡时，党领导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把粮食、用具、财物等都埋藏起来，甚至把水源破坏，主力武装事先跳出日伪军的包围，到日伪统治区打击敌人，抗日军政干部家属到敌占区敌据点内去隐蔽，使日伪军到处扑空，一无所得。有时，县、区干部和武装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原地开展游击斗争。在夏秋季节，草木庄稼成为抗日军民反扫荡的有利屏障。

抗战困难时期，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和部分干部的思想一时混乱，县委是沉着坚定的，作出的决定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在组织

实施过程中，也较为扎实、有效。县委书记高黎光和其他领导干部，带头分别深入对敌斗争第一线，认真贯彻落实县委的决策，与广大人民群众患难与共。当时的县委成员平均不超过24岁。但是，他们都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以身许国、以身许党的志愿，有不畏艰难、奋发进取的思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工作中学习工作，有完成党交给任务的决心。在特定的战争环境里，县委学会善于领导地方武装独立作战，发扬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艰苦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县委一班人实事求是，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强调坚持群众路线，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坚强的群众观点，关心群众疾苦，服务群众，依靠群众，一刻不脱离群众。这些好的思想和作风，为全县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提供了保证，逐渐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后来人们称它为“延安精神”。

第四节 改造地形，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面对日伪军疯狂的扫荡，鉴于敌汽车、炮车、坦克在平原地带横冲直闯的严重局势，华北地区的抗日军民创造了一套扼制敌人快速部队前进的办法，即在平原地区村与村之间开挖交通沟，利用纵横交错的沟壕抵御日本的机械化部队。寿张县广大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动员下，积极响应鲁西区党委、军区关于“改造地形，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号召，在全县范围内破寨挖路，铲除敌人公路沿线的封锁沟；改造地形，开挖交通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将村与村凡是能通牛车

的道路大都挖成了宽8尺、深5尺的“抗日沟”，沟崖上种茵柳、蓖麻，沟内挖有掩体，可以伏击敌人。纵横东西南北的交通沟，使日军的汽车、炮车、坦克等先进的装备失去作用，便利了抗日军民打击日伪军，对在平原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1月8日，一一五师教导三旅一部为打击敌人气焰，在县境南潘溪渡伏击日军1个加强中队，毙俘日伪军300余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九二步兵炮1门。几天后，大批日军对郟、寿地带进行报复性扫荡，持续20余天，抗日军民英勇还击，采取平原游击战术，利用交通沟为掩护，大量杀伤敌人，挫败了敌人锐气。

第五节 实行民兵联防，粉碎日军的“蚕食”和进攻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发展抗日救亡武装，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粉碎日伪军的“蚕食”、分割和封锁，坚持、巩固抗日根据地，1941年寿张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裴城寺村召开会议，部署组织在县境南部，尤其是黄河两岸广大农村普遍建立民兵组织，成立“自卫队”，实行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将18岁—55岁的男性农民组织起来，拿起大刀、标枪、土枪，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拿敌特，协同部队作战。后来，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又将自卫队中的先进队员组成模范班，将青救会中的先进成员组成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这是当时的两大民兵组织。随后又以这两大民兵组织为基础，组建了基干民兵武

装，开展村与村之间的民兵联防，实行全民皆兵，以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

各地的民兵组织起来后，缺乏枪支弹药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一是以村为单位自筹资金买枪。有百亩土地以上的户买钢枪一支，50亩地的户买土枪一支。一般农户按合理负担的政策，集资买枪。枪支的来源，一部分是从散兵、逃兵中买，一部分从敌占区购买；二是自制武器。组织农村中的能工巧匠，仿造枪支；三是收缴敌人的武器；四是动员有私枪的户把枪交民兵使用。由于枪支的来源不同，民兵枪支的种类繁多，有“三八大盖”、“苏式水连珠”、“湖北造”、“中正式”、“老铅牛”、“单打一”等等。

广大民兵在坚持巩固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日、伪、顽、会、匪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袭扰日伪据点、平封锁沟、破公路、割电线，封锁敌人交通，打击小股出扰的敌人；二是在敌人大“扫荡”时，进行空室清野、藏粮，掩护群众转移；三是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捕捉敌探，检举内奸，防止奸细活动，维护地方治安，肃清盗匪；四是负责传送情报；五是配合八路军和县区武装作战，有力地扼制了日军对游击区、根据地的“蚕食”、“分割”。全县基干民兵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一支较强的人民武装，抗日战争结束时，全县民兵发展到3000余人，他们在坚持、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第六节 打击叛徒刘怀良、武朝秀及其他伪顽

日伪在不断对寿张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拉拢收买了一批特务、叛徒和流氓、土匪等亡命之徒。他们利用亲戚、朋友和社会关系，采取假参军或组织假游击队或假反正等伎俩，打入中共领导下的县、区地方武装，开始表现“积极”，待取得信任后便乘机拉部队投降敌人。同时，他们还经常到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进行骚扰、破坏，杀害中共党政军人员和群众。这些汉奸特务、叛徒、流氓、土匪横行乡里，鱼肉民众，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铲除他们，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需要。为此，各级党委都把锄奸工作作为一项经常的重要任务。

侯庙地主樊兆瑞曾任伪区长，倚仗日伪势力作恶多端，并公开抗交公粮，区长王云平带领区队于深夜对其抓捕，当登其房顶时被发觉，樊兆瑞爬墙外逃，通讯员对其连开数枪，樊兆瑞带伤逃命，两天后亡命。群众说：“人民政府为民除了一霸。”

1941年秋，寿张县一区区队副刘怀良和区长于清源秘密通敌，策划叛变。县抗日民主政府发觉后，将于清源逮捕，刘怀良于同年8月的一天夜晚，打着去敌占区执行任务的幌子，带领全区队60余人（枪）投敌，并捆走区队指导员司磊、副区长周跃西，交给敌人杀害。刘怀良叛变后，被敌人委任为一区伪区长。刘怀良是一区陈楼村

人，他依靠人地两熟的条件，带领汉奸队到处杀害共产党人，捕捉抗日军人家属，袭击抗日一区区部，抓走区长李景，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一区的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打击这个叛徒的反动气焰，寿张县委决定：一是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全县各级党组织（特别是黄河北岸的几个区）深入发动群众，村村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刘怀良叛变投敌的罪行，并编了歌曲（骂刘小调）：“刘怀良当汉奸大家都知道，他于民国三十年叛变投敌了，绑走了指导员还有区长，拐骗长短枪 60 余条……”，教给各村群众及儿童团演唱，给他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二是在军事上有计划的组织力量专打刘怀良的汉奸队。一、二、七区区队采取联合行动，在棘针园战斗中，给刘怀良汉奸队以直接的打击，军分区公开宣布由八团和三支队专打刘怀良的伪区队；三是对他率领的伪区队人员家属加强思想瓦解工作，限期把自己的子弟叫回，不准当汉奸；四是在经济上打击他，没收他家全部财产。同年 8 月，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七区韩胡同召开万人大会，处决了通敌、策划叛变的于清源。叛徒刘怀良在军事打击和强大政治攻势压力下，深感日暮途穷，被迫向县抗日民主政府递交了悔过书，并悄悄逃离寿张县境。

伪寿张县参议长武朝秀是武口村的大地主，是寿张县汉奸头目沈广训的亲信，寿张县敌工部曾派王楼村内线人员王朝阳做他的工作，试图通过他做沈广训的工作，他不但不干，反而和国民党特务姚传彬、高艺亭勾结，拉拢沈广训投靠国民党（沈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状），对抗日政府在伪军、伪政府内部开展工作很不利。更为甚者，他亲自

带领伪军到家乡骚扰，企图捕捉农会干部。寿张县委决定，集中力量打击武朝秀。首先，召开群众大会和绅士名流座谈会，宣布武朝秀的罪行和丑恶历史，从政治上彻底揭露他。在县城周围张贴布告，印发宣传品在城内外大量散发，宣布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封武口他家的门；派他的亲友向他陈说利害，指出他与抗日政府为敌自取灭亡的后果。武朝秀开始还想和抗日政府较量一下，叫沈广训的汉奸队到武口示威，保护他的财产，在遭到八路军打击后，不敢再出动。经过一番较量，他主动找王朝阳拉关系。经县委研究，认为武朝秀很难真心实意为抗日办事情，还是叫他离开寿张有利。因此，也叫他写了悔过书，灰溜溜地离开了寿张。通过打击武朝秀，对伪政权的一些人员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吴坝村恶霸伪村长吴思芝，不但横行乡里，而且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党支部发动组织群众清算其账目，最后清出的贪污数字相当大，加之其平时的恶行，激起了民愤，一直要求抗日政府处他死刑。抗日政府为平民愤，鼓士气，警敌顽，根据其所犯罪行，依法判处其死刑。自此，吴坝一带的伪村长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投靠日伪。

第七节 突破日伪“九二七”铁壁合围

1942年9月27日，日军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濮、范、观一带进行空前规模地秋季大扫荡。日军以三十二、三十五师团为主力，并配备开封骑兵旅团和日军驻聊城

骑兵联队，出动 6500 名日军和 17 个县的伪军共 3 万余人，动用坦克 30 余辆、汽车 400 余辆、飞机 10 余架，兵分 8 路，对根据地军民实施“铁壁合围”。

1942 年 9 月已是秋收季节，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正在快收、快打、快藏，坚壁清野，积极准备反“扫荡”。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三旅政治委员兼军分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曾思玉和八团参谋长王晓带领七、八团各一连和两个班长训练队，从郟城以北的石楼村出发，黄昏前到达郟城北面的李楼，准备召集党、政、军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布置秋季征粮任务。刚刚到达宿营地，情况突变，发现敌情，并侦知日伪有铁壁合围企图，曾思玉率领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北过黄河故道，于黎明前迅速转移到甘草固堆一带。天刚拂晓，突然从西北方向，传来了枪声，曾思玉立即告诉王晓带领部队向东北方向转移，他自己留下骑兵班，继续观察黄河以南日伪军的动向。

大约 7 时左右，日伪军分几路走下黄河大堤，组成行军队形，打着大大小小的太阳旗，象一群饿狼似的猛扑过来。曾思玉带着骑兵班飞快地赶上部队，命令部队就地隐藏休息。他同王晓立即召集连长、指导员开了一个短会，把黄河以南日伪军的动态和突破日军“铁壁合围”的决心，向大家作了简要的说明，决定乘敌人合围未形成前，从东北方向坚决打出去。

各连经过紧急动员后，战士们斗志昂扬，一个个摩拳擦掌，迅速做好战斗准备。9 点钟左右，当部队利用抗日道沟隐蔽地继续向东北方向运动时，四面八方突然响起了枪声，日军的战斗机一队一队地从

远方飞来，象穿梭一样在合围圈上空不断地俯冲扫射，疯狂地进行轰炸；敌人的侦察机象饥饿的老鹰一样，在合围圈上空盘旋着；地面上的敌人和被胁迫的老百姓，打着大小不同的红、黄、蓝、白、黑各种颜色的旗帜，向前压缩；敌人的坦克、汽车越过一条条抗日道沟，颠颠簸簸地爬行着，向合围地区开进，有的地方步兵还为坦克、汽车开辟道路；骑兵部队打着黑色旗子，在开阔地里穿来穿去。无数村落烟尘四起，炮火轰鸣，大小村庄均陷入极度混乱和恐怖之中。惊慌的村民呼儿唤女，四散奔逃，到处是一片凄惨的呼喊声。随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密集的人群里血肉飞溅，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根据地不少县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军区后方工厂、医院、报社等单位的人从四面八方也被包围在甘草固堆附近黄河故道沙滩上，与曾思玉所带领的军民会合。面对日伪军穷凶极恶的暴行，目睹人民遭受的巨大痛苦，战士们愤怒的烈火充满胸膛。党支部发出了壮严的号召：“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到了；党员团员要起模范作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死难烈士报仇，为父老兄弟、姐妹报仇，多杀鬼子，为人民立战功！”这简短有力的政治动员，立即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激荡在每个人的心中，复仇的怒火越烧越旺。

中午，日伪“铁壁合围”的圈子形成了。日伪军展开了战斗队形，开始向合围圈中心压缩。枪声，炮声象狂风暴雨般地呼啸而来。抗日军民在甘草固堆附近黄河故道的沙滩中——一个狭小的地区内挤得人山人海。这时，红日当空，骄阳似火，晒得人们头昏脑涨，汗水浸透衣衫，肚子饿得咕咕响，口渴得嗓子冒烟，而危情又越来越严重。

下午3点钟左右，敌人的包围圈越压越小，在不到30平方公里的沙滩上，人们被日军逼得无路可走，无地藏身。军队走到哪里，群众就跟到哪里。抗日沟里的人们拥挤得满满的，寸步难行。曾思玉从敌人的炮声中分析敌情，决定向枪声稀疏的东北方向即寿张方向突围，但到甘草固堆以北道沟里的时候，东北方向纵深处发现日军骑兵，后面还有坦克晃动。曾思玉改变计划，决定突围后向南转移，随即命令八团参谋长王晓带领该团第一连和班长训练班，沿着正南道沟，利用茵柳棵、大麻籽棵接近敌人，集中兵力火力，发挥刺刀手榴弹的近战威力，采取突然动作，对甘草固堆东北角的敌人实施猛烈冲击，坚决突破这个缺口；又命令七团第一连和班长训练队及九团一连的一个排，组织轻机枪和特等射手，利用道沟道沿就地射击，用准确的火力压制甘草固堆东北角茵柳棵下的敌人，支援突围部队。由于敌人众多，又封锁了道沟，部队第一次突围没成功，一连副连长王清山壮烈牺牲。这时，敌人纵深处炮火向抗日军民准备突围的方向猛烈轰击，子弹嗖嗖的在头上飞过，炮弹轰隆隆的在人群中爆炸。阵地上弥漫着吃人的火药味，刺激着人们的鼻子、口腔、眼睛。炮弹掀起的黄沙，遮天蔽日，在飞扬的尘沙中，模糊地看到妇女们怀抱的婴儿被炸得血肉横飞，大一点的孩子哭喊着被炸死的妈妈。乡亲们向子弟兵高喊：“救命啊……”情况万分危急。生死关头，曾思玉临危不惧，组织军民再次突围，命令部队以4个连的兵力利用道沟就地展开，各连轻机枪集中起来，射手挂皮带端着射击，步枪上刺刀，手榴弹一律打开盖，地方武装全部参战，集中火力向甘草固堆村东北角杀开一条血路。随着

激越的冲锋号声，阵地上手榴弹、轻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怒吼。战士们跳出道沟，如猛虎下山一般杀向敌人，敌军阵地一片火海，血肉横飞，顷刻间，日军的阻击阵地被一举突破。在 600 米长的地段上，100 多名日伪军全部被歼。

曾思玉带领部队掩护群众从突破口冲出，迅速向南转移，奔向黄河故道。此时，忽然发现东北角有敌人的骑兵，向突围方向奔来。曾思玉果断地命令骑兵班在沙滩上，打马猛跑，扬起尘土，造成疑兵，并先敌抢占东北方向的小村庄。尔后，用几个人拉马隐蔽在村南面，其余的疏散在村外道沟里，对准向南来的日军骑兵迎头猛烈射击，敌骑兵受阻，日军后续骑兵望见满天尘沙，迟迟不敢行动。突围部队掩护群众越过黄河故道，奔向黄河南李集、杨集安全地带，终于突破了日军的“铁壁合围”。

在日伪军这次“铁壁合围”中，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均遭受严重损失，广大群众也遭到浩劫。冀鲁豫军区后方机关和地方武装人员伤亡 279 人、被俘 116 人、失散 873 人；地方武装干部伤亡失散 552 人，被抓群众 600 余人，损失大车 300 余辆、牲畜近千头。其中，鲁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徐秋、政治部主任魏金山、教育参谋韩国栋在突围中壮烈牺牲。日军所到之处，暴行累累，罪恶滔天。许多地方机关、学校和房屋被日伪军烧掉，被杀害的无辜群众的尸体到处可见，被杀害者有八旬以上的老人，有吃奶的婴儿，有的被砍头，有的溺死，有的被火烧死，有的被捆在树上用刺刀捅死，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剖腹开膛，有的被大卸八块，有些幼女被强奸致死……日军一

部进犯到侯庙西部的村庄，在苗口西北大洼用机枪扫射，逃难妇女、儿童死亡 100 余人。行至苗口村，遇到外逃的村民张兆明，残暴的日军将张兆明捆在耙床上，刺刀对准胸膛，威逼说出八路军在哪里，后用凉水灌昏。进村后，日军又打死群众 5 人，临走时放起大火，烧毁民房 20 余间。日伪一部行至孙洼村，捉住没有逃走的村民刘建西，用皮鞭抽打，逼问藏粮的地方和八路军去向，刘誓死不开口，敌人反复抽打 10 余次，刘实在忍不住，乘敌不备与日军相拼，被日军乱刀刺死。在邢庄村东，日军围住逃难群众 30 余人，用机枪扫射，死 12 人，其余全部负伤。在清水河甘草固堆以西村庄，逃难群众被日军赶到猪圈里、土坑里强迫睡倒，谁动一下就是一刺刀，其中有 4 位青壮年被刺死。日军冲入甘草固堆村后，抓住村民陈广乾，逼问八路军伤员藏在哪里，陈广乾为保护八路军及党政干部，宁死不说出，被日军扔入大火中，陈爬出来后又被扔进去，连续 3 次扔入大火内，被活活烧死。为保护抗日人员，王伯房之父被枪杀，王性利祖父被打死，民兵王伯颇父女俩与日军相拼被刺死，陈广齐因不出卖抗日人员，被日军反复灌凉水数次后杀死。野蛮的日军还将数名村民填入井内。该村农民被火烧、枪杀、填井死亡者达 10 余人。

在日伪军这次大扫荡中，县境东部的张秋县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和独立营被围困在夹河套，营长杨朝炳率队浴血拼杀，击毙部分日伪军后，成功突围，残暴的敌人在金堤一线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报复，架机枪扫射，百姓死伤 40 余人。日伪军又在顾庄、金庄一带施暴，用机枪扫射群众，死伤 60 余人。在朱庄、邵庄茭草地里，日军对隐

藏的逃难群众疯狂的扫射，死伤 20 余人。此次扫荡，日军用汽车强行带走群众 200 余人充当苦工，并在张秋县境增设多处据点，破坏抗日组织，摧毁民兵联防，使部分抗日根据地地区沦为敌占区。

第八节 粉碎日军“十·十二”大扫荡

1943 年秋，日军为了在太平洋战场上与英、美军决战，急需从华北抽调兵力南下。而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却被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军民所牵制，抽调兵力相当困难。在此形势下，日军企图采用“连环合击”、“拉网合击”等相结合的所谓新战法，彻底摧毁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便抽调兵力南下。是年 10 月 12 日，日伪军调集步骑兵 15000 余人、汽车 800 辆、坦克 8 辆、飞机 5 架，分 13 路对冀鲁豫根据地濮范观中心区进行大扫荡。半个月前，上级党组织就得到敌人要扫荡的情报，作了反扫荡的布署。寿张县委敌工部也从敌人内部获得可靠情报，知道日伪军这次扫荡主要是抢粮食，为此准备了很多汽车，并向敌占区老百姓要大车准备抢粮。县委根据上级“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的指示，动员根据地群众“坚壁清野”藏粮食，坚持反扫荡。县敌工部的任务是及时掌握敌人情况和把一些年龄大、身体弱的干部，重要的伤病员及一些女同志，安置到敌占区“保垒户”掩护起来。当时，在寿张县活动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是八团。10 月 11 日，八团驻清水河乡王集待敌。二分区要求县敌工部准确掌握敌人出动的时间，及时报告八团。敌工部长杨萃民派姜来聚住在后方的关系户家里监视

敌军动向。11日，王楼、后方住了很多敌人。12日拂晓，日伪军起床开饭，准备出动。杨萃民根据姜来聚的及时报告，立即跑到王集将情况转告八团团长齐丁根和参谋长王晓，八团立即出动，顺着临黄大堤往东北，从寿张县城和孙口中间，冲破敌人的封锁，跳出外线。正当敌人在根据地烧杀抢粮的时候，跳出外线的第二军分区主力部队与昆张支队的4个连，在段君毅、曾思玉的指挥下，于18日一举攻克东平县城，此后5天内连克敌11个据点，并袭击了驻张秋镇的日伪军。到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日伪军闻讯后惊惶撤退，这次扫荡很快被粉碎了。由于情报及时，反扫荡部署周密，根据地损失不大。寿张县的伪军为了进一步蚕食抗日根据地，乘此次日军大扫荡之机，分别在侯庙、莲花池安了据点，分区主力部队为避敌人锋芒，打开东平后，不再坚守，迅速从东平返回，乘敌不备，一夜拔除了这两处据点，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取得了反“蚕食”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1943年10月12日，是日军的最后一次大扫荡。由于日军的碉堡政策，分散了兵力，使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抗日武装却日益巩固壮大，并与人民建立了鱼水关系。日伪军虽然采用合围、蚕食、清乡等毒辣手段，但八路军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外线作战、长途奔袭、打入敌人的心脏、麻雀战等战术，使敌疲于逃命。日军的实力虽然减弱了，但它的残暴性却有增无减。日军在这次向根据地扫荡中，在岳楼村强奸幼女1人、妇女3人，把3个老百姓毒打以后栽到水缸里饮足水，又用皮鞭反复抽打，弄得死去活来。敌人到了裴城寺村附近，受到我军的阻击，因寡不敌众，我军机动转移别处，凶恶的敌人便向手

无寸铁的群众报复，从裴城寺到曹岭 10 华里的路上，杀死烧死群众 10 余人。日军这次扫荡共杀死群众近百人。

日军的残暴行为并没有把人民吓倒，相反更激起了广大群众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更加高涨，特别是寿张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战斗力日益提高。

第九节 进行武装斗争 努力扭转被动局面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寿张县抗日根据地处于日、伪、顽夹击中，面对困境，全县党政军民不畏强暴，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除粉碎了 1942 年日伪军“9.27”铁壁合围和 1943 年的日伪军“十.十二”大扫荡之外，还先后坚定勇敢地与日、伪、顽、会、匪展开了一系列血与火的殊死战斗，终于战胜重重困难，坚持、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1941 年初，杨勇率领三四三旅七团在郟城潘溪渡歼灭日军一个加强中队 160 余人。随后，七团进驻台前境西南部，坚持抗日斗争。1941 年，兵痞出身的赵长咸（外号赵二虎），积极效忠日军，纠集伪军上千人，盘踞张秋镇，自称“司令”，对附近村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次年正月，寿张县抗日三区区长谢惠玉部署打击赵长咸所部伪军。谢惠玉带一个班登上金堤鸣枪诱敌，赵长咸遂带 300 百伪军出镇直追，待进入伏击圈后，郑三里、牛桥（牛三里）、王三里村抗日武装一起出击，敌溃不成军。在牛桥村南俘敌 100 余人，毙伤 30

余人，缴获长短枪 100 余支，残敌绕道吴坝村逃窜，又遭八团截击，赵一败涂地。

1941 年秋，寿张县伪警备队队副沈广训闻八路军一部驻梁集，遂率日军 30 人、伪军 300 余人，兵分三路围剿梁集。八路军八团一部埋伏在村西堤口，待敌靠近百米之时，突然射击，敌溃败西逃。沈广训带一支伪军从东路入村，也遭到伏击，不敢恋战，逃回县城。

1941 年 11 月，日军一个小队携伪军 300 余人，并配备骑兵班领前开路，直驱清水河，实施报复性扫荡。当时，二、七区仅有 100 余枪，刚与刘怀良伪区队激战一天，撤离棘针园村休整，闻讯日伪军行进李开甫村，便立即行动，于棘针园村后设伏，首先袭击了敌骑兵班，该班敌人溃不成军，日伪后续部队赶到猛烈反击，抗日区队英勇抵抗，掩护区政府和群众转移，激战两小时，日伪不能前进，向东溃退。

1941 年 12 月 12 日，日伪寿张保安中队和第二区队 300 余人，带领二三百辆大车到抗日游击区刘心实、葛集、龙湾一带抢粮，县长郭少川闻讯立即带警卫连和短枪队及地方民兵阻击，经过两小时激战，敌军溃退，缴获大车 100 余辆。12 月 29 日，寿张伪保安中队、城防队共 600 余人，在队长朱建勋带领下，到龙湾、葛集、刘心实、河西赵一带抢粮，县警卫连、武工队在许子善指挥下，闻讯赶到，给敌人迎头痛击，迫使其仓皇逃跑。

1942 年后，台前一带发生严重粮荒，遍地饥馑，日伪军粮秣空虚，到处抢粮。1943 年日军推行“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掠夺粮食为主要目标的疯狂扫荡。是年 6 月，正值麦收

季节，第二军分区发出武装保卫麦收的号召，司令员曾思玉率军分区八团和昆张支队，在地方武装和县区党政干部以及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从昆山向张秋、寿张奔袭，对三县之敌发起总攻，一夜间拔除日伪据点 30 多处，俘伪军 1000 余人。其中台前境内东起姚邵、马庄、郑三里，西至孙口、王楼等 12 处日伪据点被拔掉，使昆张地区的大片根据地得到恢复。

1943 年 7 月，驻寿张县耿王楼据点的日军一个班和伪军两个中队，向寿张县二区抗日根据地进犯。第二军分区八团获得情报后，将一部分战士埋伏在耿王楼至张楼之间的青纱帐内，日伪军的队形是一个伪军中队在前，一个伪军中队在后，日军的一个班在两个伪军中队中间，当走在前面的一个伪军中队进入伏击圈时，八团将其让过去没有打，待日军的一个班进入伏击圈时，八团突然向其发起进攻，当场击毙日军 5 人，活捉 1 人，剩下的几个带伤逃走。此战，八路军缴获轻机枪一支、三八步枪 5 支。伪军逃回后说：“八路军真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日军则怀疑是“伪军出卖了他们”，使其内部矛盾加深。战斗结束后，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七区清水河召开了祝捷劳军大会。

1943 年 8 月，日军驻寿张司令官金津和寿张县伪警备大队副沈广训带日伪军 300 余人，去黄河南配合小吴据点日伪军合击四区（赵固堆一带）抗日武装，四区抗日区队闻讯提前跳到圈外，敌合围扑空。翌日清晨，沈广训带队北过黄河欲返寿张，黄河北抗日军民侦知此情后，二分区三连一部和县大队、一区队埋伏在孙口坝南王黑、苗庄间的滩

区青纱帐内。是日上午8时许，沈广训带队越过黄河故道向北进发，当进至埋伏圈内，青纱帐里伏兵四起，顿时步枪、机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敌惊慌失措，沈广训战马中弹，沈腿部跌伤，溃退县城。

1943年10月，徐翼率第三军分区三团连续拔掉县境马丁庄、郑三里、曹堤口、楚庄、接泊浪、三官庙、姚邵庄、汤庄、张书安等19个日伪据点。当时，台前境内流传的抗日歌谣，显示了军民抗日的声势。

日本小鬼来扫荡，机枪大炮咚咚响。
沉着气，别惊慌，英雄抗敌出主张，
坚决和他干一场，叮叮叮，当当当，
打的鬼子发了慌，看你扫荡不扫荡。

※※※※※※

地雷象个大西瓜，挖开地皮埋上它，
浇上鬼子的血和肉，让它开朵大红花。

※※※※※※

鬼子来，地雷埋，管他来了就倒下，
倒下起不来。

※※※※※※

地雷埋了五百三，你鬼子那里窜。

※※※※※※

翻译官，真汉奸，吃的中国饭，
当的日本官，欺压老百姓，骂你万万年。

※※※※※※

妈妈梳子当手枪，骑着竹马通讯忙，
喇叭当着小洋号，扛着小棍当长枪，
齐心合力来抗战，打的鬼子无处藏。

抗日战争相持时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县、区地方武装独立作战或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百余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渡过了难关。寿张县始终未被日伪军完全占领，抗战形势逐渐好转，由被动变为主动，并成为冀鲁豫边区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阵地，为全面反攻奠定了基础。

第十节 武工队的建立及其活动

1943年春，为了打击敌占区日伪军的气焰，粉碎日伪军的“清乡”运动，寿张县委决定成立县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这种军队、政府、人民相结合的一元化组织，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由县委书记兼三支队政委李仲勋、县长郭少川、公安局局长赵新亭三人组成的锄奸小组直接领导，孙梅阁任队长，下设3个班，由20个精明能干的战士组成。其中，有力大无穷的陶才有、勇敢善战的武继宗、行动敏捷的朱汉三分别担任三个班的班长。他们的具体任务是掩护抗日领导干部，除掉罪大恶极的汉奸，发动群众，侦察敌情，随时执行其他特殊任务。他们的口号是：谁坏打谁，要死的不要活的。武工队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变消极防御为积极出击，每个队员

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往来穿插于敌后，分合自如，行踪不定，结合群众，对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种斗争，把敌占区变成游击区，使敌人的“治安区”永远不安。同时，武工队常在敌人的腹部据点展开挖心战、麻雀战。他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群，白天分散，夜间集中，展开游击战；有时突入伪据点摸窝子，张贴标语、布告，散发传单；有时经过各式各样的化装，随机袭击敌人，破坏敌人的电线、公路、桥梁，做了许多使敌人闻风丧胆、老百姓拍手称快的事情。

一、镇压叛徒屠泽德

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三旅民运科原副科长屠泽德是混进部队的异己分子，后叛变投敌，被日军委任为特务大队长，改名申玉贵，住进小吴日伪中心据点。他为了向日军表忠献功，将所了解的抗日军民情报全部向日军告密，带人抓捕抗日地方工作人员和家属，并妄图破坏抗日地方党政军机关。为了除掉这个叛徒，寿张县公安局经调查制定了周密的计划。194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武工队员刘金池和赵阳接到命令后，决定由刘金池带领马继锁和申洪山两人深入虎穴，赵阳带人在外边接应。马继锁和申洪山都是山西人，万一有情况可扮作买卖人。三人每人配带一支手枪，一把匕首，二枚手榴弹，在寿张县敌工部地下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化装进入敌据点小吴村，住在地下交通员刘传久的家里。刘传久将屠泽德的活动情况和日伪军的布防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向刘金池等作了详细介绍。刘金池决定趁吃晚饭的时间行动。因为这时日伪军都在吃饭，警惕性不高，天将黑时也便于撤离。

此前，赵阳已为他们伪造好了寿张伪军头目的一个信封，刘金池将八路军处决叛徒屠泽德的布告朝信封里一装，三个人便开始行动。到了屠泽德的大门口，站岗的卫兵不让进，问：“干什么的？”刘金池连忙掏出一支烟递上去说：“我们是戴庙乡的，来求申大队长作保人。”说着将那个信封朝卫兵面前一亮，马继锁趁机划着了火柴，殷勤地为卫兵点着烟，卫兵头一偏，示意放他们进去。刘金池进去后，发现伪军全部都吃饭去了，只有屠泽德和他全家在吃饭。申洪山故意装作提鞋的样子留在门口观察动静。刘金池手持信件大声喊道：“申大队长在家吗？”他老婆问了声：“谁呀？”刘金池说“我们是从寿张县城来的，是来送紧急信件的。”边说边上前递信。马继锁在屠泽德接信的当儿，掏出手枪朝其连开3枪，两枪击中胸部。刘金池将事先准备好的布告放在屠泽德的身上，然后三个人迅速撤离现场，来到村外与接应的赵阳会合，待日伪军戒严搜捕时，已安全回到驻地。7天后屠泽德因重伤毙命。叛徒屠泽德被镇压的消息传出后，群众无不叫好，对伪军政人员震动很大。

二、镇压伪乡长李保存

为了协调对敌斗争的步调，严惩死心踏地为日军效劳、恶贯满盈的地方伪军政人员，一、二区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由县公安局长赵新亭为主任，杨萃民为副主任，一区区委书记李基础、二区区区长王鲁光为委员。该委员会经过认真调查和准备，决定镇压作恶多端的伪乡长李保存。

李保存是后方一带的大汉奸，死心塌地效忠日军，做了很多坏事。

抗日力量通过关系对他多次劝说，多次警告，但李却置若罔闻，继续给日军通风报信，捕杀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及其家属，群众对其恨之入骨。1943年夏，县委决定由杨萃民负责内线工作，由公安局和武工队具体执行处决任务。李保存平时住在耿王楼据点里，不好下手。杨萃民了解到李保存在辛那里有个姘头，便通过该村联络员辛寿亭设法将李保存从据点里调出来，请李保存在其姘头家里吃酒，使他当夜住在姘头家。当夜，县公安局武工队长孙梅阁率领朱汉三、武继宗等10多名武工队员，由辛寿亭带路，从苗口赶到辛那里，拐弯抹角，悄然无声地来到李的姘头家门口，翻墙跃进院内，几个武工队员一齐动手，把李保存捆了起来，带到刘仁庄村外，孙队长历数了他的条条罪行，代表县委、县政府对其宣判死刑并立即枪毙。

武工队回到苗口村时戏还没有散，队长孙梅阁和二区区长王鲁光登上戏台向群众宣布处决李保存的消息，随后将抗日民主政府事先印好的布告贴到附近的乡村，将李保存的罪行公布于众。

三、镇压伪乡长张广平

伪乡长张广平家住王楼村，与日伪据点仅一路之隔。李保存被镇压后，张广平自知罪恶深重，每晚不敢回家，夜宿据点内院。为把张广平从据点里调出来，辛寿亭布置了几个和张有来往的“朋友”，借请张办事为名，约定时间给张广平送礼，并在张家喝酒，设法把他灌醉，使他当夜不能回据点。同时，布置地下共产党员曹华亭（打入伪军内部任分队长），以附近有八路军活动为由，提前关上据点的寨门。是夜，抗日三支队1个排在外围掩护，辛寿亭带领孙梅阁及朱汉三、

武继宗、王凤西等 10 余名队员翻墙入室，将张广平就地处决，火速撤离，据点内伪军闻声出动，武工队已撤到村外，追之莫及。

击毙伪乡长张广平的消息传进县城，传遍附近乡村，群众拍手称快。日伪人员吓得胆颤心惊。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趁机扩大宣传，说明为什么要镇压李保存、张广平，并警告为非作歹的汉奸。这对鼓舞群众斗志，分化瓦解敌人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当年传颂着一首赞扬武工队的歌谣：

神出鬼没武工队，机智勇敢显神威。

杀得敌人吓破胆，躲进据点当乌龟。

四、处决剿共班长王天月

日军为了对付武工队，在小吴成立特务队。王天月是个血债累累的特务分子，充任班长，专与武工队作对。他们抓走和枪杀不少抗日干部和群众，刺探八路军军情，无恶不作。为了消灭这个特务队，党组织决定由寿张县武工队负责除掉王天月，分区武工队负责除掉特务队队长。一天，获悉王天月在于楼结婚，县武工队便化装潜入该村，当天晚上，武工队长孙梅阁带领武继宗、陶太友、王凤西等几名武工队员闯进洞房，将王天月拉到黄河边处死。军分区武工队同时处死了特务队长。此后，该特务队人人自危，有的听说武工队来了，吓得两腿打颤，连自行车也不会骑了。就这样，这个特务队中作恶多端的特务被处死了，怕死的特务跑了，不久就全垮了。

此外，寿张县境西南有个姓符的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他勾结日伪抢掠民财，杀害群众，民愤极大。县委事先利用人事关系，将他的

枪支秘密取走，武工队夜间突入其宅院，活捉了这个土匪头子，在清水河集市上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处决。

武口村流氓、汉奸武兴仁，不接受抗日政府的教育，仍然作恶，武工队把他给枪决了。

寿张县武工队依靠人民群众，先后镇压一批民愤极大的汉奸、特务和土匪，有力地震慑了伪军政人员，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鼓舞，更加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在敌后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对于坚持、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第十一节 建立敌工部，分化瓦解日伪军

1942年日军“九·二七”扫荡后，县委根据形势发展，为了分化瓦解日伪军，遵照冀鲁豫区党委指示，成立了敌工部，受县委和军分区敌工科双重领导。该部既是县委的敌工部，又是军分区派到县里的敌工站。一批阶级立场坚定、政治可靠、智勇双全、胆大心细、善于交际应变、水平较高的干部。被选调了到敌工部工作。县委敌工部长由县委组织部长李哲兼任，后由戴德继任。敌工部成立之初，干事有杨萃民、于峻峰、赵凤生、路忠、曹信、刘玉山、岳振三、曹兰斋等人。1944年，李哲、戴德先后调走，杨萃民任副部（站长）长，主持工作。

敌工部的任务是：深入敌占区和潜入敌人内部，利用亲友、同学、同乡等关系，或依靠统战对象或依靠党支部，团结爱国知识分子，了

解敌情，分化瓦解敌人，在敌伪人员中发展内线关系，壮大革命力量，为抗日斗争服务；配合八路军和抗日政府保卫和扩大解放区。敌工部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伪军、伪组织、伪政府人员，其次是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其他顽杂武装人员。在严重困难时期，敌工部成员深入敌占区工作，尽管困难多，风险大，但他们机智勇敢地争取到多数伪乡长、伪中队长等伪军政人员与敌工部建立了内线联系，这些人员心系抗日，为八路军和抗日政府提供情报，掩护干部，不扰民，不害民。敌工部和地下工作人员在白天过封锁线，他们也不过问。

敌工部还通过统战对象做了许多争取瓦解伪组织人员的工作，既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又完成了争取瓦解敌伪工作的任务。戴德对蔡如清的团结争取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蔡如清，四区蔡楼人，是全县头号绅士、大地主，开始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些惧怕，不愿和抗日政府接近，交公粮也不积极。经戴德耐心争取教育，蔡如清逐渐悔悟，积极交公粮，支持抗日军队，帮助敌工部对伪军、伪组织人员进行了一些说服教育工作，并利用他家的条件，在敌人扫荡时掩护了不少抗日干部和伤病员。让像蔡如清这样有社会地位，有人事关系的统战对象去做工作，就要交待政策，讲究工作方法和如何进行教育等问题。这些统战对象通过实践，对党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增加了对党的信任，做有益于抗日的事更积极了。杨萃民在二区就是这样通过统战对象王朝阳做敌伪工作的。王朝阳是二区的耿王楼人，为人正直，洁身自爱，富有爱国思想，为一方开明人士。当日伪军在耿王楼安了据点后，伪区长曹怀贞拉他下水，劝他当汉奸，他坚决不干。当杨萃

民提出利用过去的关系，做争取伪区长曹怀贞的工作时，他以“不愿与汉奸交往”，表示自己的清高。经杨萃民多次和他谈话，说明在敌人内部发展抗日的力量，瓦解敌伪，化敌为友，这是党的政策，意义重大。他思想通了，多次对伪区长曹怀贞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曹怀贞很快与敌工部建立了关系，接受了共产党布置给他的任务，而且表现不错。有一次，他的汉奸队抓到八路军两名侦察员，经过王朝阳向他做工作，曹怀贞把人放回，而且两支短枪也交还给了八路军。

1943年6月，八路军主力一部和昆张支队，以及寿张、张秋、昆山等县大队发起昆张战役，一夜拔除敌据点20余处。此战役，伪军起义投诚1000多人，都是未经交火，由八路军用喊话的办法，缴械投降的，八路军无一伤亡。当时，军分区首长表扬了寿张、张秋、昆山等县的对敌伪军工作。伪大队长沈广训还有点不服气地说：“这不是八路军军事上的胜利，是他们用政治手腕，我们的人上了当”。其实这次战役，既是共产党对敌政策的胜利，也是军事上的一大胜利，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威力，开展敌伪工作也是困难的。

敌工部还与县城内地下党组织秘密保持着联系，及时传送情报。鉴于敌人活动时常拂晓出来，傍晚四门落锁，不准任何人出进的情况，党组织利用伪军内部的关系，以给病人送药为名，数次派地下党员姚义元夜晚由防守的伪军从城墙上用绳子放下来，将城内军事情报送往目的地。当时，寿张城内日伪军为宣传“王道乐土”，迷惑群众，成立了反动的会道门组织。其中“安清道义会”、“一贯道”、“圣贤道”势大人众。沈广训亲自入道，为“安清道”身份最高的成员，共产党

员朱继海奉命打入该会，以会员身份经常到沈广训家“拜访”，侦察日伪军上层人物的动向，收取敌人的军事情报。

地下党组织还利用敌伪机关的油印机，秘密印发抗日传单，有时利用在伪县公署院内放映电影之机，将传单散发一地，有时将抗日政府的布告贴到伪县公署照壁上。日伪十分惊恐，经常四门落锁，清查户口，由于地下党组织准备工作好，始终未暴露目标。

为争取伪军中下层人员反正，军区敌工部印刷了一面是关公像，一面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抗日同情证”，发给可教育的伪军人员，涣散敌人军心。经过敌工干部的艰辛努力，寿张县17个伪军中队不少人接受抗日同情证，与敌工部建立了内线关系，在解放寿张城时，伪军大部分起义。

第十二节 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民主民生运动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实行的土地政策，代表了占农村人口大多数雇佃贫农的利益和要求。由于两千年来的封建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再加上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残余势力还相当强大，因此，实行减租减息自始至终充满了尖锐而复杂的斗争。进行减租减息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发动、组织农民群众，通过斗争，从政治上打垮地主在农村直接或间接的对农民的统治势力，削弱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使大多数贫

苦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树立以雇佣贫农为主体的在农村的政治优势，提高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抗日战争初期，寿张县境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虽然较早，也比较普遍，但是侧重在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上。1940年前，主要提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行合理负担，共同抗战，以及改善劳动条件，减少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磨擦。虽然进行了减租减息，改造区村政权，但由于认识不足，措施不力，致使减租减息工作普遍存在以下问题：有的村庄佃户、债户较少，地主富农势力较大，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不起来；有的村庄村政权被地主富农掌握或操纵，组织假农会，明减暗不减；有的村庄农会干部被地主收买，白天减租减息，晚上送回；有些人宗族观念严重或有变天思想，不敢和地主开展斗争；有些地主富农施用小恩小惠或攀亲结友等手段，腐蚀软化干部和群众；有些地主富农分子隐瞒土地或用假卖地的手段转移土地，使一部分土地变成了“黑地”；有些村庄的一些枪支掌握在地主富农子弟手里……总之，相当一部分村庄的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村政权实质上是被地主阶级顽固分子直接或间接把持，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政策没有真正执行，封建剥削制度没有多大触动，党支部软弱无力，没有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根据地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雇佣贫农在政治上与社会地位上没有取得真正优势。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对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作了更明确、更全面的规定，阐述了农村各阶层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指出：实行减租减息扶助农民，减

轻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对资本主义及富农生产则要奖励。所以，党的土地政策是“实行减租减息，保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党员和群众中存有开展民主民生斗争的热情但没有真正发动与组织起来的右倾错误，而且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也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和开展群众斗争。因此，要在广大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之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于6月发出《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冀鲁豫区党委于7月初召开民运工作会议。9月中旬，刘少奇曾尖锐地指出，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

为了推动民主民生运动深入而健康地开展，逐步地削弱寿张县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剥削，使农民的要求得到适当的满足，又让地主过得去，并由此来调整根据地的阶级力量，以团结一切抗日的人（包括有抗日要求的地主）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寿张县在抗战初期开展减租减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爱国民主人士、开明绅士带头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并发动广大雇佃贫农，一面按民主政府规定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一面按政策规定缴租缴息。

根据中共中央和冀鲁豫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寿张县党组织自上而下召开民运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力量，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民主民生斗争，确立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打击不法地主，团结中农，巩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就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具体组织、领导及工作步骤问题作出了决定。

寿张县的减租减息工作，大致经过发动、斗争、巩固三个阶段。一是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发动群众阶段。主要是了解地主和佃户的数目、租佃关系、剥削情况，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和合理负担政策，鼓动群众组织起来；二是开展斗争，实行减租增佃阶段。方法是召开群众大会，讲明抗日民主政府关于减租的政策，按政策规定实行减租。开展“地主和农民谁养活谁”的宣传和辩论，使广大贫雇农了解劳动创造世界、是种地农民养活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农民的道理，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并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勇有谋的群众领导，为改造村政权培养了一大批农村干部。对抗拒减租减息政策和查有实据贪污、隐瞒土地的地主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实行增资增佃和彻底实行合理负担，对于讲明政策后愿意按政策办事的地主不予斗争。为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减租减息只从县、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算起，对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前已交的地租、利息不再退还；从抗日民主政府建立算起，过去3年按二五减租，即每百斤租额减低25斤。而今后佃户分租数目则按现在所得数增加25%，这是总的标准。但不同情况又有不同的标准，大种地定额减去25%，小种地实行二五增佃，是从佃户得数中增25%。逃亡地主的租不能超过25%，对于过去的欠租问题，年多免交，最近者按减租后的数分期交。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开始减息工作。抗日战争前的利息至今没交的，按月利分半计算。如年年拿息的，按已拿息总额来算，所付息已超过本钱一倍者，停息还本，分期三年四年还完。如果所交利息，超过本钱2倍者，本利不再还付。这样即减轻债务人的负担，也照顾了债权人的利益。雇工增资标准是：

照战前工价折粮，以战前工资所能买粮数增加 20%，如某地区雇工工资最高为 60 元，粮价为每斤小米 1 角，可买小米 600 斤，以此为标准，增加小米 20%，雇工便可领取 720 斤小米的价款为工资。这便排除了物价上涨因素，使贫雇农取得实际利益。通常把这些规定简化为“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二五增佃，五一增资”。三是巩固阶段。在充分发挥群众的基础上，对地主阶级直接或间接操纵的村政权进行改造。为防止减租减息后地主退佃，组织佃户和地主签订契约，使佃户有长期承租权。这样从经济上削弱了地主的利益，保证了佃雇农的长远利益。减租增佃之后，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规定农民按减租之后的数目继续交租，使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能够保有一定的经济利益和地位，打击了日军引诱地主投降反共的阴谋。从而，从经济上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

推进合理负担，是民主民生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抗战进入困难时期，为保证抗日粮款的筹备，规定每人 1 亩免征地，按 1.1 的累进率计征，累进率计征的负担数额，最高不超过 30%。1943 年实行《简易合理负担暂行办法》，规定所有耕地除免征点外，一律按进率计征负担，动产与劳力收入暂不计征，接近敌占区和敌占区的人民也有负担义务。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地主和富农肥地多、贫苦农民薄地多的状况，决定按土地肥薄分等负担，并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评议。这样做的结果是：基本群众的负担减轻了，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提高了，也体现了中共中央制定的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针。

在基本区和接敌区未改造过的村政权中，普遍存在严重的贪污浪

费现象。一些村政权随意摊派公粮、公款，借以自肥。而受害最深的是基本群众。还有一些村干部逃避负担。据此，抗日民主政府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按“三三制”原则组成算帐委员会，开展清查帐目、追缴退款的反贪污活动。群众发动起来后，即着手将村政权中地主和富农的代理人、恶霸分子、坏分子通过改选撤换下来，把基本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选入政权。实际上这是一场带有夺权性质的尖锐斗争。通过改造村政权，使基本群众在农村政权中占据了优势。

清查黑地是和推行合理负担相联系的一次民主民生斗争。黑地是地主富农转嫁负担的手段。他们土地多，便于隐瞒，而且，与旧政府官吏勾结，也能够隐瞒。在寿张沿黄滩区，土地极不稳定，地主、恶霸、富农往往强占黄河淤地，而在计算负担时将这些土地瞒下。再者，地主、富农常趁贫苦农民之危，买下土地而不接受缴纳公粮的任务，形成了有地不纳粮，交粮没有地的极不合理的现象。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政府收入，必须把隐瞒的黑地清查出来。为此，抗日民主政府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多次发出指示，确定黑地的含义，规定查出黑地如何补交粮以及如何奖惩等。反黑地的第一步是发动群众，成立清查地亩小组，把地契和“完粮单”与现实种地数目进行对照。同时，发动长工、佃户与“当家”的划清界限，揭发他们隐瞒的黑地。宣布：中农有黑地的，只要如实报出，今后按数交纳负担，不补交公粮。土地数目查清后，根据合理负担的五项原则，把土地登记造册，然后按土地的好坏分等划级，共分五等十一级，再按累进率计算出负担。这种按累进率计算合理负担的方法，打破了不合理的平均摊派，符合富

的多拿、穷的少拿、没有的不拿的原则，从而减轻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负担，削弱了地主的经济力量。这一运动的开展，使各阶层的负担趋向合理，从而调动了群众抗日的积极性。

寿张县民主民生运动的形势是“无村不运动，无村不斗争，处处点火，村村冒烟。”群众运动就这样一浪高过一浪的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寿张县的民主民生斗争取得了胜利，基本群众得到了发动，并在村政权中占据了优势。这一时期的民主民生斗争也有缺点，主要是：有些地方工作局限在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身上，未放在发动广大群众上面，在斗争中有包办代替现象；正确的策略指导与具体情况结合不够，有生搬政策的教条主义现象，特别在反黑地与争取中间势力方面，有“左”的表现。这些经验教训，为以后全面、深入地开展群众运动创造了条件。

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民主民生运动的开展，引起了农村社会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使千百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逐步削弱。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上。广大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都有很大提高，雇农大量上升为贫农，贫农大量上升为中农。地主总产数和占有耕地数都减少了一半多。地主阶级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农村阶级结构和土地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中阶级的两极分化大为缩小，大部分土地已经逐步转移到自耕农手中，中农化的趋势已极为明显。

这种变化也表现在租率的减低与租佃形式的单一化上。减租减息是渐进的，而且不平衡，所以减租减息期间及以后，仍然保有相当数

量的租佃关系。但总的变化不小。第一、这时的租佃形式，已大都确定了佃农的永佃权，租佃期限变为5年以上。活租和小种地等类的超经济剥削基本上被废除了。第二、租率一般减低了，并且逐渐做到按土地质量、产量改订租率。按抽查的寿张40个村的平均租率，已由36.5%减至16.87%。

这种变化还表现在基本群众阶级地位的上升和抗战热情的空前高涨。在民主民生斗争中，基本群众在思想上开始了解到自己贫苦的根子，要求在斗争中摆脱痛苦。他们在政治上有了觉悟，敢于向地主进行斗争，在组织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团结在党的周围。中间力量开始与顽固势力分化，向基本群众靠拢。民主民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带领群众民主选举村长，实行民主政治，夺回了一些被地主控制的村政权。翻身农民踊跃参加民兵、自卫团和农青妇各抗日群众团体

党领导的这场民主民生运动，使封建剥削关系受到极大的削弱，导致了广大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农民生产热情的提高。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民的生活开始有了改善和提高，既确立了群众的政治优势，又增强了抗战的物质实力。主要表现在：1、民主民生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建党工作，大批雇佃贫农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充实健全了群众组织，改造了农村政权，形成贫雇农在农村的政治优势，基本群众经济生活得到改善，政治地位翻身，特别是妇女解放更为显著。3、从农村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中选拔的一大批脱产干部，

充实和加强了党政领导机关，密切了党政机关同群众的联系。4、激发了群众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壮大了部队，改善了部队的素质，更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本质。5、雇佃贫农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的改善，大大提高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公粮和其他物质的供应。6、农民随着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进而要求文化上的进步。农民热情学文化，积极支持办教育，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7、削弱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改变了宗法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贫雇农掌了权，群众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自觉地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了社会安定，使广大农村初步呈现出新民主主义新农村的景象。

总之，民主民生运动的广泛开展，使抗日根据地获得空前的巩固，各项建设事业得到蓬勃开展，对敌斗争的力量大大增强，为夺取寿张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第十三节 建立健全群众组织，开展参军运动和拥军优属活动

一、整顿发展民兵组织

在民主民生运动开展前，有的村庄没有民兵，有些村庄民兵素质差，一部分枪支掌握在地、富子女手里。在民主民生运动中，没有民兵的村庄很快建立了民兵组织；原有民兵组织的村庄进行了整顿和改造，挑选了一批优秀分子充实了民兵队伍，同时，将一些政治上靠不

住、表现不好的人清理出去，进行了“枪换肩”。民主民生斗争结束后，各地又选派了一部分优秀党员担任领导或骨干，在中共村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整顿改造后的新的民兵组织，担负着巩固联防，对日伪军作战，维护社会给安，镇压汉奸、特务、恶霸地主和一切坏分子破坏活动的任务。民兵成为中共村党支部组织带领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和保护群众利益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

二、发展和加强群众团体

在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前，全县特别是抗日中心区普遍建立了群众组织，但有些村庄的群众组织有名无实，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有些村庄的青年特别是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受到家长和丈夫的干涉。随着民主民生斗争的深入开展，人们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青年妇女出门参加活动，不仅不再受到家长和丈夫的阻拦，而且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支持。许多青年妇女在斗争浪潮中得到锻炼，增长了才干，涌现出一批有才干的干部。在民主民生运动中，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姊妹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普遍得到了发展和加强，工作活跃，发挥了其职能作用。

三、开展参军运动

经过民主民生斗争，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参军打鬼子保家乡成为广大青年的心愿。1944年春，全县掀起了参军热潮，各区青年踊跃参军，到处涌现出“父母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新战士入伍，披红戴花、乘车骑马，各村群众敲锣打鼓，热烈迎送。

四、组织拥军优属活动

在开展参军运动的同时，进一步组织开展了拥军优属活动。翻身农民为支援前线，积极交纳公粮、交好粮，大车拉，小车推，把公粮送到指定地点。部队一驻下，妇救会便忙着碾米、磨面、做军鞋。战斗未打响前，担架队就随军在战地听用。平时，各村群众给军烈属代耕、挑水，节日登门慰问，及时解决军烈属生活上的困难。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如同一家人”的新型关系。

第十四节 军民团结一致，战胜严重灾荒

1941至1943年，整个华北大旱。尤其是寿张县境，在接连遭受1939年以后的冰雹、疫灾之后，旱情更为突出。河渠干涸，大地龟裂，未到秋收季节，田野里就成一片枯黄。除个别洼地的早瓜、早秋作物有一点收成，晚秋作物则没有收成，出现了历史上百年罕见的灾荒年。继旱灾之后，又发生蝗虫灾害，黑压压的蝗虫铺天盖地，蝗群飞过之处，禾苗树叶全被吃光，许多地方颗粒无收。

灾民们为了生存，在饥饿、破产、逃荒、死亡中挣扎。没有粮食，就用糠菜、草籽、棉籽、树皮、草根等代食。严重的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和“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为了活命，除少数地主、富农外，几乎家家都变卖田地，耕畜、家产、粮食贵得惊人，1亩地仅换3升高粱，200斤粮食可买一个四合院，几十斤粮食能买个大姑娘。中农以下的农户纷纷破产。更

有甚者，许多人卖掉妻子、儿女，卖人和自卖现象随处可见。许多村庄除走不动的老人看家外，群众大部分逃亡，去河南，闯关外（东北）。县境村内、屋中、路旁到处可以看到尸体，户无炊烟，一片荒凉，人民挣扎在饥饿和瘟疫的死亡线上。

灾荒的出现，既因天灾，也因敌祸，且敌祸是主要的。自 1941 年以来，敌人的频繁“扫荡”、“蚕食”，连续的“治安强化运动”，残酷的“三光”政策，长期的经济封锁，使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顽军的进犯、抢掠，土匪、反动会道门的骚扰，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更加困难。再者，根据地的封建顽固势力在农村中没有得到彻底削弱，仍在个别农村中占据优势地位，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基层政权，他们对基本群众在经济上进行剥削，政治上进行欺压，或额外摊派，就使平时就处于温饱线以下的基本群众，一遇天灾，便陷入难以摆脱的厄运之中。

天灾人祸严重地威胁着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抗灾救灾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寿张县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冀鲁豫区党委行署的部署，积极采取以下措施，发展生产，救济灾民。

一、建立组织、加强领导。建立县、区各级救灾委员会，由县长、区长兼任主任，实行具体领导。组织干部对受灾情况进行调查，根据各地受灾程度 分别对群众的公粮实行减征或免征。将受灾的群众划分为有粮户、缺粮户、有钱买粮户、无钱买粮户几种类型，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贷款和救济。

二、精兵简政、节粮救灾。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物质困难，

中共中央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缩小党、政、军机构，精减人员，特别是机关行政人员和部队非战斗人员，充实到基层和连队，并规定脱产人员只能占根据地人口总数的3%，其中部队占2%，党政系统占1%。寿张县根据中央和区党委的部署，从县区机关中精简了一批干部回农村任职或回家生产，同时，抽调了一部分县负责干部到区任职。为了度过灾荒，寿张县号召党政军民节粮、节菜，并动员组织群众把树叶、花生秧、红薯秧、野菜、榆树皮等代食品储藏起来。县大队、区队每人的口粮减少一半，即从原来每人每天定量一斤八两减少到八两（老秤），全区党政干部按定量减得更多，最艰苦的时候，每人每天只有四至五小两，吃不饱就用红薯秧、树叶、野菜、胡萝卜充饥。

三、设法筹粮，实行赈济。1942年到1943年，在黄河滩上，群众种麦、种豆仍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寿张县在部队和民兵的协助下发动群众，调出大批粮食支援重灾区。把这些救命粮用毛驴驮、小车推、扁担挑、人抬等，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送到灾民手中。县抗日政府也设法筹集一部分粮款，有组织地赈济了建立抗日政府或两面政权村庄的灾民。县委在轻灾区成立粮食调剂所，展开“一把米一升糠运动”，提出了“根据地是一家人，快快救济受难的同胞”、“一两米能救活一个，一斗糠穷不了一家”等口号，每人每天节约小米1两（后改为2两）捐助灾民，同时严格执行有关不与民争食的纪律，哪怕是几株野菜、几斤树叶也是如此。轻灾区的群众和开明绅士也纷纷响应厉行粮食节约以救济灾民的号召，勒紧腰带支援重灾区。为了筹集更多的救灾粮，各级政府组织武工队昼伏夜出，深入敌占区，打击汉奸、恶霸，

向绅士名流进行宣传，征集抗日公粮，救济灾民。

四、开展借粮运动，就地自赈。在灾区，灾民四处乞讨，卖儿卖女，饥饿而死者甚多，而部分地主豪绅见死不救，囤积粮食，或趁灾民之危廉价掠夺土地和财产。为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党和政府组织群众开展由党委领导、抗联出面、农会为主、政府调解的向地主借粮运动，借粮给群众，作为政府预征公粮。借粮以“团结抗战，一致对敌，安定抗日秩序”为原则，以“同舟共济，借粮保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救济灾民就是抗日爱国”为宣传口号，派出工作组深入到村，一方面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一方面对地主豪绅进行分类排队和宣传动员。政策规定：借粮时留够地主富农全家吃用的，有借有还；对早拿出粮食的开明地主进行表彰，对讨价还价的则进行批评；对顽固的地主大户，群众代表小组即率群众登门说理，不出粮不散，甚至要他管饭；对因不满而勾结敌人报复者，抗日政府则依法追究。工作组还通过地主、富农的佃户、雇工摸清地主富农存粮底子，防止有些地主富农假说没粮可借。经过认真地宣传和斗争，许多地主拿出了粮食，有的捐四五十斤、百余斤、几百斤，政府将这些粮食赈济群众，并优先照顾军属和鳏寡孤独的老人。

五、安置灾民，外出求赈。抗日民主政府对实在无法渡过灾荒的难民，特别是老、弱、病、残者，印发灾民证，介绍他们到外地区就食，并大力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不要歧视外地灾胞，要想法安置救助他们。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安置灾民列为头等大事，教育群众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与灾民同甘共苦。县、区救灾委员会分别组织大批干部，

深入农村，依靠群众，采取多种措施，如安置住处，向地主借粮，以工代赈，组织灾民参加生产等。

六、大力开展生产自救。1943年初，根据上级关于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指示，寿张县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动群众、着眼生产、因地制宜、军民自救的方针，即变单纯赈济为“以工代赈”，提出了“生产救灾”和“互助渡荒”的口号，在灾区扎实地开展生产救灾运动，以互助为主要形式进行“以工代赈”。由于灾区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人口锐减，要进行生产自救，必须把灾民组织起来。县、区都成立了抗灾救灾委员会，并在区设借贷组，村成立了以农会、妇救会会员为主的劳动互助组、合作社，并把灾民合作社作为发动与组织群众生产的主要形式，负责粮款、农具贷放和以工代赈等具体工作。合作社、互助组的组成主要是因地、因人制宜，从家庭实际情况出发，本着自愿结合、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较细的分工，灵活地组织拨工换工，调剂劳力，从事农业、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按业务性质建立的，如运销、信用、生产合作社，有按群众组织建立的，如青、农、妇等合作社。政府采取组织纺织运输合作社，以及运粮、打井、熬硝晒盐、贷款等办法，开展生产自救。规定参加纺织合作社者，除织布赚钱（1匹布可赚38元，以当时的米价可买3斤4两）外，每个纺织者每日贷米2两，运粮赚米每日所得，除自吃外，还可再供一个人吃饭；挖土井一眼得米30斤，砖井每眼政府贷粮300斤，砖由公家解决；晒盐每人每日可得60元，能买谷子5升。春播前，政府发放生产贷款，让群众购买生产工具、种子、牲口等生

产资料，并贷给部分生活粮。以互助形式进行“以工代赈”，初步扭转了救灾工作的被动局面，不仅把灾民组织起来，弥补了劳力、耕畜和生产工具的不足，增强了灾民生产自救的能力和信心，增加了生产，也为今后的农业生产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七、大力恢复农业生产。1943年春，县委在灾区着手组织群众开展农业生产，进行春耕春种，以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奇缺问题。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把“以工贷赈”和普遍贷款贷种及进行重点救济结合起来。如春耕春种的基本生产要求是打井防旱，多种早熟作物，政府使用“以工贷赈”方式进行贷粮贷种贷款，扶持打井春种，对实在无力生产者及部分烈军属，则以救济的形式使其从事生产。在灾区，每挖一口土井，贷给生活粮和种子200斤到300斤不等，并补助粮食八九十斤；翻1亩地，贷给四五十斤粮食。通过认真组织春耕生产，县境抗日根据地除“无人区”一部分土地未耕种外，其他灾区都完成了春耕春种任务。随着早熟作物和野菜、树叶等代食品的增多，灾区出现了转机。

1943年8月初，久旱的灾区普降透雨，灾区军民及时开展大生产运动。抗日民主政府贷粮、贷种、贷农具、贷牲畜，动员党政军民一切力量组织抢种，还制定了一系列生产救灾的政策和措施。首先采用招抚大批流亡人口回故土生产和移民垦荒的办法，解决灾区劳动力极度缺乏问题。政府规定：对回故土而无力生产者，贷给种子、生活粮及农具；对无地种者，政府帮助解决土地，租种公地的，交租不交公粮，种逃亡地主及政府没收汉奸土地的，交公粮不交租，并将部分

汉奸的土地分给灾民及烈军属。同时，要求各党、政、军机关和团体、学校到灾区开荒生产，统一组织各轻灾区群众到重灾区开荒，既可在灾区安家，也可短期以工队形式到灾区生产。到灾区安家者，除享受当地居民同样的政治、经济待遇外，另由政府解决房屋或粮，并贷给一定数量的农具及生活粮；租种地主土地者，实行九一交租，租期3年，免除负担粮2年。这项政策的实施，吸引了大批群众到灾区安家生产。其次，颁布回赎政策，解决阻碍发展生产的生产关系中的问题。大灾荒中，灾民典卖土地求生者甚多，但土地典卖价格极底（有的几个窝头即可换地一亩）；买卖人口现象也相当严重，不少群众失去妻子、儿女。此种土地变动和人口买卖，显非一种正常现象。灾荒基本解除以后，纠纷日益增多，直接影响抗日人民之间的正常关系和生产运动的发展。为此，根据上级的回赎精神，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43年冬作出回地赎人的决定。规定：凡地主、富农、汉奸所买农民的土地，准许全部赎回；农民之间互相买卖的土地，高阶层的准许低阶层的赎回，阶层相等的可赎回一半；地主、富农、汉奸卖给农民的土地不准赎回；因债务关系而转卖的土地也要赎。有春苗的，土地先回给原主管理，待庄稼成熟后，二八分成。通过回赎，灾民失去的土地又回到自己手里。关于赎人，规定凡因灾荒卖掉亲人者，买卖关系无效，可按原价把人赎回。为支持灾民回赎，使灾民尽快赎回亲人投入生产，抗日民主政府还发放大批赎地、赎人所需的贷粮、贷款。抗日民主政府的上述规定和措施，深得群众拥护。尤其是通过赎人，分离的妻子、子女又重新团聚在一起，因而，焕发了群众支持党的事业的积极性、

自觉性，抗日和生产自救热情空前高涨。

八、大力发展生产，积极开展反抢粮斗争。寿张县党政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口号，动员组织群众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每逢春种、秋收季节，抽调大批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互助组、变工队、代耕队，以保证适时播种和收割。在农闲季节，组织群众纺棉、织布、熬硝、熬小盐，发展副业生产。机关、部队驻在哪个村里，就帮助那个村的群众搞生产，如打井、积肥、锄草、收割等。1943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邓小平关于动员全军助民春耕、节约粮食、救济灾胞的讲话，第二军分区七、八、九团在台前境内帮助群众春耕。与此同时，机关、部队还自己开荒种粮、种菜，饲养家畜家禽，做到了蔬菜自给，供应逐步好转，生活改善，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又保证了战斗的需要。

此期，日本侵略军推行“以战养战”的方针，每到麦收、秋收季节，便疯狂的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抢粮为主要目标的“扫荡”，妄图抢光根据地的粮食，饿死抗日军民。为反击敌人抢粮，保护群众的粮食，每逢农作物快成熟的季节，抗日军民齐动员，部队帮助群众快收、快打、快藏，做到清室空野，并抗击扫荡、抢粮的敌人。民兵游击小组和群众一起行动，袭击敌人运粮车队，打击零星敌人。在每次反扫荡过程中，都有一些村干部因坏人告密而被捕，在敌人的酷刑折磨下，他们宁死不屈，闭口不说藏粮地点，有的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当时，群众的藏粮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是根据粮食数量、品种和住地的地形、土层性质、地下水位高低，以及家内外有哪些能迷

惑敌人的东西，如柴垛、猪圈、粪堆等，因地制宜，进行藏粮。群众个人藏粮的地点和方法对其他人是保密的。干部只是一般号召，提出一些办法供群众参考。公粮隐藏的方法，由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共同研究，有的是做假坟，有的是在土井内打横洞等。

县委在向根据地和游击区群众普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坚决打击敌人在接敌区附近派粮款活动，并开展反资敌斗争，对偷偷向敌人缴粮、缴款的地主、流氓分子，经教育不改或情节严重的，坚决予以严惩，并采取多种措施，堵死粮食流向敌占区的渠道。

至 1943 年秋，经过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抗灾的初步胜利，基本战胜了灾荒，并赢得秋季好收成。抗灾救灾和军事斗争的胜利，以及民主民生运动的开展，稳定了根据地的抗日秩序，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密切了军民、军政、党群关系，使根据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得以巩固。

第十五节 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的建设

寿张县的整风运动，从 1942 年 6 月开始至 1945 年 6 月结束，历经 3 年。寿张县各级党组织自 1938 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以来，党员大量增加，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这些党员有革命热情，但没有受到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没有经过严格的思想改造。他们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农民意识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或多或少地带到了党内。其中有

不少人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就使三股（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不正之风在党内获得滋长的条件。另外，从对敌斗争方面看，整风运动开始时，寿张县正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对敌斗争还没有取得优势，根据地很不巩固，并且有继续缩小的危险，减租减息还不深入、不广泛，根据地群众还没有普遍深入地发动组织起来，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有些也不够巩固，自然灾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党员干部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工作不起劲或者不工作，有的甚至背叛了革命，有的基层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真正把党员统一起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战胜敌人，开展整风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中共中央和冀鲁豫区党委对开展整风运动的部署，寿张县党、政、军、群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都参加了这一运动。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方法是：认真学习整风文件，联系个人工作思想实际和所在地区、部门的实际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对革命的危害，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提高理论政策水平，明确方向，改进作风和工作。主要强调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中央文件，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这是贯穿整风运动全过程的显著特点。整风学习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2年6月至1943年底）是整风的初步学习阶段，第二阶段（1944年初至年底）是整风的系统学习阶段，第三阶段（1945

年1月至6月)是发扬民主、检查领导、普遍反省总结阶段。

在整风学习过程中，将整风文件分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三大类。方法是：先粗读，再在粗读的基础上进行精读，以个人阅读、集体讨论为主，讨论实际工作问题，总结经验。提倡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文件，检查自己，启发、带动别人；提倡畅所欲言，实事求是，正确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不仅要找出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而更重要的是要找出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和改进的方法，同时注意发扬自己的优点。

一、整风的初步学习阶段

1942年上半年，寿张县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文件报告，并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风的指示，发出开展整风的通知。通知阐明了党的整风运动的性质、目的、要求和方针方法，指出了开展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要求全体党员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积极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并认真学习中央规定的文件，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反省、检查，纠正各个部门和工作中存在的歪风。

1942年秋，根据上级统一安排，开始整风学习。县委成立初级组，并根据地委指示具体安排了区委学习计划，编印了区委、支部的整风教材，印刷了部分整风文件，发到全县党、政、军、民各级机关、学校和部分群众团体。各级党组织均进行了整风动员，划分了学习小组，制定了学习制度。除党的学习日外，每天保证平均两小时的学习时间，并实行小组周总结、大组月总结制度。主要学习毛泽东的《整

顿党的作风》、《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 22 篇文章，并提出了学习要求。把所学文件具体规定为学风、党风、文风三类，逐件地讨论研究，深刻领会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深刻地反省自己工作上、思想上、作风上是否存在着不正之风。对每一类文件，分别指出了县级、区级及支部联系实际的重点，反对学做不一。要求发扬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检讨，切实整顿三风，团结干部和党员改进工作。以个人阅读、集体研究为主，阅读时要作详细札记和提纲，讨论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以加深对文件的领会。由于 1942 年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及“蚕食”，加上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县境根据地的局势极度恶化，对敌斗争处在最艰苦的时期，特别是县、区干部处在对敌斗争第一线，流动性很大，没有坐下来集中进行学习的条件，同时区以下干部普遍文化水平低。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大部分采取了定期集体讨论和讲课相结合的方法，学习整风文件。整风运动未能深入开展，仅局限于阅读文件。1943 年底，随着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彻底转变，抗日根据地的局势逐渐好转，为有组织较系统地进行整风学习创造了一定条件。

二、整风的系统学习阶段

1944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 1944 年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利用战争与生产的一切空隙，继续开展整风运动。2 月 21 日，冀鲁豫边区整风总学习委员会主持召开全区深入整风动员大会。寿张县委根据会议精神，在总结 1943 年整风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整风学习，把整风运动作为 1944 年的中心任

务之一。县委整风运动开始进入系统学习阶段。这一阶段持续到年底。其中5月至8月为相对集中整风学习时间，具体分为前段、中段和后段。前段主要学习关于学风的文件，反对主观主义，清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段主要学习关于党风的文件，反对宗派主义；后段主要学习文风的文件，以反对党八股。特别强调要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空谈、不联系实际与不反省等缺点。在整风学习过程中，主要做法是：（一）进一步发动党员群众，提高党员群众对整风重要性的认识；（二）重新改组学习委员会，学委会书记由党委（支部）书记兼任；（三）利用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培养骨干与带动全面相结合等各种形式，完成学习任务。许多单位根据党员所处的环境划分学习小组，抓紧季节性和战斗空隙，挤时间学习，“青纱帐”期间实行半日学习制；成立整风工作队，抽调党员干部集中学习，培养骨干，取得经验，指导全面，对没有阅读能力的党员举办学习班，通过上课的方式学习；举办党员训练班，抽调不同类型的党员到训练班学习，为深入开展整风学习培养骨干。年底进行整风总结，肯定成绩，找出存在的问题。

县区级干部及广大党员，多在基层，处于各项工作的第一线，他们的学习成效如何，决定着整个整风运动的效果。为此，根据上级指示，县级干部的学习，主要是以整风精神，求得对边区高干会议的深刻了解与具体运用；区级干部主要是在学习整风文件的同时，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并贯彻上级有关会议及整风精神。对于敌占区、游击区的干部学习，主要根据各地的干部水平及工作需要。在学习中，针对当时普遍遇到的“无人学”和“学不懂”的问题，采

取了定期集体学习与上课讲授的办法。

经过 1944 年的整风学习，绝大多数干部完成了学习任务，而且发扬“脱裤子”、“割尾巴”（形容检讨错误不怕丑、不怕痛）的精神，检查和揭发了党内、军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军阀主义的倾向，克服了某些错误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有些改进，但是客观上由于战斗频繁，环境紧张，难免对整风学习抓得不紧，学习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的具体的领导，学习中没能把精读文件、深入反省、检查工作三个不可分离的环节密切联系起来，因而整风不够深入，作风转变不太显著，还基本上停在整顿学风阶段，有些党员认为暴露了问题就完成了整风学习，“对于从思想上有系统的分析、历史的检讨还不多。”整风还必须广泛深入地进行。

随着 1944 年底寿张县全境的解放，1945 年，全县各级党组织的整风运动进入日益广泛、深入阶段。

三、整风的发扬民主、检查领导、普遍反省总结阶段。

开展民主检查，在寿张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时间大体从 1945 年 1 月至 6 月，全县党、政、军、群所有机关领导干部及非党人士均无例外地参加，以检查领导为中心内容，以改善领导作风为主要目的。活动方式有交谈、座谈、小组会及小报、周报等。在运动中，领导干部既是整风审干的领导者，又是被检查者；既注意随时纠正极端民主化思潮，又放下架子，使群众大胆地揭露问题。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方法得当，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并把群众引导到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讨论中，从而使群众丢

掉了顾虑，克服了盲目性，开展了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了改进领导作风的目的。主要成绩有以下两点：一是以检查领导为中心，全面地暴露了各方面的问题。主要有：广大群众意见大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事务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某些不正确的干部政策，不关心、不了解群众，包办代替；机构重叠，规章制度不合理；小资产阶级及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存在等。这些大都是过去不自觉存在的，现在则有了清楚的了解和认识，为今后改造思想和作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二是使全体党员干部受到一次很好的思想教育。工农出身的干部懂得了学习党的政治理论和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开始跳出经验主义的狭小圈子；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并摸索到了一些做群众工作的艺术。平时盛气凌人的干部，也比较谦虚了，能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转变了工作作风，密切了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1945年6月，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寿张县整风运动，发展是健康的，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对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普遍深入的马列主义教育，提高了理论水平。整风运动前，寿张虽然是马列主义传播较早地区，党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县委却一直没有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没有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整风运动中，许多党员都认真阅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并联系本地工作实际，初步懂得了马列主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克服与纠正错误思想中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抗日战争的胜利局面，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

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寿张县的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分清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是非界限，自觉脱离小私有者的立场，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贯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锻炼培养了一大批能担负各方面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广大党员干部学会了正确的领导方法，党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第三、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由于寿张县委把整风精神始终贯穿到党的建设、对敌斗争、群众运动等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具体工作中，提高了人民抗战的积极性，从而战胜了困难，使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发展。寿张县的整风运动所以取得很大成绩，主要原因：一是有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能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与本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三是寿张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主流是好的，正确的思想作风一直在党内占统治地位。

第十六节 实行精兵简政和改造村级政权

1943年4月，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在日伪军活动猖獗、斗争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寿张县委主要采取了党政机关精兵简政三项措施：一是严格编制方案。脱产人员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3%。二是妥善安排精简人员。为了充实基层，实行县、区干部层层下派。另一部分精简下来的干部和脱产人员，有的回家生

产并在本地开展工作，有的参加机关生产。同时，既注意数量的减少，又注意了周密地调剂干部，提高了工作效率。三是和整风结合起来，加强思想教育。除结合整风普遍进行党的宗旨、精简整编的意义和形势教育，以克服本位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外，还对编余人员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正确对待精简整编，认识自己仍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自觉服从组织决定，以保证精兵简政的顺利进行。

精兵简政政策的贯彻实施，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使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十分精干，提高了工作效能。精兵简政前，平时吃饭者多，办事者少，工作中扯皮现象严重。精简整编后，党、政、军、群机关脱产人员大量减少，合并了伙食单位，撤销、合并了一些重叠机构，使党、政、军、群各部门在县委一元化领导下成为一体，指挥十分灵便，对敌斗争更加活跃。其次，精简了大量人员，这在灾荒严重、群众和党政军机关以及部队大量缺粮的情况下，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提高了群众抗灾救灾和生产的能力，促进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地开展。再次，提高了战斗力。精简整编使主力军一部分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形成了主力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更加适合于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环境。同时，促进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行，密切了党政、军民、各组织间的关系，增强了全局观念，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从1942年冬季起，全县普遍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瞒地（黑地）和减租减息斗争。经过民主民生运动，地主恶霸掌握和操纵的村政权被彻底摧垮。在中共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和讨论，推举出候选人，采取由全村选民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民主选举村长和村政委员会。各地民选村长的做法基本相同。大都是在减租减息运动过程中，在群众已发动起来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新的村政权。随后党对民选的村干部和群众进行民主和法制教育，使新的村政权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民主政权。各地由群众选举产生的村政委员会，一般下设民政、财政、文教、武装、公安等干部。经过改造后的村政权大都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里。

第十七节 发展宣传文化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期间，寿张县的文化宣传工作十分活跃。鲁西区党委、军区和运西地委先后分别创办的《灯塔》、《鲁西日报》、《挺进报》、《运西时报》和冀鲁豫区党委创办的《冀鲁豫日报》公开在这一地区发行。寿张县委宣传部组织翻印和编写的理论著作、政治教材和时事教育读物，如《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级和阶级斗争》、《游击战》、《时事讲话》、《党的基本知识读本》、《群众工作手册》、《党的建设》等等，出版后也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发行。这些报刊、理论书籍和时事读物，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后，县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简称文救会）

紧紧依靠群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与日伪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斗争。文救会的会员和团结对象主要是小学教员、在乡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热心文艺工作的积极分子，还有爱读古书的乡绅学究，后来发展到乡村说唱的艺人。其中包括以算卦、卖唱为主的盲艺人。县文救会的会员有几百人，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各文化、艺术团体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寿（张）范（县）朝（城）阳（谷）边的青年农余学社，不但参加人员多，而且非常活跃。青年人组织起来，学文化，学政治，学农技。同时，还进行对敌宣传工作，而且利用《冀鲁豫日报》读报组、写作小组、冬学文化教育组等形式，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文救会还充分发挥乡村盲艺人的特殊作用，不断举办盲艺人训练班，教唱一些有进步内容的小段，如《平型关大战》、《范筑先将军在南镇打鬼子》、《武工队进入敌据点》，以及《花木兰从军》、《岳飞抗金兵》等，然后在根据地演唱。在接敌区和敌占区，则演唱《小二姐思夫》、《身在曹营心在汉》等，并利用算卦等特殊形式，进行敌区宣传，瓦解日伪军。寿张县成立的青年剧社，深入生活，贴近实际，演出了《翻身保田》、《兄妹开荒》、《改造二流子》等许多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节目，对群众和部队的教育很深。

学校教育是抗日根据地教育事业的重要方面。当时，寿张县的抗日高小和中学突出政治教育，主要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社会科学概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时事政策、军事常识等。这些学校还把政治教育与实践结合起来，

经常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抽出一定时间，与地方干部一起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做群众工作，并配合大生产运动，边教学，边开荒生产，实现粮柴油半自给。这些学校是在战争环境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固定的校址。不论学校转移到哪里，都是借用民房。冬天上课是在院子里的阳光下，夏天是在村外的树荫下。借群众的门做黑板，学生以两膝当课桌，以大地和砖头当凳子，学习条件很差，生活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每人每天的定量不到1斤小米，不够吃就掺红薯叶、萝卜和野菜充饥。环境恶化时，有时一夜转移几个地方，有时冒着大雪行军，经常是和衣而卧。“夏乘树荫秋蓝天，桌是膝盖凳是砖，门做黑板粗纸记，各种教材自选编”，这是对当时学习情况的真实写照。这样的学校又是新型的学校，从其实际教学活动来看，既是一个学习队，又是一个宣传队、工作队、支前服务队和生产队，通过学文化、学政治、学理论和参加社会实际工作，使学生提高了思想、文化、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这些学校实质上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为部队和党、政、群部门输送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理想、有才干的干部。

1941年起，日军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和游击区，抗日教育工作受到很大摧残，不少学校被查封。国民党杂牌军在其统治区根本不顾及教育事业，日伪政权所办的一些小学，以实施奴化教育为宗旨，群众多不愿送子弟入读，就学儿童不足学龄儿童的10%。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抗日政府采取办法开办了一些游击式的抗日学校，敌人来时分散隐蔽，敌走后继续上课。为防

敌人突然清查，学生便站岗放哨，监视敌人行动。在县城附近的敌占区，抗日政府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开办“灰色学校”（即公开的学校），学生备有两套课本，平时主讲抗日课，敌人来时就换成千字文、百家姓等“新民”课本应付，室内设有藏书洞，紧张时就将抗日书籍藏起。广大师生通过黑板报、广播筒、标语、演戏、秧歌队、站岗、放哨、挖地洞等，配合支持了抗日工作。当时，教师月薪只五、六十斤小米，有的还拿出一部分用在办学和支援抗日上。广大教育工作者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带领学生一边学习，一边抗战，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为抗日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先后奔赴抗日战线。抗日教育在险恶的环境下，没有被压垮，1943年全县每区都建立了抗日小学，如大杨、清水河等抗日小学都是这个时候建立的。

在社会教育和群众教育方面，重要形式之一就是广泛开办冬学。办冬学不仅可以利用冬季农闲，给予大多数农民群众以文化教育，而且能够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以巩固与扩大群众运动。为办好冬学，县每年都分期分批办冬学教员训练班，然后全面展开。各区每年都召开由教师、党支部书记、村长、农会主任等参加的经验交流会，制定冬学具体计划，由村党支部书记或村长兼任校长，村干部亲自出面请教员，筹教室，制教具，组织群众入学学文化。师资一般由小学教师、群运干部、农村知识分子以及精简的一部分干部担任。冬学的主要组织形式是民众学校和识字班，教育的对象以有组织的民众为主，如民兵、自卫队、农救、工救、青救、妇救会员、儿童团员，并通过他们带动全体民众投入冬学运动。冬学不但学习文化，而且进

行群众性的形势教育、对敌斗争教育、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教育，以及科学知识、生产知识教育。他们没有纸和笔，就用木柴棒或石灰块在墙上写，在地上画。许多群众还开展了识字比赛，一天学两个字，有些人后来增加到一天学5个字。许多村庄涌现了一批父教子、子教父、夫教妻、妻教夫、兄弟姊妹互教互学的典型。正如当时一副楹联所写的：“读书声、唱歌声、锣鼓声、声声震耳；天在变，地在变，人在变，万家更新。”在冬学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从中发展了许多共产党员，成为党和政府开展群众运动的骨干力量。通过一年一度的冬学运动，使基本群众在文化和政治上普遍得到提高，使其能够更积极、更自觉、更有效地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

第十八节 深入开展敌占区对敌斗争

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寿张县在接敌区和敌人占领区积极保持开展对敌斗争，开辟了一条特殊的战线，对分化瓦解敌人，拆散敌、伪、顽、会、匪的反革命联盟，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作战，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当时，寿张县地下党的工作部署严密，深入县城内的党组织由张传伦（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赵西祥（宣传委员）打入敌人机关负责宣传，掌握敌人内部情况，罗秀伦（支部副书记）、姚义元（交通委员）负责城内外联系，王玉振、曹华亭等党员也打入敌伪机关发展大批关系，地下工作十分活跃。

1942年，国民党特务分子姚传斌等潜入到寿张县，带来很多国民党委派来的特务，活动于寿、阳、阿三县，主要任务是抓伪武装力量，发展巩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欺骗青年到国民党区去受训。这时，安青道义会在全县盛行，姚传斌即通过地主汉奸张兴周拜汉奸大队长沈广训为师傅，姚带来了范、寿、朝、阳四县反共自卫团长的委任状，并向沈进行曲线救国教育，沈即倒向了国民党。11月间，沈广训在寿张县城灵官庙召开全城居民大会，说：“我们要保持东亚新秩序，剿灭共匪，城里有八路军的报信人，不管是谁，就是我的亲舅舅也要杀头。”这时，敌伪扫荡频繁，到处按“钉子”，另一方面，军统特务徐怀圣也到寿张任伪中队小队长，一些国民党人员（包括三青、中统、复兴社等）则在教育界活动。原国民党寿张党部委员姜明谦伪装进城积极进行活动。在县城北八里庙一带活动的共产党员赵强受张秋县委的派遣，到寿张县城了解到姚传斌的活动。城里地下党组织也了解到姚传斌的活动，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潜入县城内大肆活动。地下党组织一方面揭发汉奸“曲线救国”的谬论，大力阻止三青团团员和青年到国民党统治区濮阳受训，另一方面密切注意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沈广训倒向国民党后，张传伦几次争取他，他始终没有回头。

在日、伪、顽气焰上升，对敌斗争形势日益尖锐复杂化的情况下，党组织除了对顽固不化的资敌分子和作恶多端的汉奸进行严厉镇压外，还采取了以下斗争措施：

一、进行攻心战，散发宣传品，掌握敌人情报。敌人愈疯狂，我们的宣传愈加强。用敌人的油印机印我们的宣传品。日伪军在“讨伐”

和扫荡时，赵西祥等人就把传单在县城日伪机关经理处秘密印好，散发到大街上和敌伪机关。张传伦等人把布告、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有时，地下党员王玉振等人把“慰问信”（警告信）和传单送到日军司令部、警察所和宪兵队，敌人的活动布置情报由罗秀伦、姚义元等人及时出城送交抗日民主政府。日伪军怎么搜查也始终破坏不了地下党组织。有一次，日军调东平、阳谷和寿张三县宪兵队，四门落锁，全城戒严，严布岗哨，逐户清查，闹了一星期，地下党组织安然无损，城内的伪军则被控制了。

1943年春节前，为向日军开展政治攻势，军分区运来一批日文宣传品，时称“慰问袋”，是“日人反战同盟”和“朝鲜人民解放联盟”等组织印制的，内容是宣传日军必败，目的是动摇日本士兵军心。县委敌工部决定派城内地下党组织送到日军司令部，并通过城北郊的村联络站送进县城。王玉振等接受任务后，通过层层岗哨盘查，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勇敢地将信件送到日军司令部，日军司令部大惊，立即逮捕身边的4名日军，并派“特工队”、“剿共班”，化装潜伏，深入各机关团体、街道侦察，无果。日军又抽调寿张、阳谷、东平、汶上、菏泽、巨野7县特工骨干人员集中寿张侦察，费时一周，一无所获，沮丧而散。

二、打入和控制伪军中下层。全县伪军十七个中队和警察所、剿共班、新民会、伪县府、宪兵队、经理处等与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关系”，伪军中队长以上的人物被地下党组织完全掌握的有9个，剿共班长20人中有一半被争取过来，伪军“突击队”（死心汉奸）被

掌握的也有很大部分，新民会、宪兵队的关系都很可靠。他们都能按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办事，还及时汇报情况。在敌占区从城镇到乡村，从机关到各行业，都先后打入了为抗日政府工作的人。这和正面的抗日武装配合起来，使共产党控制了当时的抗日局势，因此，在日伪军扫荡时，日伪据点和伪乡长以及地主豪绅大都帮助掩护抗日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党在工作中争取伪军政人员上层和争取下层并举，争取中下层有利于孤立上层，争取上层有利于掩护中下层工作，在一定条件下，争取上层放下武器，投诚起义。对伪军政人员的基本政策是：打击最坏的，表扬表现好的，争取一般的。在接敌区和敌占区组建“两面”政权时，争取组成人员成为“两面派”，即表面应付敌人，暗中依靠抗日政府。首先是物色“线索”，即先物色争取“线索人”。这种线索人是影响和掌握伪军政人员的亲戚、朋友，特别是伪军政人员的老主人、老上级、老恩人或与其患难的挚友。其次，动员这些人对伪军政人员进行政策攻心，形成政治上的包围圈，分化瓦解之，通过各种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启发教育伪军、伪组织人员，使其通晓民族大义，提高反对外族侵略的思想觉悟，站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一边来。第三、对于在伪军政组织中建立的关系，不到必要时不要求他们有大行动，要他们长期潜伏，等待时机，切实做好巩固、团结工作。

三、对国民党特务分子，采取监视和待机打入的办法。如派张传义打入义家书社，监视姚传斌等特务的活动，派阎茂停打入国民党特务控制的保甲自卫团指导部等。

四、争取和教育汉奸。伪军政人员不是铁板一块，经县敌工部人员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除少数认贼作父、死心蹋地的汉奸外，一般伪军政人员不愿与人民为敌，不愿和八路军打仗，并主动给抗日军政人员提供方便。敌工部干部以八路军的名义，不断通知被教育争取过来的汉奸到城外交换意见，进行教育，贯彻我军宽大政策，揭发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鼓励他们争取立功，为人民效劳。

抗战期间，敌工人员不仅提供了大量日伪情报，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对日伪军的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敌工人员通过各种关系在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和护送党政军干部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为打破敌人在经济上的封锁，敌工人员还经常通过各种关系从外地购买各种药品、子弹和电台所需的电池等物品，供应军需。

第十九节 大力加强交通联络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在斗争尖锐、复杂、艰苦的环境里，建立、健全党内情报交通网，切实做好交通联络工作，是保存、发展自己，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条件。

寿张县所属运西地区党的交通、联络工作，是随着地、县、区各级党委和专署、县、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1944年春，运西专署专员邹鲁风亲自筹建了交通二分局。二分局的前身是运西分局，运西分局之前叫运西中心站。同时，地委建立了交通科。运西地区各县都设有交通站（后改称交通局）。县所辖各区，都设有交

通分站或联络员。此外，各县还设有若干个联络站。所有从事交通联络工作的，都要经过各级党的组织部门严格审查，由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有社会经验、胆大心细、有应变能力的人担任。寿张县交通站于1939年建立，第一任站长李宸，后刘玉清为站长。1939年3月，寿张县第六区在邵庄建立交通分站，站长刘玉清，收发员李怀刚，交通员杨广臣。六区分站的主要任务是向东联系昆山县，向西联系县站和二分局。县站、分站和联络站的共同任务是保证上级党委、政府的决定、指示等文件、情报、信件和报刊等能及时传递，使全县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及时了解上级的指示精神和日、伪、顽、会、匪的情况。运西地区主要的地下交通线有2条途经寿张：一是从范县经寿张到一分区的黄河西各县；二是从范县经寿张、东平到泰西。由于运西地区是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区，区党委、行署、军区驻这一地区，领导机关发出的指示、文件和信件等等，大部由二分局及其所辖县站、区分站和联络站传递出去，任务艰巨繁重。特别是斗争形势恶化的年代（1941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在运西中心区周围，日伪军的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在许多地方，日伪军是三里一岗，一里一哨。寿张县的交通工作者面对严峻的局面，为了确保完成艰巨而特殊的交通联络任务，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主要依靠由中共农村党支部组建的若干联络站传递，有时派武装骑兵护送，有时化装成伪军政人员，有时利用与地、县、区联络站有密切联络的伪军政人员的协助，更多的是化装成农民、商人、小贩，爬敌人的封锁沟，越碉堡，过岗卡，不管是严冬酷夏、黑夜，还是环境恶劣，全凭着一颗红心、

两条腿，不怕苦、不怕死，披星戴月，去完成任务。各地联络站的人员，都是以社会职业作掩护，如开药铺、杂货铺、茶馆、饭店、旅馆等，按照事先规定的联络暗号，将文件、信件、情报等放在花生、纸烟、工具和其他商品里，及时传送。交通人员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查和盘问，事先都想了多种应付办法和对话，一次又一次机智地闯过了汉奸、特务的盘问和搜查，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因而被人们誉为“打不断、砸不烂的地下红色交通线。”

1942年九·二七日伪大“扫荡”，寿张县交通局受到严重损失。其工作人员从寿张住地向范县转移突围时，李怀刚当场牺牲，局长刘玉清受重伤，另有15人下落不明。后分局调宋子胜到寿张县重新组织县交通局，于1943年初恢复了县交通组织机构和工作。当时，除老交通员杨广臣、王在合外，又招收了岳新元等20名交通员。

1944年抗战环境开始好转，县交通局业务量增大，交通人员进一步增加，机构扩大。后来，报刊、杂志的发行工作也由报社划归交通局负责。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交通邮政部门的战士们又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第五章 扩大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4、1~1945.8)

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台前一带的抗战局面出现敌退我进的有利局面。台前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连续发起攻势作战，境内敌伪据点相继被拔掉，根据地迅速恢复并不断扩大。1944年12月5日，寿张县城被攻克，标志着台前全境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台前人民进行抗战的历史证明，台前境内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2006年8月对全县各村的统计，粮食损失8289516公斤，房屋被烧毁破坏达1086间，牲畜损失5233头（匹）；伤亡人口3455人，其中被敌人杀死474人、失踪566人、病饿死亡913人、负伤1129人、残废271人、被俘179人，抗战胜利后日军遗留的化学、细菌武器等造成45人伤亡。英雄的台前人民用生命和群血，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节 寿张地区的形势和任务

1944年，随着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出现的空前有利局面，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一再失利，从河南开始，发动了打通通往南洋的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冀鲁豫边区周围的日军先后南

调，兵力由 12500 余人锐减为 6400 余人，且多是新征老年兵和少年兵，厌战情绪严重，战斗力减弱。日本侵略者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加紧整编控制伪军，以代替其原地防守。在此地区虽然尚有 15 万伪军，但由于经常处在八路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之下，军心动荡，士气低落。而在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经过 1941 年至 1943 年的反“扫荡”、反“清剿”、反“蚕食”的艰苦斗争，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边区整风运动、生产救灾运动和民主民生运动的广泛开展，调动了广大群众抗战的积极性，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资方面奠定了夺取抗战胜利的基础。在这种形势下，根据地军民的任务，就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紧紧围绕巩固扩大根据地这个中心，加强整风学习，深入进行民主民生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强化对敌斗争和敌伪工作，并用 1943 年 10 月 1 日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

1944 年 5 月 11 日，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冀南和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中共平原分局，又称中共冀鲁豫中央分局。两军区合并，组成冀鲁豫军区。原冀鲁豫区党委所辖的二地委改称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八地委，原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改称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寿张县属于冀鲁豫分局八地委。

两区合并后，根据党中央十大政策和北方局关于“团结华北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方针，以及冀鲁豫区党委高干会议精神，寿张县委总结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的经验，普遍认为过去的一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扭转被动局面的一年。表现在军事斗争上，由于正确执行了“敌进我进”和高度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实行对日、伪、顽、土匪、会道门的正确斗争策略，加上有利的敌情变化，所以全年军事斗争获得了很大胜利，从而达到了巩固根据地、扩大游击区的基本目的；表现在群众运动工作上，由于各级党委将发动群众作为中心工作，所以通过生产救灾和民主民生运动的开展，焕发了农民抗日、生产的积极性，巩固扩大了群众团体，锻炼培养了干部，使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巩固有了人力和物力资源；表现在党的建设上，由于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了党的团结，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由于普遍开展整风运动，所以使党的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纪律上得到了加强，并有力地促进了对敌斗争及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县委找出了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主要是在武装斗争上，依靠群众的观念还不牢固，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结合不够密切，发展起来的游击区还未及时在政治上巩固，没有建立稳定的抗日秩序；在党与群众工作上，还存有英雄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群众工作中有包办代替的现象，没有很好的深入群众，没有从启发群众的基本觉悟、关心和解决群众的基本利益入手发动群众。县委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 1944 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即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具体要求是：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完成 6 项任务：一是展开全面对敌斗争，扩大各种抗日武装力量，抓紧空隙进行部队和民兵整训，

提高战斗力，为大反攻做好军事准备；二是党政军人员带头大力发展生产，掀起生产运动，克服困难，战胜灾荒，为大反攻做好物资准备；三是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合理负担，巩固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扩大农村统一战线；四是普遍深入地开展整风学习，审查干部，克服党内不良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五是进一步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整体观念，团结广大群众，搞好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六是加强敌区工作，造成“有敌人无敌区”。

1944年初，寿张县周围的敌伪据点接连被扫除，日伪军龟缩在县城内不敢出动。全县的抗战环境和形势相继好转，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农村党组织进一步巩固、壮大。对日伪作战逐步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由较小规模的攻势作战发展为全县规模的攻势作战，为争取全县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一、连续实施攻势作战

从1944年，寿张县抗日军民开始大反攻，抗日斗争声势异常浩大，敌人的钉子象葱一样一个个被我们拔掉。敌人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县城内盘查的更严，太阳未落就闭门落锁，不敢轻易出动。

1944年4月下旬，冀鲁豫第二军分区七团二、三营和八团、昆张支队一个营，以及第一军分区一、二、三团各一个营，在第二军

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范阳春的统一指挥下，围攻张秋镇。由七、八团三个营为主攻，第一军分区三个营负责打聊城、阳谷的增援敌人。据守张秋镇的伪治安军营长张玉环见事不妙，在八路军正式围攻以前，即率部向北突围，行至王庄被昆张支队阻回。至此，战斗全面展开，经过一昼夜战斗，八路军扫除了外围据点，占领了四关厢，数百伪军见大势已去，乖乖交械投降，唯有治安军两个营龟缩书院（是一座高楼，周围有墙），占据有利地势，继续顽抗。激战三天两夜，因阴雨连绵，八路军爆破未成，又加聊城的日伪军增援迫近，八路军主动撤退。

1944年上半年由于抗日军民不断打击围歼日伪军，使寿张境内的伪军恐慌不安，纷纷交械投诚。日军为挽回败势，拼命顽抗。是年6月，寿张县城内日军一个中队，带伪军6个中队计700余人，向七区（清水河一带）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以抢粮为主要目标的扫荡。冀鲁豫军区抗日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李德芳和政委李仲勋的指挥下，于大王集阻击日军，日军依仗优势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疯狂地向前推进，三支队战士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英勇还击，经3个小时激战，日伪军溃退。

1944年7月，日军700人携同寿张县伪军及郓城伪县长刘本功部13个中队共2000余人，向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委驻地马楼、清水河一带扫荡。日军主力一部由北向南行进。军分区七团得知情报后，两个连预先埋伏在纸王村东地带，并挖好工事，等待伏击日军。等日伪军靠近二十公尺的开阔地带时，八路军突然向日伪军发起攻

击，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一齐射向敌群，日伪军突遭阻击，溃不成军。不到10分钟，打死打伤日伪军70余人，其中日军30人。为了保存力量，八路军沿路沟向西南撤退。与随后赶来的主力部队一同迎敌，日伪军见势，惊慌失措，狼狈逃窜。

1944年10月7日，军分区七团在分区司令员曾思玉的率领下，围攻张秋县城，几经激战，日伪军于12日弃城逃窜，张秋县解放。1944年10月，寿张县城内伪军中队向刘奎斋、白蜡仝进犯，抓人逼粮，冀鲁豫军区抗日第三支队政委李仲勋带两个连，迅速从白岭、张庄、西官路一线，迂回到临近县城的长刘、杨岗等村设伏，待敌返城时伏兵突起截击，全歼伪军一个中队，其中生俘60余人，缴获轻机枪、步枪50余挺（支）。

二、解放寿张县城

1944年6月起，冀鲁豫军区八分区和昆张支队，对昆张地区发动一系列战斗战役，取得了很大胜利。张秋、昆山两县重新恢复抗日民主政权，寿张城内的日伪军在东部受到抗日军民极大的威胁。寿张南面，抗日地方武装经常对郟、寿公路各据点袭击。8月，根据地冀鲁豫军区的命令，第八军分区发起“讨刘（本功）战役”，使日伪军寿张至郟城的交通线被切断。寿张城外据点的敌人大部撤回县城，寿张城里的日伪军东、南、西三面处于八路军夹击之中。在这一有利形势下，县大队和各区区队积极对敌展开政治军事攻势，不断地打击袭扰敌人，寿张城里的敌人成了惊弓之鸟。10月，日军撤到阳谷城里。11月25日下午，伪县长兼伪大队长沈广训误认为八路军要攻城，便

带领一部分武装仓皇弃城逃到阳谷县，冀鲁豫军区抗日第三支队和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进驻县城。沈广训得知进城的不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又派伪大队副刘得志带领6个中队600余人重新占领寿张县城。在守城的6个中队中，大部分和八路军有关系，有的是我们打进去的。这些伪军没有战斗力，大有一击即溃之势。他们日夜守城不出，连吃粮都有困难。

为了乘敌人惊慌不安、立足未稳之时，一举解放寿张城，第八军分区要寿张县敌工部摸清核实敌人的兵力、装备、军事部署位置，以及日伪军活动情况，作好解放寿张城的准备工作。县敌工部立即研究，具体分工，迅速行动。李哲和副部长戴德通过城关区委（一区区委）负责人张传伦，通知早被派遣打入伪县政府田粮处工作的赵西祥，了解敌人在全县的动态。赵西祥到敌工部后，用3天的时间，写出一份比较完整准确的敌情材料。主要内容是：伪军人数、建制、武器装备、战斗力、军事布署、指挥机关；伪政府组织机构，各部门负责人及其对抗日的态度和表现，哪些人最坏，将最坏的人员每个人整理成材料；日伪财产分散或隐蔽在何处；绘制了一份日伪军的城防地图。县敌工部将这个敌情专题材料派人送到军分区敌工科。12月初，军分区敌工科又派人到寿张要求县敌工部进一步核实敌情。县敌工部立即派杨萃民潜伏到离城三里远的陈永嘉家（一区区委负责人之一）召开会议，布置收集城内日伪军内情报任务。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永嘉、姚义元、赵西祥、王玉振。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认为敌人兵力和装备同上次所了解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并对敌人战斗力做了具体分析：伪副大队

长刘得志和第二中队长两面三刀、执迷不悟，估计可能与我军抵抗，其余五个中队都和我们有关系，我们的内线可以控制其行动，如伪军一、五、六和占据费楼的伪七中队可能不战而放下武器。其中六、七中队驻守东门，共产党员曹华亭带领一中队驻守西门，占据四棚的伪十三中队也有我们的党员和内线关系。杨萃民布置完进一步核实敌情任务后，参加会议的人急速返回城里。赵西祥又绘了一张敌人重新布防的地形图，由姚义元安全地把图送到城外三里庄交给陈永嘉，陈永嘉连夜把图送到敌工部，敌工部立即转报军分区敌工科。

1944年11月下旬，八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段君毅、第二政委万里决定，由第七团、分区特务连、炮兵连在寿张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攻打寿张城。12月4日，第七团和分区炮兵连、特务连由鄆城出发，冒着严寒风雪，跨越故道沙滩，向远在130华里的寿张县城日夜奔袭。李哲和敌工部的几个人随县大队行动，从清水河向北进军，直赴县城，听候分区命令。八路军首先切断了寿张通往阳谷的公路，军分区命令寿张县大队包围徐楼据点，黄昏前完成包围。八路军攻城指挥部设在西关外距城门二百米的一家民宅内，曾思玉司令员指示李哲等敌工部人员到前线配合七团展开政治攻势，在寿张城西门外阵地前向喊伪军话：“八路军优待俘虏！不打骂俘虏！不搜俘虏的腰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枪不杀！放下武器才有出路！不要再给日本人卖命！不要再给沈广训卖命！对于抵抗的要惩办，立功的受奖！”开始喊话时，守西门的伪军对空鸣了几枪以后就没有枪声了。这时，曹华亭带着部队在西门一家民房里隐蔽，等候八路军接收，西

城门楼已无人防守。

时针指到七点，攻击号四面吹响，机枪、步枪齐鸣，杀声震天。炮兵连发几炮，把城门楼打了几个大洞，突击部队一个排迅速登上城门楼。曾思玉、段君毅、万里在城门楼下指挥部队登城。八路军很快占领大半个寿张城。占据南台的伪大中队长沈汉卿和固守南门的伪军中队长尹子伦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带队投降。伪十三中队长石永健和防守费楼据点的小队长徐小旺率部起义。仅两个小时，寿张全城解放，全歼伪军 400 余人，俘伪军大队副刘得志以下军、政、警人员 600 人，缴获各种枪支 500 余支。在这次战斗中，仅有地下党员曹华亭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歼灭伪军后，县区武装人员立即封锁县城四门，打扫战场。中共寿张城区地下区委发动党员和群众，配合部队搜索隐藏的伪军政人员，清查枪支。经过两天紧张的工作，搜查出伪军政人员 200 余人、各种枪支 100 多支。军分区部队在寿张城住五、六天，待秩序恢复撤往清水河附近休整。县城由县公安武装和一区区队防守。部队撤离时，全城人民敲锣打鼓夹道相送，并派出各界代表到分区司令部慰问。元旦前，县委、县政府在清水河召开庆祝寿张城解放大会，全县党、政、军、民、学、商等各界人士参加。寿张县城的解放，标志着台前全境解放，同时极大地削弱了鲁西地区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日军据守的阳谷县城处在抗日军民的东、西、南三面夹击之中。

三、支援阳谷战役，夺取最后胜利

1945 年春，寿张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巩固抗战胜利成果，

建设抗日根据地，领导全县人民开展除奸反霸斗争，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进一步掀起民主民生革命的热潮。

但是，聚集在阳谷城内的日伪军困兽犹斗，经常结队于夜间窜到台前境内抓人、抢粮、放火，对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阳谷是鲁西地区的一个重镇，防御工事坚固，城墙高达10余米，四围壕宽水深，易守难攻。此时，周边诸县伪军在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也退守阳谷，负隅顽抗。城内有曾坚守张秋镇为日军立过功的伪治安军张玉环团（缺一个营）约800余人，此团装备精良，极其顽固，是铁杆的保日派；有寿张伪县长沈广训和朝城伪县长刘金岭所属警备队四五百人；还有反动会道门黄沙会数百之众；阳谷城内原有伪县长刘继春所属伪军近3000人。阳谷城内伪军共计4500余人。

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冀鲁豫军区决定，由第一、第七军分区部队打援，第八军分区负责歼灭阳谷城内的伪军。为了配合八路军解放阳谷，台前境内全民总动员，大力支前，各抗日团体纷纷行动，农救会筹集粮食，青救会组织支前担架队，妇救会赶做军鞋，学校师生上街宣传演讲，发动募捐，购买慰问品，老百姓踊跃捐献。仅白岭抗日高小师生向社会募捐之款能够购买7头黄牛，这些款都买成了慰问品。

1945年7月19日夜，冀鲁豫军区八分区主力部队连同地方武装6000余人包围阳谷县城。台前境内的民兵自卫队、模范班，跟随部队奔赴前线；担架队抵近城郊待命；青年学生到战场喊话，以鼓舞士气；各村老百姓抬着猪肉、白面，挑着瓜果、鸡蛋，成群结队从四面

八方涌向前线，慰问八路军。经过几天激战，部队攻破阳谷城垣，伪军退居圩子内固守，在寿张县委敌工部长杨萃民等人的积极劝降下，阳谷县伪县长刘继春率 3000 余名伪军交械投降，治安军被歼，朝城伪县长刘金岭被击毙，寿张伪县长沈广训被活捉。7 月 26 日，阳谷全城解放。

第三节 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下，面对强大的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及封建势力的夹击，为立于不败之地，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始终从实际出发，开展革命斗争。他们注重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地具体实践相结合，致力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一、县委的正确领导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

县委首先十分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许多领导干部能够牢记党的宗旨，忠于党的事业，具有不畏艰险、奋发进取的高度的思想觉悟。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他们能够发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联系实际，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走群众路线，矢志不移，顽强奋斗，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无私的牺牲精神，为广大党员群众树立了楷模。其次，县委善于结合复杂多变的形势，制定符合实际的对敌斗争策略，纯熟地掌握了斗争艺术。在抗战进入困难时期，为战胜日、伪、顽、会、匪等反动势力和旱灾、

蝗灾，全县各级党组织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制定的以下政策和策略：精兵简政，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敌进我进”，拆散日、伪、顽、会、匪的联合；县区武装和民兵配合主力军，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和大生产运动等。第三，大力加强党组织整顿工作，不断壮大党员队伍；认真开展整风学习运动，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使党政军民实现了政治上的团结、思想上的统一。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形势逐渐好转，由被动变为主动，并成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在组织发动群众抗战方面，县委领导成员有坚定的群众观点，始终关心群众疾苦，服务群众，依靠群众，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当时，不少党员吃住在老百姓家里，视人民如父母，老百姓则把共产党当成亲人，干群之间是鱼水关系。共产党在抵御外侮的同时，打击封建势力，解放劳苦大众，开展减租减息，以实际行动竭尽全力为人民谋利益，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在日伪军疯狂扫荡时，群众自动将党员干部掩护起来，有的安排在自家的地窖里，有的藏于柴秸垛里。情况危急时，群众自觉将负伤的共产党员照顾备至，精心护理，煎汤熬药，喂汤喂饭。二区祝口村一位妇女，将自己的乳汁挤出来用小勺喂重伤员，感人至深。当时，共产党人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台前人民，在寿张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勇敢地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出人出钱出力，保家卫国，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二、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地主、富农和开明士绅共同抗日，这是县委在抗日战争时期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政治方针。县委对于党外爱国人士，是信任，不是利用，是真诚的合作共事、平等对待，形成了互敬互助的战斗集体，结成了联合抗战的钢铁长城。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的深入开展，从经济上团结了全县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全县最大的地主、士绅蔡如清曾在他家掩护过县委敌工部长李哲、副部长戴德。统一战线工作的有力开展，使寿张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大发展，减少了敌对力量，为在全县实现全民抗战提供了保证。

三、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及其地方武装开展的军事斗争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基础。

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大力支持下，县委始终注重广泛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县、区均建立了较强地方的武装，根据地所属村庄全部建立了民兵组织，实行全民皆兵，大打人民战争，形成了抵御敌人的“人山”和淹没敌人的“人海”。上述抗日武装，在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创建抗日根据地。至1944年12月全县解放，全县地方武装发展到3000人，先后参加大小战斗百余次，给日、伪、顽、会、匪以沉重打击。在游击战中，八路军主力部队与敌正面作战，民兵则割敌电线，破坏公路，拆除日伪防御

工事，袭击小股伪军，使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地方武装，在战争中经历了严峻考验和艰苦锻炼，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

附：

(以下见《中国共产党台前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 印刷时补上)

1、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寿张党组织分布示意图(1937.~1941.6)

2、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寿张县、张秋县组织分布示意图
(1941.6~1947.6)

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寿张县组织隶属关系序列表
(1937.7~1939.7)

4、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寿张县、张秋县组织隶属关系序列表
(1939.7~1945.8)

5、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寿张县党组织机构设置示意图
(1939.7~1945.8)

6、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张秋县党组织机构设置示意图
(1941.9~1945.8)

第六章 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

(1945. 9~1946. 6)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期，根据上级党组织的部署，寿张、张秋两县县委带领党政军民深入进行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奸诉苦、“倒粮回地”、“斗争地主分浮财”和参军支前等运动，大力发展生产，同时，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积极整顿和充实县区武装和民兵组织等，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做好了反击国民党进攻的准备。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党组织面临的任务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抗日战争中付出沉重代价的中国人民渴望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因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尖锐斗争，成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

在时局变化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 1945 年 8 月 13 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方针，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为正确认识形势、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根据国内形势和斗争需要，1945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1945 年 10 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撤销冀鲁豫分局，恢复冀南与冀鲁豫两个区党委，原冀鲁豫分局所辖八地委改称冀鲁豫二地委，地委书记万里，副书记郭超、专员成润，军分区司令员张刚鉴。

寿张县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是创立较早、坚持根据地建设和开展平原游击战争较好的地区之一，到 1944 年 12 月 5 日，县境全部解放，成为比较巩固的解放区。中共寿张县地方党，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在思想上更加成熟，在组织上得到了发展壮大，全县党员由抗战初期百余人发展到 2000 多人。广大干部经过战争的锻炼，思想政策水平、组织领导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寿张县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倍受战争之苦，深深懂得胜利来之不易。同时，在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中，中共寿张县各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建立了亲密的血肉联系。寿张县的全部解放、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觉悟，为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更加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完成历史赋予的各项任

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寿张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和平，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对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破坏和平深恶痛绝。解放战争初期，在寿张县的一些顽匪、残伪、汉奸及国民党特务并未死心，他们四处活动，散布谣言，制造矛盾，破坏乡村政权，欺压群众。在国民党积极向解放区进攻的情况下，其破坏活动更为猖狂，如拦路抢劫、袭击政府机关、杀害区村干部和民兵，制造恐怖。少数群众因长期受地主伪顽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是受反动势力的影响，存在怕“变天”思想，有的则因抗战胜利盲目乐观，警惕性不高。一些干部则怕被打黑枪、遭迫害等。所以，抗战胜利后，寿张县阶级斗争形势依然尖锐复杂。

针对上述严峻形势，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一系列指示，确定当时党的中心工作任务是：（一）加强对广大人民的宣传教育，揭露蒋介石反动集团内战独裁的阴谋，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二）开展大规模扩军运动，壮大主力兵团，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全力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反击国民党进攻解放区；（三）加强社会治安工作，打击一切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四）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及复查工作。在此基础上，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解放区，为对付国民党进攻作好物资准备；（五）做好参战准备，按中心村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编成排、连建制，如遇战斗，随时集中；（六）各级政府动员民资民财，随时征调，保证战争的财粮供应。为此，全县各级党组织迅速深入广泛地开展了宣传活动。利用村干部会、群众会、开明绅士

会等多种机会，采用秧歌、戏剧、标语、宣传单、组织中小學生宣传队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揭露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內战阴谋，号召群众丢掉幻想，紧急动员起来，保卫抗战胜利果实。通过广泛深入动员，寿张县迅速进入了战争准备状态。

第二节 进行反奸诉苦,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945年9月，寿张县委按照冀鲁豫区党委的部署，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对广大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清查敌特人员和武装资财，安定社会秩序；组织群众召开公审大会，声讨清算汉奸和伪军头子的罪行，除了进行控诉，还要没收其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对依靠日伪顽为非作歹的封建地主、恶霸分子，通过清算，赔偿群众损失；对一般的伪军政人员和与日伪军同流合污的流氓土匪、反动会道门成员，开展自首登记、悔过自新活动，收缴其隐藏的武器和弹药，并根据其发财大小，确定作不作经济处罚或处罚的轻重。由于措施得力，反奸诉苦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县委处决了沈广训等一批民愤极大的汉奸恶霸分子。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反奸清算工作，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斗倒了汉奸恶霸，摧毁了日伪统治的社会基础，削弱了封建势力。

在反奸诉苦运动开展的基础上，1946年3月，县委领导群众开展倒粮回地，斗争地主分浮财和减租减息、增资增佃运动。1942年

至 1943 年，寿张县及其所在的鲁西北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在天灾敌祸的双重侵袭下，广大贫苦农民为求生存，被迫低价卖出作为命根子的少量土地，地主富农乘人之危大肆兼并。为此，1943 年冬，县抗日民主政府曾开展了回地赎人工作，但不深入、不彻底。寿张全县解放后，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大贫苦农民迫切要求得到失去的土地。在此次倒粮回地的群众运动中，县委按照上级政策规定，凡地主、富农所买农民土地准许按原价全部赎回；基本群众之间买卖的土地作为内部问题以评议方式解决；因债务抵押的土地一起清理赎回。将没收的汉奸、恶霸财产，分给无地、少地的雇、佃、贫农和军、工烈属以及退伍、荣誉军人；对汉奸、恶霸的非法所得及其迫使贫苦农民遭受的一切损失，进行清算，予以赔偿；对地主超过政府减租法令规定收取的粮食，进行清算，如数退还。

抗日战争后期，寿张县已经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的影响，斗争开展得很不彻底。1946 年春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是抗日战争后期斗争的继续和深入。主要内容是：对地主实行彻底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二五增佃、五一增资”政策；取消一切额外剥削和负担，放账利率不得超过 3 分，增加雇工工资；清理旧债，利钱还够原本两倍者，不再计息还本，还够一倍者停息还本，文书和抵押的土地一律退回；实行合理负担，交纳赋税按亩累进法，地多多出，地少少交，彻底废除按人头、地亩、银两摊派的旧法令；公布抗日民主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政策、法令，对拒不执行政府规定的不法地主、富农分子，组织雇、佃、贫农对其开展说理斗争。

在发动群众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中，寿张县采取的主要方法是：（一）加强领导，组织强大的工作队深入到区、村，具体指导群众开展斗争。（二）深入发动，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日伪势力和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抢夺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的形势下，农民思想顾虑重重：一是封建迷信，相信天命，认为“穷是命里注定”、“外财不富穷命人”；二是受宗法观念影响深，打不开情面；三是怕变天。因此，动摇观望，不敢起来进行斗争。县委根据上述情况，利用大会、小会宣传战争的性质和解放区的大好形势，增强群众的斗争信心；访贫问苦，个别发动，算劳动收入帐和地主剥削帐，讲翻身道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使群众认识到穷富不是天意，是敌伪顽杂和地主阶级剥削压榨造成的；在个别发动的基础上，由小串连到大串连，最后召开群众大会，斗恶霸倒苦水。（三）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首先进一步健全了农会、妇救会、青委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其次，大多数村在农会的领导下，成立了自卫队和模范班等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最后，选拔在运动中涌现出的一大批阶级觉悟高、有智有谋有勇的骨干分子，组建新的乡村政权，将汉奸和封建顽固势力把持的村政权彻底摧毁，把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群众领袖选进新政权。

这次减租减息运动的特点是：减租减息与反奸诉苦相结合，批判斗争与开展说理斗争相结合；几个村的农民联合起来与地主斗争；雇工与雇主座谈，通过说理开展增资斗争；加强骨干培训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这次减租减息运动中还创造了以下经验：一是集中党、

政、军、群的力量投入这一运动是关键一环。在抗日战争期间，政府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人员忙于对敌斗争和支前工作，无暇或很少参加群众性的民主民生运动，这次运动是由党、政、军、群众的干部一齐参加，力量强、声势大、速度快、效果好。二是反奸诉苦由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部门出面，召开群众大会对汉奸恶霸进行公审判决，并不失时机地宣传人民政府公布的减租减息法令，发动、组织群众贯彻执行，解除了群众思想上存在的许多顾虑，减少了实施减租减息过程中的阻力。三是深入调查研究，摸清社会各阶级、阶层对反奸诉苦和减租减息的思想认识，针对群众的思想实际，做好思想工作。

通过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全县社会各阶层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树立和增强了反奸复仇的勇气和决心，从而有力地打击了伪军、恶霸地主的残余势力，使广大的雇、佃、贫农得到一定物质利益，党、政、军机关人员与基本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这对巩固解放区，保证全县在历史转折时期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为下一步实行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积极发展县、区地方武装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及时作出了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决策。这一转变的中心是作战形式由游击战为主转变为运动战为主。寿张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组建县大队。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活动于县境的冀鲁豫军区抗日第三支队和1945年8月组建的寿张县反攻营先后升编为野战军。为保卫胜利果实，县委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地方武装特别是县基干大队、区队和民兵的建设。1945年10月，组建县大队，大队长由县长张云峰兼任，大队副杨林山，政委由县委书记高黎光兼任，杨萃民任总支书记代副政委。次年4月，县大队主力编入军分区独立旅，留下一个连改为县基干大队。

二是开展参军运动。全县各级党委、政府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层层进行形势教育和思想动员，在此基础上开展参军运动。1945年10月，全县掀起参军热潮，入伍者达2000人。为了支援大反攻，解除日伪军的武装，收复失地，保护人民利益，保卫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8月，寿张县组成反攻营，共4个连500余人（枪），由一区区区长刘玉清任营长，县武委会主任王村任教导员，直接补充到正规军。在此期间，寿张县基干大队和所属各区区队，普遍进行了补充和整顿。县基干大队500人左右，所属各区的武工队50人左右，武器装备也普遍得到改善。在此期间，县区对民兵普遍进行了整顿和充实。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装备较好的基干民兵6000人左右。县委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配合和参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以正规兵团（野战军）为主体，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建设。

第四节 大力做好支前和拥军优属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期间，蒋介石调动80万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妄图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共在和谈中屈服。为了打破蒋介石的妄想，八路军、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坚决进行自卫，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迫使国民党签订停战协定。其间，为了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寿张县根据上级指示，动员、组织党政军民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做好支前工作。县区党政领导干部亲自抓支前工作，动员组织民兵参加战斗，把大批粮食、药品、衣服、鞋袜等物资送到前线；组织担架队到前线抬送、抢救伤员。妇救会组织广大妇女缝制鞋袜及慰问袋，送到指战员手中，并把馒头、猪肉、鸡蛋等食品送到前线。农会、妇救会代表在战壕里向战士们敬烟、敬酒，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们的士气。

县委在大力做好支前工作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展拥军优属工作。首先，凡留在村里的党员干部组织群众对军属和参战民兵家属实行互助代耕，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其次，对军属发放优待粮。根据军属表现的好坏和困难情况，评定出优待等级，然后召开村民大会，进行发放，增加军属家庭的荣誉感，使其更加积极地支持前方战士安心打仗。第三、动员男女老少特别是妇女、半劳力等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以此安抚前方战士。第四、号召军属为前方战士写信，说明家乡的拥军优属政策，鼓励他们英勇战斗，杀敌立功。

寿张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从大局出发，不惜牺牲小的利益，

热情参与支前运动，不但以实际行动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反击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做出了贡献，而且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为此后开展大规模的参军支前运动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加强政权建设，清除匪特武装

1946年春，为了充实和加强县区政权，县委在城西马庙村举办农村干部训练班，各区村长、农会会长、自卫队长等参加。通过对基层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整顿工作作风，提高了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在此基础上选拔了一批干部到县区政府部门工作，同时将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农会和民兵组织中来，促进了基层政权的建设。

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国民党反动派在调动大量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同时，还训练了大批国民党特务、逃亡地主和反动会道门等顽杂分子，在解放区内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以“立功”为口号，组织公开、半公开的匪特，勾结农村封建势力，采取多种方式暗杀中共党政人员和群众领袖，他们在解放区边沿地带，以公开、半公开的小股部队进行袭扰，他们每进一村，便设岗伪装，断绝行人，在了解情况后，分组实施暗杀、抢牛、抢粮，然后，迅速转移。他们有时组织2至3人的武装小组，伪装后深入到解放区边沿各村，以朋友、亲戚的关系潜伏或藏在反动地主及特务下属组织人员的家中，暗中侦察村干部、积极分子的活动，掌握情况后，趁黄昏晚饭或夜间入睡，

防御松懈之时，实施暗杀。他们有时也以土匪的面目出现在交通要道和公路上，劫掠财物，杀害来往的公安人员，夺取枪支。他们还积极组织反动会道门，秘密发展会员，待机而动。他们制造谣言、恐吓群众、瓦解民兵、离间干群关系。其破坏活动，给解放区造成了重大破坏，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威胁，严重影响了土改、战勤、生产等正常工作的开展。

为了打击和防止匪特破坏活动，从1946年春开始，寿张县和张秋县广大军民开展了反奸特斗争。（一）提高群众对锄奸反特意义的认识，树立必胜的信心。针对奸特活动猖獗，群众人心惶惶，顾虑重重等情况，各级领导干部利用各种场合大讲锄奸反特的重要意义及反特工作的有利条件，增强群众的信心。（二）加强锄奸工作。1946年春，寿张、张秋两县设社会部，区、村设社会委员，专门进行侦察工作；公安部门通过党的关系，在大集镇和交通要道建立锄奸网，如有力量时可设派出所；县设锄奸委员会，适当配备公安干部并有计划地进行培训，公安干部一般不准调动。同时，两县都建立了由县长、武委会主任和县公安局长组成的联防反特指挥部，设正副指挥长、政委、参谋长。在各行政区，由区委及村干部组成的联防指挥部，设在工作基础好、武装力量强、位置适中的村，由专人负责联系。（三）搞好揭发、检举和侦察情报工作，形成群众性的反特运动。奸特实施暗杀，必须依靠内线帮助，因此，仇视共产党的反动地主及暗藏的坏人就成了奸特的耳目、爪牙。基层党组织教育广大群众提高警惕，擦亮眼睛，时时留心，处处留意，发现可疑的人，及时报告，使奸特无处藏身。

同时，挑选思想好、靠得住的人打入奸特内部，了解奸特的活动，使奸特的一举一动都在群众的监视之下。（四）登记枪支。无论公私枪支一律登记，不准买卖，严禁造枪，违者究办。（五）动员逃兵归队，整顿和加强民兵自卫队工作。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加强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以若干村为一组，遇到特务即群起响应以死之。（六）及时取缔会道门。张秋、寿张会道门大肆制造谣言，妄图搞反革命暴动。中共寿张、张秋两县各级党组织和反特组织一旦发现会道门活动，就及时坚决予以取缔。（七）严格登记还乡人员。一部分外逃的地主和贫困户返回家乡，寿张、张秋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采取欢迎回乡、教育争取、严格登记、区别对待的方针，对返乡人员举办训练班，对困难户给予救济，对逃亡地主、伪军人员等公开登记，对奸特嫌疑进行秘密侦察，做到防反结合。通过以上措施，查获了大批汉奸，严厉打击了奸特的破坏活动。

1946年初，张秋县委发动群众开展联防反特保边区活动。张秋县公安局和县大队协同作战，2月22日击溃袭击公安局和县政府的寿张、阳谷、张秋三县的300名匪特，逮捕了匪首张小喜、刘保香、史三妮三人，并依法处决了隐藏在县政府通讯班里的内奸。

是年夏季，随着形势的发展，张秋县公安人员、机构得到加强。而此时，县境土匪虽遭多次打击，活动仍很猖獗，他们串通邻县土匪，不断进行骚扰破坏活动。

当时，阳谷、寿张也正在开展打击土匪活动。针对土匪在三县境内流窜活动的特点，三县公安局及时联系，统一意见，相互交换敌特

活动情况，基本摸清了匪特活动的线索，掌握了匪特活动的情况。张秋县公安局通过对抓获的土匪龙三猴子的审讯和侦察，摸清了国民党山东省省长牟中行的地下“土三军”领导的张秋县田道林、张胜元等土匪返乡活动情况。阳谷、寿张两县公安机关侦知土匪门广海、魏子存、寿张的姜次敏等人和张秋土匪经常勾结在一起，其中不少土匪骨干还领到国民党颁发的委任状，气焰嚣张。为了狠狠打击匪特的活动，三县公安局进一步开展侦察、围剿工作。张秋县公安局根据掌握的一些情况经呈报县委、县政府批准，让田尚升打入匪特田道林、张胜元内部。

这年初秋的一天，田尚升秘密向张秋县公安局审讯股股长周金涛汇报，田、张匪部准备在某日夜从李堤口过河（金堤河）和阳谷土匪门广海、魏子存等人联系，集合土匪约300余人，然后合伙打阳谷、寿张县政府，根据这一情报，张秋县公安局同阳谷、寿张公安局马上进行联系，共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战斗布署，决定由阳谷公安局控制围剿门广海等部，徐子胜带领寿张县大队和县公安局干警埋伏在金堤河两岸，由县长张云峰负责指挥。张秋县大队和民兵埋伏在金堤河东北部，公安局埋伏在河正北面，由县长谢惠玉负责指挥，待匪特过河时围歼之。此次伏击战持续近一个小时，共打死土匪10余人，俘2人，其余土匪仓皇逃跑。从此土匪的猖厥活动基本消除了。

锄奸反特斗争，震慑了奸特，振奋了人民群众，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为解放区的建设扫清了障碍。

第六节 大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在《减息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发展大规模生产运动”，“1946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寿张县根据上级的安排部署，在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迅速掀起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群众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伪军对寿张县的践踏、摧残，致使全县大批青壮劳动力遭到重大损失，他们有的被敌人杀害或致伤致残，有的被抓去服劳役，导致大量耕地荒芜，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寿张县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一是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从经济上削弱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广大贫、雇、佃农的生活有所改善，以调动他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二是对缺乏耕畜、农具、种子和口粮的困难户，发放救济粮款和无息贷款，扶持其发展生产；三是组织群众做好军、工、烈属的代耕工作，保证所有军、工、烈属的土地适时播种，及时收割；四是县、区、乡、村有计划的召开劳模大会，通过表彰农、林、牧、

副、渔各类战线上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总结推广其先进经验，推动生产全面发展。

同时，寿张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兴修水利运动，并大力提倡农民发家致富，精耕细作，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农具。在副业生产方面，大力提倡养鸡、养猪、养羊等家畜家禽。为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和支援解放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恢复和发展城乡工商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寿张县、区人民政府从资金、原料、技术和产、供、销等方面采取多种措施，给予支持、扶持。各地迅速恢复了传统生产项目，如编席篓、草帽，纺织，磨面粉，做豆腐等。

1946年，寿张县农业生产普遍获得好收成，副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城乡工商业也初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是寿张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利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停战的短暂和平时机，努力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经济，发展生产的结果，为粉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七章 全面加强解放区建设，支援人民解放军

进行内线和外线作战

(1946. 7~1947. 6)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不顾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空前规模的全面内战。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台前境一直未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是巩固的解放区和支援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此期，为了适应形势急剧变化和斗争的需要，中共寿张县委、张秋县委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立即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先后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迅速掀起参军支前高潮；组建河防团，加强黄河河防斗争；积极抢修黄河堤坝；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进攻秘密造船；肃清匪特，镇压还乡团；大力发展生产等，为进一步巩固、发展解放区和在人力、物力、干部等方面支援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全面内战爆发后寿张的形势和任务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协议，以30万兵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并向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各个战场奋起抗击，全面内战爆

发。

全国内战开始时，蒋介石凭借军队数量、装备和战争物资等方面大大超过人民解放军的优势，妄图在3个月到6个月内消灭人民军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毛泽东在对诸因素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使全党进一步明确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思想。为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式，粉碎敌人的进攻，1946年7月到10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指示，明确提出了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一个广泛巩固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各解放区军民按照党中央的上述原则方针，英勇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自卫战争中不断赢得胜利。

冀鲁豫区是华北的门户，是连结山东和华中地区的枢纽，它位于国民党军向北进攻和人民解放军向南防御的要冲。全面内战爆发后，冀鲁豫区黄河以南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地处黄河以北的寿张县境则成了黄河南岸战场的前沿阵地和后方依托基地，对支援人民解放军内线、外线作战具有特殊的地位。根据形势的要求，寿张县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迅速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充分发动农民群众，使之成为自卫战争的力量源泉；切实加强战勤工作，动员人民参军参战，全力支援前线；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国民党特务、

奸细、土匪的破坏活动及地主的反攻倒算，巩固解放区的秩序，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整顿财政经济，满足前线部队的物资需要，同时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在战争环境中得到改善和提高；加紧进行黄河复堤工程，粉碎国民党“以水代兵”的阴谋，确保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946年3月寿张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一区政府迁往寿张城内。6月8日，根据冀鲁豫行署指示，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改称县民主政府。1946年秋，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频繁轰炸，县委、县政府迁往陈楼、清水河、裴城寺等村办公，后迁驻寿张城东八里庙村，机动灵活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同年11月27日，冀鲁豫区党委根据战争需要，对区划进行调整，寿张县、张秋县划归冀鲁豫二专署。寿张县遵照冀鲁豫区党委关于进行战争动员的一系列指示，普遍进行了战争动员工作，通过召开干部会、群英会、各界代表会，揭露和控诉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明确形势的严重性和解放区军民的任务。与此同时，还采取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实行分工负责前方和后方工作任务的领导方法。其中，一部分干部负责领导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一部分干部组成支前指挥部，负责战争动员、组织民兵民工参战、物资供应、伤员安置等一切战勤工作。这样，寿张县广大党员、人民群众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激励下，紧急行动起来，集中一切力量，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必胜的信心，全力投入到自卫战争中。

第二节 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也是夺取革命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保证。

土地制度改革前，寿张县农村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党曾经将抗日战争以前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主动地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寿张县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增佃、赎回土地、反奸清算等斗争，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些斗争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封建剥削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并未完全摆脱贫苦的困境。寿张县的情况和全国一样，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雇农很少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富农、地主占有的土地数量多，大部分离村庄不远，土质较好；贫苦农民占有的土地数量少，大部离村庄远，土地脊薄，或是沙碱滞洼地。地主阶级利用占有的大量土地，把耕地出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民，采用活租、大种地、常年大包工等方式，剥削广大贫苦农民，谋取高额地租，自己过着不劳而食的生活。广大贫苦农民靠少量贫瘠的土地收入，根本无法保障基本生活需要，长期缺衣少食，只有靠出卖劳动力、向地主租地或逃荒要饭度日，遇到天灾、人祸，无奈出卖仅有的一点土地，地主、富农则趁机压价购买。这样一来便导致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今台前城关镇辖

区，当时有 14124 户，土改前经常逃荒在外的 4944 户，近的逃到山东省利津县，远的逃到东北。戴庄是一个 40 户的小村，经常逃荒的有 27 户，占全村总户的 67.5%，死在外边的 32 人，人死了没有葬身之地，群众说：“穷人街死街埋，路死路埋。”这就是土改前广大农民在封建制度压迫下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衣食之源。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农民特别是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雇、佃、贫农最迫切、最根本的要求。因此，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农民群众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呼声日渐高涨，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土地改革是一场顺应民心、势在必行的革命运动。

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发动农民大力支援自卫战争，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五四指示》）中明确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五四指示》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由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向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转变，即由削弱封建剥削转变为改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这是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正式开始。

按照《五四指示》和上级党委、政府的要求，寿张县委、县民主政府于 1946 年 6 月下旬，先后召开县、区领导干部会议和全县干部

会议，层层进行动员和全面部署，利用两个月的时间，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文件，领会精神。9月初，全县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展开，其步骤是：（1）县、区干部深入农村，划片包干，在土地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再全面展开；（2）建立健全农会及其领导下的青会、妇女会、儿童团、民兵（包括自卫队、模范班）等群众组织，由农会具体领导土地斗争；（3）召开由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学习文件，通过他们向群众广泛宣传土改的重大意义；（4）区、村召开农民大会，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地主威风扫地，使农民扬眉吐气；（5）动员地主、富农把多余的土地、财产拿出来，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寿张县委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并派工作组深入农村领导群众进行土改，遵照中共中央“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宣传发动建立以贫雇农为主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领导农民同地主阶级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贫雇农在会上诉苦揭发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对恶贯满盈的地主和劣绅当场镇压。随后，农会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为了保证土地改革不受少数人干扰，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于1946年秋末签发手令，下发到县、区，给县长、区长以制止、制裁敢于无理干涉和干扰破坏土改运动的少数现役军人的权力。同时，军区副司令刘致远在参加二区阿城海会寺召开的土改动员大会上，表

示支持群众运动。1947年2月，地委宣传部对寿张、张秋的土地改革工作提出了表扬。同年春，寿张县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进入高潮，同时，支前运动深入开展，到1947年6月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台前区当时无地的贫雇农有7550户42485人，分到44401亩地，并分得了牲口、家具和房屋，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高兴地说：“给地主扛活，十分力气用三分还觉得过火，土地改革后用十分力气还觉得不足”。为了保家、保田、保饭碗，翻身农民一面积极生产支援前线，一面又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参军运动。正如当时农民编的快板书所说的：

共产党，亲爹娘，
爹娘不如共产党，
地回老家人翻身，
翻身日子像冰糖，
坚决跟着毛主席，
积极参加共产党。

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革命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保证。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使广大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关系下解放出来，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耕者不得食，织者无衣穿”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翻身农民说：“过去穷人挨饿受冻的原因就是没有土地，有地没人保，还是不牢靠”。土地改革的开展，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宿愿，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得到极大地提高，激发了他们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全县农村的政

治、经济面貌迅速改观，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农民生活普遍有所改善，从而使革命战争获得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三节 开展扩军运动，充实壮大主力部队

自卫战争开始后，为粉碎国民党向解放区的进攻，保卫胜利果实，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冀鲁豫区党委于1946年8月15日发出《〈为战争动员告全体党员书〉》，号召党员和干部带头参军参战。8月20日，又发出《〈关于动员参军的指示〉》，指出：中国人民只有在爱国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才能恢复和平，争取独立和民主；只有保证后备力量的雄厚，特别是兵源的充足，保证正规军的经常满员，才能取得胜利。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的台前广大人民，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军参战。1946年10月，参军任务下达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全县就超额完成了扩军任务。参军人数达2000余人。

1947年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转向大反攻。遵照冀鲁豫区党委和寿张县委的指示，台前人民再次掀起参军热潮。这次参军是在大部分地区贯彻“五四指示”，初步完成土地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保田、保家、保命”的口号下，广大翻身农民表现了极高的革命热情。他们提出“饮水不忘掘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分了地，分了粮，参军参战保家乡”，到处涌现出“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着上战场”的动人场面。

1947年4月8日，一区在城南召开万人征兵大会，刘奎斋村北会场搭彩棚，会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歌声荡漾，锣鼓宣天。全区近百村庄的自卫队员、农会会员、妇救会会员、儿童团团员云集会场，剧团演唱“血泪仇”，秧歌队跳催征舞，会场内外，人声鼎沸。会议由区委书记陈永嘉和区长闫茂廷先后做动员报告，继之，发动群众忆苦思甜，深忆封建统治压榨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人民之苦，激发青年农民保家保田的革命热情，广大青年参战热忱高涨。正在这时，刘奎斋村青年农民艾思太首先跳上讲台，他激动地说：“我报名，打倒蒋介石，我得算一份，我家里也都同意。”他的话刚说完，又一个小伙子跳上台，这是他的弟弟艾思红，他二十一、二岁，身强力壮，膀宽腰圆。他说：“两个去，一个也摊不着，我去！”两个人都要报名。正在这时，一个老太太走上台来，这就是他们的母亲（妇女会长、老党员），她说：“孩子不用争了，你俩都去吧。”他俩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一起到领导那里报名去了。老太太又在台上发言：“我也报名参军！”台下哄地一声笑了起来，她严肃地说：“这是笑啥？我不能打仗，我不能给战士做饭吗？”

老太太刚下台，台上出现了一个青年媳妇，台下顿时静了下来。这就是艾思太的妻子，她从来不爱在人多的场合下说话，所以她走上台来，面红耳赤，神情紧张，好久没有说出话。这时，台下有人交头接耳的说：“八成是要拉后腿。”她说：“我也得参军去！”台下又哄笑起来，“大伙儿别笑，我不会打仗，我可会看护伤员，给咱的子弟兵洗洗缝缝”，艾思太的妻子又说。

顿时，全场沸腾起来了，年轻的小伙子，十八、九的大姑娘，刚剃过胡子的“老青年”都纷纷报名参军，整个会场参军声浪滚滚，上下欢声雷动。

在儿童团阵阵的口号声中，各村党员干部带头报名。前满村农会长李云西带全村18名青年集体报名上前线；韩庄村农会长韩效海带8名青年应征。此次征兵会上，全区有60%的青年报名，被批准入伍者达960余人。

入伍青年身佩红花，在唢呐声中登上车，陆续被送往祝口兵战。

是日，寿张县征兵高潮全面展开，全县群情振奋。寿张二区（今侯庙镇一带）在大李村也召开动员大会，到会的群众约两万余人，整个会场结红搭彩，标语盈目，到处扭秧歌，踩高跷，锣鼓喧天。县、区干部刚讲完话，各村干部和争先恐后积极报名入伍的人象海潮似的拥挤，把台子挤塌了。整个会场报名的声音如同雷震，24个报名处的凳子被报名的人们挤得东歪西斜。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着去参军的模范动人事迹，象潮水般的涌现出来。二区在征兵中，干部带头。小区干部葛永仓首先带头送子参军并激动地说：“我已老，不能奔赴战场杀敌，我送儿子葛传钟去参军，只要反动派存在一天，儿子就不能回还。”接着，上午送长子入伍的大杨村农会长杨成海，又送二子参军，成为双军属，并表示三子虽然年幼（12岁），长大后也要为祖国为人民建功。这时，杨新刚再也忍不住了，拉着弟弟杨新旺、儿子杨希贵跳上台表示：三人齐出征，战场上比英雄，出现了“一家三人三杆枪，新妇做衣送新郎”的模范典型。51岁的老大娘孙玉环也送

独子杨秀真去参军。侯庙区祝口村农会干部王氏大娘将2个儿子、2个孙子、2个侄子共6人同时送出参军，轰动全县。

二区此次扩军，踊跃报名者达5200人，政府批准2000人，平均每户就有1人参军。其中，父母送儿子参军者500名，兄弟相争从戎200名，妻送丈夫从军者400名。120户的大杨村，有34名青年参加了军。侯庙区受到县委的表扬，获参军模范锦旗一面。在欢送新兵时，群众扶老携幼，夹道欢送，锣鼓齐鸣，心中期待着子弟兵旗开得胜，早日解放全国人民。新战士们心情激动，勇气倍增。新战士杨成杰感动地说：“我们向前走不能后退，宁做英雄鬼，不能屈膝下跪。”

与此同时，台前县境东部，在张庙村召开征兵动员大会，一次扩军一个营。张秋县扩军一个团，时称新八团。

1947年春季，在征兵运动中，台前境输出子弟兵达7000人，大部编入冀鲁豫军区独立旅，随军跨过黄河，奔向鲁西南战场。

寿张县的大参军运动之所以开展顺利，县委、县民主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召开控诉蒋介石的大会，揭露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屠杀人民和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种种罪行，教育人民群众认清国内阶级敌人的总代表是国民党反动集团。让群众懂得，要想保卫土改翻身的胜利果实，不再受压迫剥削，必须坚决起来斗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二）通过回忆翻身的好日子是怎样来的，启发群众进行对比，认识到是共产党、解放军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要翻身不忘共产党。（三）培养典型，提倡党员和干部带头参军，从而带动群众性的参军热潮。（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明确

优属政策,解除新战士的后顾之忧。新战士入伍后,寿张县对赴前线战士们的家属,给予各方面的关心和照顾。区、村都订出优属公约,制定优属措施,使新战士都无离家牵挂,安心前方。

经过土地改革,从翻身农民中选拔的新战士政治素质高,他们到部队后不仅使部队的兵员得到了补充,而且还主动介绍家乡土地改革和拥军优属的情况,这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节 解放战争初期的支前活动

1946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陇海战役,台前民工分别在寿张县武委会主任马达、张秋县武委会主任谢惠玉的带领下,开赴陇海线,破击路轨,运送粮食弹药,抬担架,救伤员。此外,两县还组织民兵参战。陇海战役后,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向冀鲁豫解放区发动的疯狂进攻,刘邓大军从9月3日至10月29日,又先后发起定陶(又称大杨湖)、巨野、鄆南战役。在国民党军队快速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寿张县、区领导干部带头上前线,激发了群众的参战热情,一时形成支前热潮。县政府组建民工团(下设营),每区一个营,每营3个连,每连40副担架,全县组织出动担架1000余副、民兵四五百人。担架队和支前运输队不顾敌机轰炸,日夜抢送伤员和军需物资,受到冀鲁豫军区的表扬。11月19日,刘邓大军发起滑县战役,全县出动担架200副,组织民工、民兵3000多人支援。1946年秋、冬,解放军围攻聊城,县委组织担架队、小车队支援。

是年12月5日，寿张县成立战勤指挥部，下设动员科、组织科、财粮科。动员科负责民工的动员和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等；组织科主要负责干部的思想工作及干部的临时任务；财粮科主要筹集财粮等物资供应。区、乡皆设有相应的机构。指挥部在刘桥、白蜡仝等村设立兵站，具体负责筹集粮草、军鞋，接受并转运伤员等任务。寿张县战勤指挥部成立之日下达战字第8号指示，就动员群众参战、支差作出决定，对支差人员（自卫队，民兵）、物资、支差补偿等作出一系列规定。为了支援刘邓大军发动的一系列战役，寿张县每次都有县区负责干部带队，率领民兵、民工支前，每次少则几百人、几千人，多则达万人以上。

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服从前线”的号召下，寿张县除完成上述各次战役时上级组织交给的紧急支前任务外，还组织一批民工（含干部和民兵）分配到晋冀鲁豫野战部队的旅、团，随部队行动，随时准备接受应急战勤任务，成为野战部队“后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7年1月，巨（野）金（乡）鱼（台）战役打响后，县长谢惠玉带领2000名民工、270副担架，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受到冀鲁豫军区的奖励，奖给大盖枪一支，砍刀50把。《冀鲁豫日报》于2月4日详细报道了他们的英雄事迹。

是年3月，因国民党企图水淹解放区，提前堵塞花园口大堤，使黄河北移。巨金鱼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刘邓大军要撤至黄河北岸进行短暂休整。为保证部队在预定期限内胜利撤至黄河北岸，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命令沿黄寿张等县，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往返作战经

过的主要地段，3天时间内搭好黄河浮桥，要求“只能提前，不能推后”。二地委（运西）和第二军分区对寿张等县作了具体布置，要求县区主要领导亲自指挥，组织精干力量施工，确保搭桥任务按时完成。台前人民面对改道而来的黄河之水，在孙口黄河渡口用檩条、秫秸、木板、土石建造了简易浮桥，在限期内完成了任务，使刚刚完成豫皖边战役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二、三、六纵队6万人在3天内由黄河南浩浩荡荡通过浮桥转到黄河北岸。

根据上级通知，刘邓大军北渡黄河后，寿张县委又组织民工立即拆毁了浮桥。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先头部队赶到黄河南岸，连刘邓大军的人影也没有看到，只能望河兴叹。这次搭桥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受到了刘伯承司令员的表扬，他说：“鲁西人干事快，他们对人民战争的支援，是要载入史册的。”

经受8年抗日战争锻炼的台前人民，深深懂得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英勇地与国民党军队及其地方武装的战斗，就没有自己的一切。所以他们把支援人民解放军的作战需要，当作自己最神圣的义务，用群众自己的话来说：“宁肯自己吃得差些，穿的差些，日子过得苦些，也决不能让自己的部队挨饿受冻、伤员得不到救治、病员得不到护理、物资得不到保障、兵员得不到补充。”

寿张县的战勤工作是在时间紧、任务重、条件差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短时间内迅速适应了战争，并学会了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以简陋的运输工具进行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支前工作，以保障前方需要，充分显示了各级党组织和战勤指挥部高度的组织应变能力。一年

来，寿张县战勤工作的主要经验是：（一）深入进行教育，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为什么出担架？”和“为谁干？”、“怎样可以完成任务？”（二）坚持战争与土改和生产相结合。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群众的土地要求，把战勤工作和群众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调动群众支前的积极性，这是一切战勤工作的起点。群众得到土地后，渴望发展生产，而长期支持战争也有赖于生产的发展。在结合方法上，一是建立村指挥部，村干部分工负责，一般是村长负责供给柴粮，武装委员、自卫队长负责担架，农会长带领群众进行土改，重要问题集体商量决定后分头去办。二是加强战勤组织，建立正常支差办法。寿张县每个村把担架、大车统一编制，第一班出发后，又一班就准备，任务一到，马上出发，不用临时乱抓。支差实行计工办法，力求公正合理；强调村干部起模范作用，力求减少不出差的人数；城市小商人适当照顾，上次逃避的下一次一定出。三是坚持干部带头。在大规模的支前中，寿张、张秋等县每次出征都有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带领。他们身先士卒，与群众同甘共苦，以榜样的力量带动群众的支前热潮。寿张县长、张秋县委书记都亲自带领担架队支援前线，并成为执行群众纪律的模范。四是开展立功运动。这是战勤工作中普遍开展的一项活动。当时的口号是“人人都立功，胜利有保证”、“前方立功更光荣”、“功从勇中来，劳从苦中生”等，提高了群众开展立功活动的自觉性。民兵、民工每次出征，都要利用战勤休整时间进行评功表模。在支前中，大家互相竞赛，争当模范。在参战干部和群众中涌现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受到了部队和各级领导机关的嘉奖。张秋县在两次评议战勤工作中，通过

开展竞赛,参战热忱极为高涨,受到冀鲁豫后方总指挥部的通令嘉奖。张秋民兵连因成绩卓著,野战部队除奖给 15 支好步枪外,还给每人记大功一次,《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导宣传。通过开展立功竞赛活动,树立了榜样,鼓舞了士气,保障了支前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五节 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经济工作

全面内战爆发后,冀鲁豫区党委于 1946 年 7 月 30 日向所辖各地委、县委传达《中央对目前时局的指示》,明确指出:在财政供给上,我们靠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要做到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必须十分节约使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资源,力戒浪费,必须努力生产,使一些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布匹完全自给。寿张县从 1946 年冬至 1947 年春为大力发展生产,主要采取了 4 项措施:一是确定地权。普遍进行丈量土地,确定或巩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二是发放农业贷款,扶持农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三是组织生产互助组。广大农村按照等价交换、自愿结合、民主领导的原则,普遍组织了生产互助组。四是大力提倡养猪积肥和增加畜力。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寿张县的生产运动做到了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1947 年春,寿张县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广大贫苦农民普遍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级党委、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掀起农业生产高潮。一是扫除思想障碍,提高增产节约、发家致富的热情。对村干部、共产党员进行生产是革命任务的教

育,宣传前方作战后方生产义不容辞。在中农贫农中明确共产党对生产的政策,指出“劳动发家,合理合法”、“庄稼钱万万年”、“中贫农是一家,不斗不罚。”二是明确生产方向就是增加家庭收入,解决了过去“生产为了互助”的糊涂思想。三是动员全体劳力半劳力参加生产,增加畜力。四是从增产入手,组织各种形式的互助组。五是实行合理负担。按照富者多征、贫者少购、受灾减免和烈军属优待的原则,修正了合理负担办法。负担土地按照自然亩的地力和产量折合为标准亩,由标准亩减去免征点为负担亩。六是开展生产中的立功运动,树立生产中的各种典型。通过深入发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增,家家户户制订生产计划,互助形式由领导组织为主变为自愿结合为主,由单纯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变为农业、副业、农副业结合的多种互助形式。互助组,人与人,户与户,组与组,村与村,开展劳动竞赛,争做生产模范。全县牲畜迅速增加,废地、坑地、边地得到大面积开发。1947年全县农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基本达到了自给自足。1948年在战胜旱涝灾害后,又取得了较好收成。

随着农业建设的逐步加强,寿张城区工商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寿张县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积极扶持,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成立人民代表大会,提倡大家的事大家做,工人、店员与店主在政治上、人格上平等;对历次群众运动中被斗争的工商业者,除汉奸、特务、恶霸外,其余无条件地退回其被没收的财物,银行采取无息、低息贷款支援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二是加强管理,建立市场秩序。对在一定时期内少数人违犯政策,唯利是图,哄抬物价,买空卖空,县委、县

政府发现后,立即予以打击。部分运输工人为了赚钱而相互抢运以至打架斗殴,妨碍了工商业生产和正常经营,县委、县政府及时出面做工作制止。三是发展交通运输,开设交易所,搞活商品流通。四是加强税收管理,稽征各种工商税,使税收金额大幅度增加。随着一系列扶植发展工商业生产措施的落实,全县工商业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局面。

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示各地迅速对广大群众进行作好准备战争的思想动员,保证部队供给,加强防奸锄奸,稳定战时金融,做好战时后勤等工作。8月10日,冀鲁豫边区政府经济部为确立财经保障,巩固根据地,支援战争,针对“物价与货币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切实主动地做好工作。这一时期,寿张县的对敌经济斗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斗争。针对法币内侵,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明令宣布和大力宣传蒋钞(法币)为非法货币,组织群众排除蒋钞,用法币到蒋管区换回急用的物资,用行政手段以冀钞压价换取蒋钞,通过部队开支、社会救济、发放生产贷款、收购粮食布匹等渠道发行冀钞;对印制假钞的行为严厉打击。二是加强市场管理,严禁主要物资外流,防止非法品输入。县成立缉私队,缉私队经常在敌我交易的边沿区、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进行封锁检查,凡从解放区向外倒运的粮食、布匹等,一旦查住,即予以没收。从而平稳了物价,维护了解放区的经济秩序。

第六节 依靠群众 镇压还乡团

1947年春,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寿张黄河北四个区为解放区,黄河南四个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黄河北四个区的地主逃往河南,与南四区的地主沆瀣一气,在国民党军队的操纵下,组建了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跟随国民党军队对原黄河南解放区军民反攻倒算,还时刻准备着北渡黄河进行阶级报复。他们利用人熟地熟的条件,依仗国民党军队的势力,歇斯底里地进行反攻倒算,对共产党员、农会干部采取乱抓乱捕、严刑拷打、活埋、扒心、铡死、刺死、碎尸、剖腹、砍头(悬挂)示众、割乳房等数十种极残忍的手段,进行阶级报复,妄图夺回失去的“天堂”,反动气焰极其嚣张。

寿张县、区委和县、区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带领县、区武装及广大干部、民兵和群众坚决打击还乡团的罪恶活动,坚守农村阵地。采取的主要对策是:警告还乡团分子悬崖勒马,改邪归正,不要与人民为敌;区级政府有杀人权,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处决后将布告盖在罪犯身上,以震慑敌人,争取中间分子弃暗投明;根据党的有关政策精神,制定打击还乡团分子的约法,并以县、区政府的名义贴出布告,约法的主要内容是:(1)杀害、威胁和报告我干部、共产党员、武装民兵、积极分子及军、工、烈属者严惩。(2)向农民反攻倒算者严惩。(3)煽动民兵缴械投敌者严惩。(4)报告公粮和我军用物资情况者严惩。(5)向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提供情报者严惩。(6)利用会道门组织武装者严惩。(7)造谣破坏者严惩。同时,提出如下口号:(1)欢迎被迫、受骗参加还乡团的群众回家过好日子。(2)允许逃亡地主回家向人民政府和群众悔过。(3)给改恶者以自新之路,允许带罪立

功。(4)对胆敢以身试法者坚决镇压。根据约法,寿张县、区先后处决了一批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

1947年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还乡团一个中队由高振烈带领在小吴一带抓了30多名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夜里准备活埋。县委接到情报后,立即由县长张云峰、武委会主任马达带领20多名战士驾船渡河,夜间把被捕的党员、干部全部解救出来,当场击毙8名还乡团分子。

通过上述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还乡团的嚣张气焰,为群众出了气,壮了胆,震慑了敌人,同时对分化瓦解敌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第七节 大力做好情报和交通联络工作

大力做好情报和交通联络工作,是保证取得坚持对敌斗争胜利的重要手段之一。1946年底,第二军分区(运西)建立了情报站(对外称交通局),配有站长(何林)、政治委员、副站长(2人)、参谋(3人)、测绘员、卫生员、武装交通员(14人),共23人。各县设有情报站,一般5至7人,分站长由区委确定,区以下的重要村镇、重要地段和重要通道设情报点,一般1至2人。寿张县邮政局约有专职情报人员八九十人,形成了实力较强的情报网络。情报人员的基本任务是:(1)了解进犯的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人数、武器装备、战斗力、布防方位、防御工事、兵力分布、火力配置及地方武装、还乡团的活动情况;(2)依靠当地政府和群众组织推荐情报站点人员对象;(3)物色城内专职

情报员；(4)情报站定期不定期书面汇总全县情报，专题报告军分区和地委。情报站的联系时间和方法是：一般情况下，县情报站向军分区情报站1至2天联系一次，遇紧急情况及时联系。联系方法用暗号，如“山”是敌人，“十”是军，“0”是师，“×”是旅。同时，加强交通联络工作，其任务是：负责接收和传递邮件(包括文件、命令、指示、情报、战报等)。其方法是：一般情报，通过所建立的地下联络线点依次接收和传递；紧急情报，加派武装交通员传递，保证按时送给有关单位和人员。

为了解决黄河南北邮件及时传递问题，1947年4月，冀鲁豫行政公署在范县李盘石和寿张县孙口建立了临河第一邮站和第二邮站(县级)。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寿张县和其他地方党领导的交通、邮政战线的同志一起，出生入死，机智勇敢，神出鬼没，建立起摧不毁、割不断的交通、邮政线路，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寿张县情报点和交通联络站、点的建立，对粉碎敌人的“清剿”、“扫荡”，有力地打击国民党小股军队和还乡团的侵袭，支援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八节 黄河归故斗争与人民复堤自救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本侵略军西进，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使滔滔黄河水凶猛地向东南方向奔流。其结

果不但没能阻止日军进攻，却制造了一个包括豫皖苏3省44个县的黄泛区，造成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90多万人被淹死的惨景，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黄河改道后，黄河两岸大堤长期失修，加上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到解放战争爆发前已损失三分之一以上。因黄河故道8年无水，部分河床被垦作农田，新建有1400个村庄，大约有40万农民在这里生息耕作。同时，河床高于两岸大堤外的地面数米，若不复堤浚河抢修险工，不迁移河床居民，就堵口归故，就会制造第二个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支持下，冠冕堂皇地打着拯救黄泛区人民的幌子，单方提出黄河归故，企图以水代兵，水淹解放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同时，把黄泛区人民对黄灾的怨愤转嫁到共产党身上。1946年3月1日，在事先未与解放区洽商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于花园口正式进行堵口工程。

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考虑到黄泛区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以大局为重，同意黄河归故。但严正提出，必须停止在下游未复堤的情况下就进行堵口的行动。中共中央提出的斗争方针是：争取时间，推迟堵口，加紧复堤，同时在政治上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在经济上要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民党当局承担复堤工款和河床居民救济款。

寿张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根据上级的指示，组织广大群众，一面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一面加紧做好复堤的准备工作。1946年2月22日，冀鲁豫区成立以王化云为主任的黄河水利委员会。3月

中旬,寿张县成立黄河修防段,设有秘书、工务、财务3个股,1946年夏增设船管股。县黄河修防段成立后,广泛动员,聘请有治黄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治黄工作,并组建工程队,分赴故道沿岸进行勘察测量和整修险堤。

国民党当局鉴于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迫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决定就黄河归故的有关事宜与中共进行谈判,于1946年4月7日和15日先后签订《开封协议》和《菏泽协议》,明确了先行复堤浚河,裁弯取直,整理险工,迁移河床居民,然后再行堵口。但国民党当局和联总一手在协议上签字,一手仍在花园口堵口,同时不付给下游修堤的工款、粮款。面对国民党当局这一罪恶行径,1946年5月1日,二专署(运西)所属寿张、张秋等县50多万群众集会,签名抗议蒋介石集团新罪行。5月9日,冀鲁豫行署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筑堤防水计划,号召沿黄河两岸的人民群众紧急动员起来筑堤自救。5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警告国民党当局,要求迅速停止花园口堵口工程。由于解放区人民的坚决斗争,5月18日,国民党当局被迫又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在两个协议的基础上签订了《南京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复堤工程所需的一切器材、工粮、工款,由联总、行总(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黄委会尽快提供;迁移黄河故道居民的救济等迅速核定办理;抛石堵口要视下游复堤工程情况,由双方协商进行,以不使下游发生水灾为原则。为执行《南京协议》,按照冀鲁豫行署的统一部署,寿张县于5月26日起动员大批民工开始以复堤自救为中心的反蒋治黄斗争。当时,正值麦收大忙季节,广大群众放下自己的生

产,自带食粮,迅速参加了复堤工程。全县每日上工达5万余人,在工粮、工款没有下拨,饮食困难,工具缺乏,劳累过度,且没有帐篷、日晒夜露的情况下,许多民工病倒在工地,但只要能坚持,他们仍然不离开。寿张县在青壮年上河复堤走后,把老弱妇孺组织起来成立生产互助组,既使生产减少了损失,又使上河民工解除了后顾之忧。在修堤过程中,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上堤与民工们一起劳动。至7月10日,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堤上獾穴、鼠洞等修补完毕,有的工段加高加固,河岸大堤得到初步恢复。

然而,《南京协议》签订后,国民党当局继续加紧堵口,意在配合其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7月,中共代表王化云、国民党代表薛笃弼、美方代表塔德在寿张书院就黄河归故问题进行谈判。寿张县长张云峰参加了谈判。寿张县组织群众代表到谈判处请愿。是月14日,周恩来和“联总”黄河工程处顾问及冀鲁豫黄委会代表飞赴上海,与“联总”、“行总”于22日达成《上海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堵口须在本年9月中旬开始,11月前筹赈济款150亿元(法币)交解放区使用,中共方面派伍云甫为驻“行总”代表。12月18日,中共代表赵明浦,冀鲁豫边区代表段君毅、王化云,与国民党开封“黄委”美籍顾问塔德,国民党堵复局代表齐寿安、阎振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鲁西代表韩森等人,在张秋镇就黄河复堤和花园口放水问题举行会谈,形成“张秋会谈纪要”。后又在河北邯郸举行会谈,经一系列斗争,共产党和沿黄广大人民在黄河归故问题上赢得了舆论的支持。

《上海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便于1946年8月向冀鲁豫解放区

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蒋军所至,大肆抢掠和破坏解放区原有的治河物资器材,对解放区治河机关、民工进行狂轰滥炸,迫使解放区复堤工程于8月15日全部停顿。12月27日,国民党当局以合拢工程技术需要为借口,将部分黄河水引入故道。28日后,蒋军不断派飞机轰炸黄河北岸堤坝险工、料工等,炸毁了寿张、张秋等段的河堤,有几处出现了破堤危险。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当局在黄河堤坝有120余里未修复、险工37处未完成之际,下令花园口堵口工程合拢,将黄水全部放入故道。据不完全统计,仅冀鲁豫解放区的寿张等10县滩区,被淹村庄达237个,淹没耕地27万余亩,受灾群众陷入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

在此严峻情况下,3月21日冀鲁豫行署发布训令,要求把治黄作为沿河地区的中心工作。5月3日,行署发出布告,进一步号召全区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修堤自救。寿张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立即动员组织全县人民,不顾敌机轰炸扫射,于5月15日再次掀起复堤高潮。全县动员妇女给民工做饭,3000名妇女还上堤与男子比赛修堤。至7月23日,完成修复任务。境内大堤普遍加高2米,加厚3米,并整修了险工。7月底,当第一次洪水到来时,解放区大堤安然无恙,经受住了考验。至此,所谓“40万大军”匍伏在人民的脚下,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集团的罪恶阴谋,保证了黄河归故后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保证了刘邓大军经黄河北上和南下作战的畅通。

第九节 加强河防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公然积极扩军备战,撕毁重庆谈判协定,利用美械装备的暂时军事优势大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在飞机的掩护和炮兵及坦克部队的推进下,占领了黄河以南广大区域,不时向黄河北岸解放区炮击。台前临黄河沿线全长50公里,是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前沿阵地。孙口、林楼、十里井等黄河渡口,既是国民党部队北渡黄河进攻解放区的水路要冲,又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实施战略反攻,南渡黄河,逐鹿中原的战略重地。一时,黄河两岸沿线地带处于极度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当时,台前境内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农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热情十分高涨。为了阻击国民党部队的进攻和“还乡团”分子骚扰及特务破坏,以保护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县民主政府从自卫队中抽调青年模范班和基干民兵组成河防团,县委书记杨村夫兼政委,县长张云峰兼团长。河防团在分区武装部领导之下,团部以县自卫队武装为主组成,团下属营以区为单位由区民兵武装组成,连的组织由抽调的比较好的村干部组成。寿张县武装部长(之前称武委会主任)谢惠玉兼副团长和副政委。团部内设政工室、参谋处、供给股等,下设营、连、排。寿张县河防团下辖3个营,营下辖3个连,每区设一个营,乡、村设连、排。河防团为民兵武装。台前境内沿黄民兵共计6000人,分据黄河各段防守,严防国民党的破坏。

河防团实行严格的教育训练。军事教育主要是进行投弹、射击、刺杀三大技术训练，还进行进攻、防御基本知识、军事条令、陆军礼节、工事构筑、紧急集合、阅兵分列式、防空演习等教育。政治教育方面，根据形势任务，进行阶级教育，挖苦根，提高觉悟，增强守河信心；结合土地改革，贯彻复查政策，划分阶级，整顿组织，分清敌我；围绕参军运动，反复进行阶级教育和开展立功运动。通过严格的军事政治教育，河防团广大民兵的军事技能和阶级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涌现了许多模范人物。

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队、土杂武装配合军事上的进攻，频繁派出化装后的小股武装，窜入北岸解放区，或抓夫，抢粮，派款；或暗杀革命干部、积极分子；或破坏堤防，烧毁船只等。土改时，外逃的地主也时常组成还乡团，返回解放区进行反攻倒算活动。

为了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寿张县河防团在河防线上挖交通沟，为防对岸国民党军队的炮击，并挖有盖沟和单人掩体，与国民党军队隔河相峙。一里布防一个班，重点地段如孙口、十里井等设团部或营部。河防团开展斗争的主要方式是：（一）冒着国民党巡河飞机的轰炸，日夜监视敌情，站岗放哨，不时阻击小股来犯之敌。（二）封锁黄河，盘查行人。1947年，寿张县查获派遣特务62名、逃亡地主108名、国民党军队逃兵2182名，以及大批银元、法币、货物。（三）渡河主动出击，以攻为守。有一次，由赵玉山带领100名民兵出击南岸敌人，俘敌27名，缴获长短枪19支，把敌人压缩到小清河以东，保证了河防安全。1946年下半年，解放军主力部队多次越过黄河打击国民党

军队,收复失地,黄河形成南北“拉锯”形势。县长张云峰、武委会主任马达经常带领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渡河偷袭国民党军队。

为固守黄河、保卫解放区和待机实施军事进攻,护送大军渡河作战,冀鲁豫军区于1947年2月,成立黄河河防指挥部,司令部先驻台前长刘村,后移至孙口村。黄河指挥部所属士兵与寿张县河防团实行军民联防,形成了攻不破的百里防线。(详见本章第十节)

1947年4月28日,黄河南岸一股国民党军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强渡黄河,妄图破坏北岸的船只,在黄河河防指挥部曾辉宪司令员指挥下,军民给予迎头痛击,毙20余人,其余仓惶逃回南岸。

1947年6月16日,国民党55师尖刀排乘两只小船,偷渡黄河,被县河防团民兵击翻,22人被打死或淹死。

1948年,华东野战军一部发起豫东战役,攻克开封后速作战略转移,北渡黄河。国民党部队认为华野败退,于是疯狂追击,气焰十分嚣张,黄河以南一时敌军较强,“还乡团”分子活动猖獗,到处捕杀共产党员,活埋农会干部。寿张县黄河南4个区和郟城等县的地方武装及政府机关不少人转移到黄河北根据地,与黄河南国民党军队形成军事割据局面。国民党为防御解放军渡河,调来重兵据守河崖,构筑工事,修建碉堡群,并封锁河面和渡口,每天有大批飞机沿河狂轰滥炸,对黄河北上至李桥下至十里井200里的沿河村庄进行俯冲扫射,每日达10余次。1948年5月下旬某日下午,敌机突然轰炸孙庄,此村为黄河司令部驻地,一颗炸弹落在四大队二排驻地上,当场炸死8人、伤17人,孙庄村民也遭受很大损失。是时,沿河军民整日活动在“防空”

之中,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残酷。

面对国民党重兵压境和反动地方武装的进犯,沿黄军民发出“誓死保卫解放区,坚决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誓言。河防团民兵冒着敌机的轰炸,日夜坚守阵地;黄河司令部所属士兵和水手不顾敌人的炮火,在沿黄村庄建造船只,训练水手,做大军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1947年6月--1948年10月,沿黄军民浴血奋战,渡过一年多艰难的岁月,赢得了保卫解放区和向国民党统治区全面进攻的胜利。

第十节 黄河司令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即1947年,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指引下,已经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连同地方武装共120万人,敌我军事力量的消长起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立即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争取中国革命早日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并且制定了“两翼嵌制、中央突破、三军配合”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首先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于7月前突破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大量歼灭敌人,配合山东解放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尔后向国民党统治区纵深腹地大别山跃进,在鄂豫皖作战略展开,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中央军委早于1946年10月就指示刘邓野战军作好渡河南下作战的准备工作。为此,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二、三、六纵队共12·4万大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

平政委的领导下,准备在西起濮县林濮集东至东阿县张秋镇三百里长的黄河沿线,举行战略反攻。刘邓首长指示冀鲁豫区迅速做好大军渡河的各项准备和黄河防守工作。

冀鲁豫区党委于 1946 年 11 月决定筹建黄河河防指挥部,不久改称黄河司令部(以下简称“黄司”),郭英任政委。1947 年 2 月 10 日,“黄司”正式成立,王化云兼司令员,不久改由曾宪辉任司令员。3 月至 5 月中旬,由于军区和地方大力支持,“黄司”组织机构很快基本健全,司令员曾宪辉,副司令员刘茂斋,政委郭英;参谋长梁仁魁(军队干部),副参谋长谭光汉(长征干部);军事科副科长张杰(原七纵队参谋),政工科副科长王镇山(原七纵队政治部政治协理员),船管股长武鸣岚,总务科长刘涛,供给科长王耀先;武装营营长张杰(兼),教导员王镇山(兼);造船厂厂长李廷君。5 月底,军区决定黄河司令部各科一律改为股,科长一律改为股长,并成立政治处,政治处下设组织股、宣传股,组织股长由王镇山担任,宣传股长由李肖担任,王庆忠任特派员。6 月初,军区派李兴程(长征干部)任政治处副主任(1948 年 8--9 月间军区派朱品文任政治处主任,李兴程调走)。

在黄河河防指挥部下,各县也先后成立县黄河河防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县的黄河河防和修防,各县黄河指挥部下还先后成立民防团,民防营,负责全县境内的河防工作。黄河指挥部是地方性质,由当地党政领导。但在 1947 年 9 月,因斗争形势紧张,为统一领导,沿黄各县一律改为人民解放军河防团,直至是年 12 月份。黄河司令部自成立时起就担负着沿河上至濮县,下至东阿,后延伸到济南的黄河河防

线。此段黄河防线，在解放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是相当重要的，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

“黄司”直属有河防营和兵工厂。兵工厂设在长刘村和陈楼村，负责造船只和军火。黄河司令部开始既不管黄河修防，又不领导各县的黄河河防指挥部和各县境内的河防（包括各县的河防团，河防营等）。虽然，各县黄河修防段领导的船管股，改由黄河司令部领导，但是建船只、扩大水兵等工作仍需依靠沿黄河各县协助解决。

黄河司令部的任务是：

一是造船，作大军过河的准备。每个渡口要造船 20 只，其中大船两只。造船采取分散、隐蔽的方法，包括寿张县在内的沿黄各县普遍成立了木工厂、铁工厂、纺麻厂，生产木板、铁锚、麻绳等必用物资。赶造木船要时间快，质量高，可以说是开足马力，日夜奋战。在造船的日日夜夜里，孙口渡口造的比较快，船也比较大，共造了 50 多只，有几只可以容下几辆大汽车和装甲车。“黄司”在沿黄各县共造战船 320 只（台前境造船情况详见本章第十一节）。

二是护船，防止黄河南敌人的骚扰破坏和敌机轰炸。在黄河北岸制造船只，一开始就被国民党新五军发觉了，他们不断派遣船只偷袭，同时，派飞机每天来轰炸。5 月初黄司要求各船管股：（1）挖船坞（船坞是在河边上挖个地洞，棚上盖子，把水引进去，船藏到里面）和用覆盖物隐藏船只，工程大的船坞，除有藏船之处外，还要开挖引河；（2）挖防空洞，如敌机来轰炸，人员可及时隐藏起来，避免人员伤亡。（3）大造船厂把工序分散，减少轰炸目标，避免损失，加快造船速度。尤

其是陈楼造船厂是专造百余人的大船厂，民工最多，目标最大，民工经常达五六百人，仅锯木工经常就有 200 余人。因树有多高，就锯多高木板，锯工少了，影响进度，工序不分散，人多目标大，敌机发现就会造成严重破坏。为了减少伤亡，开始把兵工厂挪到树林里，把造好的船只藏在船坞里。敌机炸不到船，他们又派兵偷渡，妄图过来烧毁船只。

有一天早晨，国民党军队约一个排的兵力乘两只船向河北岸驶来，曾宪辉发现后来不及下达命令，就从一个战士那里夺过来一挺机枪，带领其他两名战士扑向河沿，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打沉了两只船，50 多人淹死在河里。接着南岸国民党军队又向此举防御阵地发起炮击。河防民兵与敌人展开激战，战斗从早晨打到下午 3 点停止。

5 月的一天上午，孙口对岸的国民党军队突然向孙口渡口发射两发炮弹，打在孙口村的空地上，村民们没受损失，“黄司”人员向河对岸仔细观察，有两只小船已离岸驶来，企图袭扰“黄司”，破坏船只，对岸和船上的士兵不停地向北岸射击，炮弹也不断落在此岸边。

“黄司”独立营一班在执勤，曾宪辉在四大队部听到枪炮声立即赶到渡口，一方面指挥执勤班隐藏射击，另一方面让四大队通知武装营赶快先来一个排支援，其余各连待命。当支援排赶到渡口时，国民党军队乘座的两只小船已过来大流。由于河防民兵猛烈射击，船被打坏，不久沉没。强渡之敌 30 余人被打死，河防战士和水兵仅有 3 人负伤。

5 月下旬的一天，国民党飞机经过多次侦察，确认陈楼造船厂是大的造船厂。从早上 7 点开始到下午 5 点，对陈楼进行狂轰乱炸，不少房子被炸毁，几名群众被炸伤。船厂由于工序已分散，又挖了防空洞，

民工及时隐蔽， 仅仅损失了一小部分料物。第二天民工照常紧张工作。

三是防守黄河，保卫解放区。当时，黄河以北地区已全境解放，成为可靠的后方。解放区正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一些顽固的地富分子跑到黄河南，组织起反动的“还乡团”，配合国民党新五军企图杀向黄河北，破坏土改，残害革命干部，气焰十分嚣张。黄河司令部又肩负起防守黄河，打击入侵之敌，抗击还乡团，保卫解放区的重任。1947年4月，全区大扩军，军区让“黄司”成立一个武装营（也叫直属营或独立营）。武装营的任务是哪个大队（当是还是船管股）把守的渡口吃紧就到哪里支援，以便防止小股国民党军队渡河骚扰和破坏船只，维护渡口的安全；也可以出击南岸国民党军队。

四是转运军用物资，护送军民。当时，黄河南是游击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革命干部以及大批群众，要通过黄河渡口到黄河南开展游击活动。形势紧张时，又要护送大批干部和群众到黄河北存身。开封解放后，要把大批胜利品、枪炮弹药和一些伤员转到黄河北解放区。同时，所有支前物资都要通过黄河渡口运往前线。

五是训练船工，加强政治和技术指导。在国民党军队的炮火之下， 以最快的速度强渡黄河，把十余万军队安全运到对岸，没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驾船技术是不行的。以郭英政委为首的政治部对选拔的船工抓紧进行政治教育， 提高船工的政治素质和阶级觉悟。他让政工部门汇编了阶级教育手册《跟上去》，组织船工水手学习。这本阶级教育手册，是以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残酷欺压剥削工农群众， 造成

家破人亡的真人真事和国民党军队杀害解放军党政干部战士、革命家属的事实,以及没剥削、没压迫的解放区人民的安居乐业和未来美好前景为内容编写的,船工水手们学习以后深受教育。与此同时,“黄司”举办了军事和渡河技术训练班,请军事干部和老船工传授技术,使水手们的驾船技术得到很快提高。

六是组建水兵大队,训练水兵。水兵大队的前身为黄河修防段船管股。黄水归故道后,黄河南岸变成游击区,河南岸的船管股和船只合并到河北岸的船管股,仍由黄河修防段领导。1947年4月,根据冀鲁豫区党委和“黄司”的安排,开始筹建水兵大队。6月初,根据军区指示精神,船管股改由“黄司”领导,并一律改建为水兵大队,大队相当于军队营级建制,大队级干部相当于营职,大队设正副大队长,正副教导员,大队下设军事、船管、供给三个股。水手又称水兵,按军队待遇。当时,为确保大军安全渡河,“黄司”和沿黄寿张等各县县委、县政府又征调组织2300多名水性好、撑船技术较高、政治表现又好的沿黄水手组成支前水兵(又称支前船工),他们多是沿黄各村有撑船经验的青壮年,如孙口孙庄王黑、辛庄等村许多青壮年当了水兵。这些水兵共编为5个大队(寿张县属4大队),每个大队设3—4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每个大队根据中队的多少负责防守3—4个渡口,每个中队配若干只船,船上用树枝伪装,船帮用秸草绑缚,以防河水撞击时发出声响,船内用沙袋构筑掩体。准备就绪后,“黄司”发给水兵部分武器,进行驾船军事训练。时逢雨季,黄河猛涨,水流湍急,南岸国民党军队不断打炮,空中飞机时常侦察轰炸,水兵们

每夜进行超常规训练，苦练划浆、掌舵、撑篙，学习隐蔽、抢救、泅渡等技术。水兵大队和各县河防团组成了 300 余里的黄河钢铁防线，从此，沿黄军民完全掌握了来往渡河的主动权。

第十一节 为刘邓大军过河造船抢造渡船

一、开挖引河和船坞

1947 年 4 月，根据上级指示，为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对岸国民党军队及还乡团分子破坏船只，“黄司”和寿张县委组织沿黄群众，将各渡口的船只集中到北岸隐藏。沿黄军民从渡口向村庄附近的树林开挖引河。引河长短不一，一般长四五百米，宽 20 多米，深 3 米，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挖引河的人多，目标大，国民党的飞机不断来轰炸，民工冒着生命危险施工，飞机来了就躲向树林，飞机飞走后继续开挖。为不暴露目标，民工们没有垒灶做饭，以炒面和其他熟食充饥，为避白天国民党飞机骚扰，民工不顾连日劳累，晚上奋战。黄河岸边多为沙质地，水层浅，有时泥水没膝，民工弄得满身泥浆，但全然不顾，昼夜苦干，很快挖出一道道引河。同时又在引河崖上挖修大洞，也叫船坞，把所有收集到的船只藏在里边，上面覆盖树枝、柴草。

二、造船

沿黄军民收集到的船只，大部分破烂陈旧，多是花园口改道以前船只，容量小，最大仅能乘坐三四十人，而无法运送汽车、大炮，远远满足不了大军渡河作战需要。于是“黄司”在沿黄各县群众大力支

持下，先后于台前境内孙口、张堂、林楼、毛河先后兴建起五处较大的造船厂，调集沿黄村庄木工制造大船。寿张县紧急动员，封号大树，准备苕麻；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采购桐油，挖铁路，凑钢材、赶造船只。全县沿黄 10 华里以内的群众主动将自家大树砍伐，支援造船。在广大群众积极献工和献料过程中，寿张县涌现许许多多模范人物，其中最典型的是王潭村的王导祥，他把多年给老人做喜棺的一棵大树贡献给船厂造船，他的全家老小都说“救国为救己，有国才有家，跟着共产党，才能过安全日子哩。”“黄司”航运人员也连日筹购木、铁、油、麻、灰等物料，做好后勤供应。当时，孙口附近兴建一处较大规模的造船厂，开始设在毛河村后树荫下，刚刚施工，就被国民党飞机发现目标，盘旋轰炸，造船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设备迅速转移到陈楼村西林带里，继续施工，这里面积大，树木茂密。由于局势恶劣，造船工人们风餐露宿，生活极其艰苦，但情绪却十分高涨，翻身船工个个奋不顾身，木工组、铁工组、麻缆组互相配合，团结奋战。造船厂里锯声、斧声、凿声、锤声，还有造船工人哼着的“反蒋”小调声，此起彼伏，在林间回荡；拉锯的、舞锤的、推刨的、拣料的，繁忙而又紧张。开始，陈楼造船厂由黄委会直接领导，不久，为了加快建造大船的速度，改由“黄司”和黄委会双重领导，该船厂有干部 20 名。

1947 年 2 月上旬，陈楼造船厂由王克江亲手制造的平头“大 1 号”（长 8 丈 5 尺，宽 4 丈）船竣工了，船厂举行庆贺典礼，自此一只只大船陆续制成。至 5 月，陈楼造船厂共造船 28 只，均按长宽和面积的大小，依次由 1 排到 28 号。

三、藏船

造船不易,拉船更难。陈楼船厂距孙口渡口 10 华里,途无滴水,旱地行船,极为困难。为使平头“大 1 号”船早日下水待命,遂调集全区青壮年拉船。当时拉船的口号是:

铺船路哟,嗨嗨,
用秫秸哟,嗨嗨,
挑水和泥挨堆排,
中国人民志气大,
船过路酥大树密。

他们在拉船的路上铺满秫秸,上面垫盖淤泥和水搅成的泥浆,用人力前拉后推,向前滑行,奋战一天,傍晚将船拉到渡口下水待驶。1947 年 7 月 4 日夜,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时,刘邓首长就是乘这只平头“大 1 号”船渡过黄河的。

在陈楼造船厂施工的同时,境内其他造船厂也在紧张的工作,先后制造出一只只大船,全县造大船计 120 只。这些大船一船能渡一排人,甚至一连人,大的能载 200 多人和 5 辆汽车。船造好后下水均很困难,有的用四轮大平车运,有的垫上木板、高粱秸、麦秸,用人畜拉。县区干部群众总动员都参加拉“旱船。”用牛拉船还不能吆喝,只能用“哑巴打牛”的办法,以防对岸国民党士兵听到声音。尽管如此,在拉船的途中,还是经常碰上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为躲避飞机轰炸,船插柳荫,人戴柳帽,远远望去,船如青松,人如翠柏。尽管如此困难,但军民协力把一只只大船按时运到各个渡口。

第八章 全力支援战略进攻，迎接全国解放

(1947.6~1949.9)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自卫反击作战，在各个战场上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以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在台前孙口强渡黄河为标志，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伟大序幕，台前全境成为解放军前进的后方基地之一。此期，中共寿张县委领导全县人民深入开展土改复查运动；积极恢复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动员大批青年参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抢建黄河浮桥，胜利完成了运送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三支大军南下作战的光荣历史任务；组织三批干部南下。从财力、物力、人力、干部等多方面，全力以赴支援了前线。同时，广泛开展整党运动，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台前人民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节 支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一、刘邓大军将主要渡河地点选在孙口的主要原因

(一)、这里是敌军的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

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蒋介石被迫把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分别集中31个旅共20多万人压在陕北战场上，56个旅40多万人压在山东战场上，沿黄一线则兵力空虚。刘伯承司令员把当时

战场上这种敌我态势，形象地比喻为一只大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国民党军队的要害部位和薄弱环节。1946年底，国民党将黄河水全部引归故道，企图水淹解放区，以水代兵，并吹嘘“黄河天险足抵四十万大军”，派遣多批轰炸机对复堤民工进行轰炸扫射，仅在南岸构筑了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用两个师直接扼守河防，另外摆一个师在嘉祥地区机动，兵力薄弱。根据全国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为了打乱国民党的战略部署，粉碎其重点进攻，决定刘邓大军务于1947年7月以前实施中央突破，即在临濮集至张秋镇300里长的河面上南渡黄河，在鲁西南大量歼灭敌人，配合山东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尔后向敌纵深腹地大别山挺进。大军能否渡河，是完成这项重大战略决策的关键。一旦渡河胜利，将形成全国战局大举反攻的开始，即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刘邓首长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巧施计谋，一方面，把12.4万大军集中在身边，而让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起攻势，同时命令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攻势，以转移国民党军队的视线。另一方面，夜以继日地筹备渡河工作。

（二）、台前属老解放区，大军在此渡河有牢固的群众基础。

台前境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台前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革命思想觉悟高。1944年12月，台前全境解放后，寿张和张秋两县县委组织领导人民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诉苦运动和以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倒粮回地，斗争地主

分浮财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解放区的经济有了大的发展，具备了解决军需的条件。翻身农民在“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家乡”和“保田、保家、保命”的口号激励下，掀起了参军热潮，涌现了集体参军，妻送郎，父送子，兄弟相争上战场的典型。1945年8月至10月，寿张县青年近3000人参军入伍。1947年春，寿张县有3000人、张秋县有2000人参加晋冀鲁豫野战军。同时，县、区都成立了战勤指挥部、河防指挥部，县长任指挥长，县委书记任政委，民兵担负把守河防的战斗任务。村村呈现出一手分田、一手拿枪的革命景象。当得知刘邓大军要进行大反攻、强渡黄河时，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群情振奋，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为避免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对岸国民党军队及还乡团分子破坏船只，黄河阿防指挥部和寿张县委组织沿黄群众，将各个渡口的船只集中到北岸隐藏。黄河河防指挥部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在台前境内先后兴建起十里井、林楼、张堂、孙口、毛河（后移至陈楼）五处造船厂，调集全县沿黄村庄的木工制造大船。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完成了建造120只大船的任务。台前人民积极配合“黄司”组建水兵武装，沿黄8里以内的村庄群众直接归“黄司”调遣。寿张、张秋两县建立县河防团，河防团6000余名民兵日夜固守在长达50公里的河防线上，实行军民联防，形成了攻不破的百里防线。

此外，寿张县全民动员，大打支前准备工作的“总体战”。1946年5月~1947年6月，根据冀鲁豫行署指示，县委先后组织5万人复堤，打破了国民党政府水淹解放区的企图。同时，台前人民在寿张、

张秋两县党的领导下，积极为驻军腾房，安排后方机关、做鞋、磨面、运送物料粮柴、迎送部队，还组织担架团、轮战团（河防民兵）、儿童团、姊妹团等，男女老少，不分彼此，全力投入到支前工作中。与此同时，寿张、张秋县委领导开展的县、区、村三级政权建设、联防反特保边区活动等，都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行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鲁西南人民可接应和配合部队作战

1946年底至1947年春，刘邓大军先后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金鱼、鄆城等战役，歼灭了大批敌军，然后转到黄河以北休整。与台前一河相隔的鲁西南地区刚刚沦陷为国民党统治区，敌人立脚未稳，地方反动势力也是刚刚露头。为教育群众，树立胜利的信心，鲁西南各县、区党政干部根据上级“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指示，带领广大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浴血奋战。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到处受到中共地方武装力量的阻击或骚扰，有的小股国民党军队被县、区武装民兵歼灭，这里的人民可以接应部队过河，还可配合部队作战。

（四）、孙口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孙口位于今台前县城东南，此处黄河是由豫北平原进入山东丘陵地区的过渡带，河床较窄，河势稳定，易于渡河，为黄河中下游的水路要冲，是联接鲁西南和鲁西北的交通枢纽。其次，从军事上讲，孙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民国时期，寿张、阳谷、东平三县地主武装民团驻防于此。日军占领寿张后，伪县公署亦派兵扼守。刘邓大军渡河前夕，孙口北靠冀鲁豫解放区，东不足50

余里紧连泰山余脉丘陵地带，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这里既是国民党部队北渡黄河进攻解放区的咽喉，又是刘邓大军实施战略反攻、南渡黄河、经略中原的战略重地。

（五）、冀鲁豫军区河防指挥部设在孙口，战勤准备工作充分。

1946年底，冀鲁豫军区为了大军渡河作战的需要，在孙口附近长刘村建立黄河河防指挥部。指挥部所辖四大队和独立营驻寿张，五大队驻张秋；共训练水兵2300余人，筹集和修造200余只大小木船。

1947年6月5日，刘邓首长颁布“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后，各县水兵、民兵和民工冒着敌机不断轰炸的危险，昼夜进行训练，并加强河防安全，并挖了大批船坞，白天将船只隐蔽在船坞里，晚上驶入河内进行训练。6月22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发布“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的基本命令”，水兵大队昼夜进行试渡练兵。因河水上涨，河滩泥沙松软，加上多人踩踏会变成漏人的泥浆，影响部队前进，水兵和民工们迅速筹集木板、门板进行铺垫，造就了坚实的河滩大路。

二、支援刘邓大军渡河作战

6月23日，刘邓大军主力12·4万人，由安阳西北蒋村出发，6月30日进驻黄河北岸各渡口附近隐蔽，野战军司令部设在孙口西北3公里远的白腊仝村孟家胡同。在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前三天，“黄司”根据军区指示，研究水兵支援刘邓大军渡河意见：第一、开船时间定在天黑，以望不见对岸为准，以防敌人发觉。第二、第一批船用5至10只小船，一船能乘一个班，最多乘一个排，小船行船要快。第三、

首先选调比较精干、而且冲船经验丰富的水兵参加。第四、渡口离船坞要近,出船要快,船到对岸要靠船容易,部队可以立即登岸。

6月30日上午,刘邓首长来到寿张县,不顾征途疲劳,不怕敌机轰炸,风尘仆仆奔赴渡口视察。“黄司”政委郭英向刘邓首长详细汇报了渡河准备工作,并向刘邓首长提出大军渡河意见:1、白天敌人封锁河面,我军不宜渡河,所以白天要隐蔽好,不能暴露目标;2、每天晚上9点开渡,要求部队按时到达指定的渡口,不得迟误;3、上船时,部队官兵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听从水手船工的指挥。刘邓首长欣然同意了她的意见,制定了渡河方案。刘伯承委任郭英为军法特派员。接着,他们观看了船坞,和水兵们亲切谈话,鼓励水兵下决心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的渡河任务。刘伯承司令员高兴地说:“你们有智慧,谢谢大家”。

傍晚,黄河北岸渡口,一纵队在东线张堂、林楼,二纵队在中心地带孙口,六纵队在西线李桥,三纵队为预备队(在孙口渡口过河),在300华里沿黄各个渡口渡河部队悄悄地走向战壕,不远处,一门门大炮在夜幕的掩护下,从高高的青纱帐里抬起头指向南岸的敌军阵地。河水在奔腾咆哮,激流猛烈地冲击坝头。孙口渡口的水兵们磨拳擦掌,跳上在芦苇丛中隐蔽的战船,准备出坞。当对岸已看不清时,指挥所向大队下达命令:“开始起锚”,各大队预先确定的先锋船、突击船、尖兵船等一批快艇首先起锚靠近码头,并铺上湿被,防止敌人把船打燃。突击部队准时到达指定的各渡口,自觉听从水手指挥,无声无息地登上在岸边波涛中摇动的战船,并把轻重机枪等火力架在船头

或船两边,作好射击准备,沉着地等待着渡河命令的下达。

晚9点左右,第一批战船满载突击队员先后离开码头,摆开阵势准备向对岸出击。

夜12时整,刘邓首长下达渡河命令,严阵以待的水手们跳向战船,精神抖擞,竞相行驶。这些船工都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的在船上表示:“如果我牺牲了,把东西捎到家里”,有的党员把身上仅有的钱拿出来缴了党费,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孙口渡口的先遣战士乘坐的12只小船象离弦的箭,急速地向南岸冲去,不到一刻钟将先遣部队某部四连送到对岸,战士们登岸后立即控制了国民党防御阵地的火力,继而攻破严密布防的地堡群,为大军南进打开了通路。其它渡口的水兵们有的经过十几分钟、几十分钟与黄水激烈搏斗,快艇冲过急流大浪的危险地带,快要接近滩头阵地时,才发现对岸的国民党官兵早已闻风而逃;有的渡口对岸的国民党官兵观察到解放军一船船突击队,恐慌万分,一枪未发即抱头鼠窜。张堂、林楼对岸国民党官兵,发现船上有突击队摆开阵势,大声叫喊:“来了,来了,快打”。随即,一排排子弹向快船袭去,船工冒着飞机轰炸和对岸敌人炮火的阻击,驾船强渡,有的负伤后不顾生命危险,包扎伤口后继续快速划浆。各快船上的突击队猛烈地予以还击,水兵加快速度驾船往前冲。此刻,北岸掩护部队的大炮,瞄准对岸国民党军队的滩头阵地轰击。快船将要靠岸时,突击队没等船靠岸,即下船淌水,直冲国民党军队的防御阵地,国民党士兵抱头鼠窜。随后,台前境内各渡口大小船只,开展革命竞赛,比划船速度,比摆渡次数。摆渡一趟有的

需要 15 分钟,有的需要 10 分钟, 孙口水手最快者仅 5 分钟即可到达对岸。有的船一夜摆渡 15 趟、18 趟,最多者达 20 趟。

刘邓大军强渡第一夜晚就全线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御阵地。由于敌机每日三、五架次对黄河严加封锁, 白天就把船隐蔽起来,水兵充分休息,天刚黑就开始运渡大军过河,彻夜不停。经过连续两、三夜的抢渡,主力部队大部过河,顺利地完成了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天险的任务。这一壮举,突破了蒋介石吹嘘的能抵 40 万大军的“黄河天险”,从而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伟大序幕。

在大军渡河第二天,刘邓首长在白蜡仝村孟家胡同召开纵队首长会议,下达了实施鲁西南战役的动员令。

7 月 4 日夜,刘邓首长携野战军机关人员来到孙口渡口,“黄司”司令员曾宪辉、政委郭英护送到河边。此时,“星垂旷野,月涌中流”,在夜色苍茫中,水兵队长程文立、程广礼等从芦苇丛深处驶出“爱国号”平头木船,刘邓首长敏捷地跳上船,意气风发,并肩站在船头,船向黄河南岸急驶而去。

夜,平静的出奇。船渡至河中心,突然,国民党的两架侦察机沿黄河由东向西飞来, 一路撒下许多照明弹。警卫员顿时紧张起来,纷纷举枪向空中瞄准。“小鬼不要怕,这是侦察机”。经验丰富的刘伯承一面说着,一面若无其事地望着天空。站在船头解开外衣的邓小平政委谈笑风生地对刘伯承司令员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特给点亮了天灯,敌人墨守成规,一侦察,一报告,等它叫来轰炸机群,我们全军渡河完毕。”谈笑间,船到达南岸。

刘邓首长在下船前,几乎同时把手伸向水兵队长程文立、程广礼,异口同声地说:“崐你们辛苦了,是你们为人民立了大功!”7月17日,刘邓首长亲自签发了嘉奖令,嘉奖黄河各渡口的船工。嘉奖令称:“由于你们不顾敌军的炮火和蒋机的骚扰,不顾日夜的疲劳,积极协助我军渡过了大反攻的第一个大阻碍,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渡河任务,使我们非常顺利地到达黄河南岸,以歼灭蒋伪军,收复失地,解救同胞,这是你们为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你们这种无比的积极性和热情,全体指战员莫不敬佩和感激。我们到达南岸后,先后收复了鄄城、巨野、曹县、郓城等地,消灭了蒋军曹福林部两个旅,这些胜利是和你们分不开的。为了慰问你们的辛劳,特犒劳你们每人猪肉一斤,并祝你们继续努力和健康!”后来刘伯承、陈毅在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时,在大会上发言说:“孙口、李桥等黄河渡口的指战员和水兵同志们为革命立下了战功,要告诉全国总工会为他们请功。”台前水兵刘正祥被冀鲁豫军区命名为“特等功臣”,并颁发了银质奖章,孙口渡口的水手王金亮、王金宝、王金成等人皆受奖。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立即发起鲁西南战役,经过28天连续作战,歼敌5.6万人,战斗在鲁西南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群众欢天喜地的迎接子弟兵的归来,一时传诵着这样的民谣:“刘伯承得天助,黄河六月结了冰,千军万马一夜渡,大战鲁西南,斩断陇海路。”刘邓首长按既定方针,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兵分三路,以排山倒海之势,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壮举。

孙口渡口,作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中心渡口,在中国革命史上

抹下了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以孙口为中心渡口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把战火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变为现实的第一步，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揭幕战，它不仅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迫使国民党从西北、山东和中原等地抽调7个整编师17个半旅前来围追，而且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对人民解放战争的整个战局都具有重大影响。这一壮举，从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攻防形势，使中国共产党从此摆脱自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来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而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历史已雄辩地证明，刘邓大军以孙口为中心强渡黄河无愧为这一伟大事变的起点，并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

第二节 支援鲁西南战役和华东野战军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立即发起鲁西南战役。为了支援主力部队作战，寿张县、区动员组织大批担架队和民兵，由县区党政负责人带领，随军作战。全县各区先后出动支前民工12000余人、担架1200余副、大车200辆、牲畜400头。县长张云峰为支前指挥长，亲自率领全县民工随大军南征。支前担架队员经常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

置身于鲁西南战场。有时，抢救伤员的担架队遇上敌机俯冲扫射，队员们不顾个人安危，用身体掩护伤员，有的队员被飞机炸伤，还有的不幸光荣牺牲。有时，支前运输队遇上阴雨连绵天气，地上水深过膝，大车不能通行，为把军需物资及时运往前线，队员们便肩挑背扛，每人负重四五十斤随部队行军。为避敌机轰炸，多在夜间行进。为防小股敌人伏击，有时不走大路，横涉荒野。在支前民工中，有短期支前队，往返于前线 and 解放区之间；有长期支前队，即随军支前队，一直跟着部队转战，历尽艰难，全力保障前线供应。台前支前民工在解放战争中，历经鹅鸭场、万福河、郟城、曹县、定陶、羊山集、商丘、安徽、十八里集等战斗及后来的陇海战役等，足迹遍及苏、鲁、豫、皖4省50个县，行程近万里。

在支援前线的同时，台前境内刘桥、白岭、桥北张、刘奎斋等村皆设有兵站、食宿站，专门接待病伤员和往返担架队。妇委会组织妇女到兵站喂养伤员。仅刘桥兵站护理和转送的伤员就达1200余名。

1947年8、9月间，为箝制国民党新五军，配合刘邓、陈谢兵团逐鹿中原，华东野战军在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率领下，进驻台前，从境内孙口、林楼、十里井等处，由“黄司”和台前人民群众用木船护送渡过黄河，转入外线作战。当时，沿黄集结大小船300余只，昼夜摆渡，共护送华野过河部队30余万人。后随着中原战局的发展，华东野战军一部需作战略转移，台前人民冒着敌机轰炸，又全力接运华东野战军北渡黄河休整。

1948年8月，为支援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寿张县出动大批民工

和大车，运送军粮及其他军用物资。在支前途中，仅被国民党部队截击和空袭毁坏的大车就达 100 余辆。

1948 年 10 月，全县出动大车 300 辆、民工（包括挑夫，车夫，担架队等）5000 余人，随华东野战军运送粮食、弹药和抢救伤员，转战于鲁豫苏皖广大地区达两月余。其中，一区曹杨韩村挑夫杨仲先等 30 人，每人挑炮弹 30 公斤，日行百里，肩膀磨烂，脚起重泡，全然不顾，紧跟炮兵行进；运送给养的民工，经常冒着敌机空袭，不顾生命安危，随部队奔波，部队走到哪里，粮食运到哪里，保证了子弟兵的军需供应。

第三节 开展土改复查运动

1947 年 6 月 28 日，针对前段土改中存在的对地主富农照顾过多，使其大部分浮财未动的情况，县委决定组织工作队，全面进行以清查地主阶级隐藏的浮财、土地和解决落后村的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土改复查运动。土改复查的主要方法是：首先，以县为单位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学习上级有关复查运动的指示，深入开展“三查”（查思想、查立场、查土改是否彻底），使领导干部认识到目前地主阶级并没有投降，他们仍想复辟，所以必须为群众撑腰，打好复查这一仗；其次，以区为单位分别召开积极分子、党员、干部、妇女等各界大会，宣讲上级精神，批判地富立场，深入发动群众，号召土改中涌现的模范人物再立新功；第三，各地建立复查委员会、复查团、复查大队等称谓

不同的领导复查的组织，明确复查委员的任务，即彻底复查地主，查果实是否分得合理，算算地主的收入帐，查清其浮财；照顾中农，使其与贫农同心同力，警惕地主的瓦解诱惑。在复查组织的领导下，各村普遍召开农民大会，运用诉苦追根、献思想、挖“防空洞”，控诉和揭发不法地主阻碍和破坏土地改革的罪行，激发群众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在发动落后村时，采取自报结合控诉地主的罪行，贺功结合团结群众，很快将群众发动起来。全县各区或村普遍召开斗争复查大会，对地主富农严厉打击，有的被关押，有的被赶出家门，有的潜逃。在运动中，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姊妹团、民兵（模范班）异常活跃，特别是妇女得到相当充分的发动，各村都成立了妇女模范班，扣地主，押女犯，查浮财等。9月初，运动基本结束。9月9日和14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两次报道阳谷、寿张等县的土改复查运动经验。冀鲁豫二地委在第十四号《运西通报》中也刊登了寿张县复查工作经验。在土改复查运动中，全县共查处地主转移、隐藏财物的地点达8000多个，追回了地主转移隐藏的大量财物，群众把这种斗争叫做摧毁地主的“防空洞”。地主在经济上被彻底搞垮，在政治上被完全孤立。

土改复查运动的开展，提高了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他们的斗争精神，壮大了以贫农为骨干的群众队伍，树立了贫农在农村的优势地位。而且把广大妇女从狭小的家庭中解放出来，解决了一些前段运动中存在的不彻底问题。通过分配果实使百分之九十的农民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利益，广大群众欢欣鼓舞，所分到的土地、房屋、财产等在土地法大纲上得到确认，对地富的反攻倒算给予了有力地打击，

对于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分化富农等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有些地方在运动中发生了“左”的偏向,主要表现在:一是过分依靠贫农的自发斗争,盲目强调大胆发动群众,提出所谓“不怕报复”、“不泼冷水”、“贫农团高于一切”、“中不中,问贫农”的口号,甚至规定了党支部也必须服从贫农小组的意见,削弱了党对土改复查运动的领导,单纯强调放手撑腰,鼓励了少数积极分子的冒险,并给坏分子借刀杀人以可乘之机。二是缺乏明确的复查标准,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错划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份。在复查中,对先进村、一般村、落后村缺乏明确的标准要求,而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把是否“轰轰烈烈”、“批斗和分配果实多少”作为运动是否深入的标准,有的甚至提出“羊群里找驴”等口号,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中农受到错误批斗。在划分阶级中,缺乏正确引导,把政治态度作为划分阶级的重要因素,偏离了划分阶级标准,将被批斗的中农划为地主富农。三是违犯了给地主留生活出路和只动富农剥削部分的政策。有的没收了留给地主的土地,将其“扫地出门”;有的在调剂浮财时,将地主关押,甚至出现乱打乱杀的现象;有的给地主少留地、留坏地。四是破坏了部分工商业。在土改复查中出现上述“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一是过于依靠群众的自发斗争。农民是劳动者,又是小生产者,有着自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如果掌握不好,就容易侵犯中农利益和打击工商业者,把中农占有的平均水平以上的土地,看成是土改不彻底的表现。二是土改复查处于残酷斗争的环境中。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冀鲁豫解放区,以黄河为界南与北成为国共双方拉锯的主战场。在这种环境下,黄河以北

的汉奸、国民党残余势力又在暗中散而复聚,他们和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及逃亡的恶霸地主相勾结,在解放区进行疯狂破坏活动。三是一些领导干部和大多数农村干部缺乏大规模进行土改工作的经验,对土地改革的性质、任务、目的缺乏完整的理解,对农村的土地状况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对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性估计过重。

为了纠正在土改复查运动中出现的上述问题,从1948年7月开始至年底,,县委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落实补偿中农、安置地主和富农的政策,在全县470个村中,重新划定成份110人,确定地权50户。各区重点村开始为前段土改中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重新分配房子、宅基、场院。同时,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凡是在土改工作中错将工商业者作为地主的财物而没收了的,原则上都要退还或进行适当赔偿。

1949年5月,为了确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合理确定土地赋税和各种负担,以解除农民的顾虑,县政府开始发放土地证书。各区、村建立专门领导机构,通过对各户的人口、土地、房屋、宅基统计登记,然后张榜公布,由群众通过后,经发放土地证委员会批准,正式填写土地证,交户保存。同时,宣布旧契约一律作废。从此,全县境内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完成了由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转变。

第四节 开展整党运动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1946年春,为了充实和加强县、区政权,县委在县城西马庙村举办农村干部训练班。各区村长、农会长、自卫队长等参加。主要对基层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整顿工作作风,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在此基础上,选拔一批干部到区、县政府部门工作。同时,将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农会和民兵组织中来,促进了基层政权的建设。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寿张县委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反奸反霸、发展地方武装和恢复生产的同时,从多方面加强党的建设。通过形势和阶级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通过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冀鲁豫区党委的决定、指示,增强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积极发展新党员,发展对象主要是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雇、佃、贫农中的积极分子。1947年在地委党校的帮助下,寿张县委在张庄举办多期党员训练班。通过上述工作,党的组织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党员的思想素质得到提高,一大批优秀的雇、佃、贫农中的先进分子被吸收加入了共产党,为以后以支前为中心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1947年,全县各级党组织在土地改革和参军支前等运动中,继续积极培养先进分子入党,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年底,全县有党支部369个,其中机关支部12个,学校支部5个,街道支部4个,农村支部348个;党员5947人,其中妇女党员1717人。经过长期而严峻的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从总体上看,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状况是好的,

但在激烈的自卫战争和史无前例的土改运动中,也暴露出有些党的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成份不纯等问题。比如,有些党员弄不清划分阶级成份的正确标准,而将中农划为富农,将富农划为地主;有的党员在土改中包庇、袒护地主、富农分子;有的党员利用职权多占土改果实;有的严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脱离群众;个别地主、富农分子混入党内,甚至把持了基层党政领导权,歪曲党的政策,损公济私,欺压群众。

1948年1月15日~3月19日,针对党的队伍存在的不纯洁现象,冀鲁豫九地委根据区党委的部署,集中所属县、区党员干部在阳谷县坡里进行第一期整党。寿张县委书记杨村夫、县长何进带领109名县区干部和作为顾问的10余名贫雇农参加。这次整党的主要方法和内容是:结合土地改革运动,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具体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召开动员大会,宣布整党的方针、内容和方法,端正态度,提高对整党的认识。在学习文件、联系实际、提高对整党认识的基础上,摆材料、翻思想、翻作风,由典型分析、重点分析,进入个人分析,进行反省检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写出书面反省材料。第二阶段是学习讨论党的土地政策和划分阶级的政策规定,结合自己的工作,检查前段土改复查中的问题。第三阶段是对每个党员干部进行鉴定,自报公议,填表过关,并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组织处理。这次整党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出现了思想批判过火,组织处理面过宽、过重的偏向,“左”的错误是明显的。寿张县参加整党学习的

109 名干部中受到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销职务及其他处分的达 58 人,其中陈永嘉自杀,县委书记杨树夫被列为主要斗争对象,遭到残酷斗争。

4 月 3 日~6 月 9 日,冀鲁豫九地委在寿张金斗营一带农村进行第二期整党。寿张县普通党员干部和区级以上未参加第一期整党的党员领导干部共计 161 人参加。这期整党的方针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发动群众的主要环节是反对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动摇性、温情主义等。其方法和第一期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根据中央要求各地纠正土改整党工作中“左”的偏向,决定对在第一期整党中受处分的人重新进行复议,绝大部分予以平反。第二期整党防“左”措施比较具体,在开展批评中,大家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在组织处理中,属贫雇农出身,在土改中犯有错误的人,只要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提高了认识,就从轻或免于处分。第二期整党处分面较小,与会人员严肃活泼,情绪比较高涨。是年 7 月,全县未参加一、二期整党的区级干部及一般干部参加了九地委在马庙进行的第三期整党,这次整党的方法是以正面教育、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为主,除学习第一、二期整党的文件外,还学习了反“左”纠“偏”、安定团结、开展生产等方面的文件,在学习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进行小结和鉴定。

1948 年 9 月,县委举办农村党员干部训练班,历时 21 天,210 人参加。学习内容有:党的基本知识、划分阶级成份、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等。通过培训学习,纯洁了农村党组织,改进了农村党员的作风。10 月~12 月,县委及所属各级党组织,按照上级精神,认真开展反对无纪

律无政府状态及加强制度建设的工作，党政军及群众团体中的无纪律、无政府现象基本上得到克服，各级党员干部对事务主义、经验主义的表现及危害有了较深的认识，各种规章制度逐步建立健全起来，为卓有成效地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运动和参军支前提供了组织保证。

1948年冬，县委在进行结束土地改革工作的同时，开展村级民主整党和政权建设工作。民主整党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三查三整”。整党开始前，县委进行训练农村党员干部，训练内容有党的政权建设、土地政策、划分阶级政策、形势与任务等。同时进行农村党员状况调查分析等准备工作。训练党员干部的内容是：党的政权建设、土地政策、划分阶级政策、形势与任务等。整党开始后，首先召开各村群众大会或群众代表大会，宣传整党的意义和方法，公布党员名单，欢迎群众对党的政策和党员干部提出意见，并推派代表准备出席支部大会。其次，根据不同类型，采取不同方法进行整党。即好的或比较好的支部依靠自身整党；党内不团结，闹宗派甚至地富操纵的支部，发现培养积极分子使其成为骨干后，再逐步进行整党。在整党时，通过召开有群众代表参加的支委会、支部大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批评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侧重于由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公开检讨错误。接着拟定和宣布对犯错误党员的处理意见，并征求群众的意见，由区委作出组织结论。最后筹建新的支委会，发展新党员。至1949年2月，全县完成整党工作。

在基层政权建设上，一方面，全县各村进行选民登记，成立农代小组选举人民代表，召开行政村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行政村委

员会。在完成村级政权建设基础上,建立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政府委员会。另一方面,坚决清除混在基层政权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破坏分子。同时,整顿发展农会、民兵、青年团(1949年底,全县共建团支部12个,有团员39人)、妇联(1949年春,寿张县妇女救国会改为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至此,全县乡村基层政权和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农村政权真正掌握在了雇、佃、贫农手里。

整党运动,是寿张县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整个运动而言,成绩是很大的。主要是对干部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阶级教育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帮助党员干部树立了明确的阶级观点,掌握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划清了农民与地主富农的阶级界限,坚定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的思想,解决了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增强了党性观念和方针政策观念,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党的威信和战斗力,为更好地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作用、桥梁作用、骨干作用打下了基础。它为土地改革的彻底完成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在这次运动初期,曾出现了“贫雇农顾问团有无上的权力”的“左”的口号和对党员的组织处分过重、处理面过宽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某些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存有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及宁“左”勿右的倾向,以及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等情况估计过于严重。随后,各级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及时对受处分的党员按照弄清是非、分清责任、区别对待的原

则，本着治病救人和教育为主的精神，进行了复议。通过复议，受处分的比例大为下降，从而使受处分的同志再次受到了教育，调动了其工作的积极性。

1949年3月5日~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村召开。会议提出了迅速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提出了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分析了全国胜利后的社会基本矛盾和党所应采取的基本政策，提出了保持党的优良作风问题。这次会议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寿张县委于是年4月，召开县区干部会议，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要求全县党员干部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认真检查和批判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如：有的以为全国即将解放，革命即将彻底胜利，也有自己一份功劳；有的认为打了多年的仗，从枪林弹雨中过来了，不容易，革命胜利了，可该很好地歇歇了；有的认为全国解放了，天下太平了，应该享受幸福生活了；有的认为建了国、进了城，就不能再像“土八路”了，应该跟上形势，吃、穿、戴都得讲究点；还有的甚至错误地认为革命的胜利是农民的功劳，国家不应该再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等。会后，各级党组织根据县委的安排和要求，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使全县党员干部加深了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增强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第五节 支援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集团为避免徐州的国民党军队重蹈卫立煌集团全军被歼的覆辙,决定将刘峙、杜聿明所部4个兵团3个绥靖区的军队,以及从蚌埠、华中地区增援的3个兵团共80余万人向徐州附近收缩,采取攻势防御,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以屏障长江,保卫南京。

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和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地区的部署,决定从1948年11月6日起,以徐州为中心,发动具有决定意义的淮海战役。时值冬季,冰天雪地,人民解放军的60余万部队分布在纵横数百里的战场上,由于战场在蒋管区和新解放的地区,要保证解放军参战部队有充足的弹药、粮食、烧柴、伤病人员能及时得到救护,并转移到后方治疗等,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繁重的战勤保障任务。战役期间,寿张县广大人民全力以赴投入到繁重的支前工作中。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召开了由区长、财政、战勤干部和武装部长参加的会议,研究完成战勤任务的措施和方法,并普遍进一步加强和充实战勤组织,县、区层层建立健全了由主要负责干部挂帅的支前指挥部。县长张云峰为支前指挥长,负责动员组织全县运粮队、担架队和民兵,分批支援前线。在后方广泛动员组织劳力包括妇女、儿童,日夜碾米、磨面、做军鞋军袜和慰问袋,全力以赴支援前线。淮海战役打响后,全县民工和担架队、运输队迅速奔赴前线。支前途中,地面积雪半尺多深,道路泥泞难行,加之国民党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支前任务异常艰巨,广大支前民工不畏困难,不顾生命危险,日夜兼程,没有一人退缩

不前。担架队员们在前沿阵地随时听用，在运送伤员途中，他们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伤员，给伤员喂水喂饭，遇国民党飞机轰炸时，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昼夜不息地将伤员运到后方医院。

冀鲁豫区党委于12月14日下达“关于运粮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九地委完成筹集和运输800万斤小米的任务。台前人民在寿张县委的领导下，在碾米工具缺乏、牲畜少的情况下，男女老少齐动员，轮流推碾，昼夜不停，按时完成了任务。

在筹集军粮的基础上，寿张县组织运输民工，在“保证前线吃饱、穿暖”的口号下，冒着国民党飞机轰炸和炮火威胁，用车辆、船只将大批粮食运往淮海前线。运粮队车辆多、目标大，为避免国民党飞机扫射，多是昼宿夜行，车子加上伪装。随着战役的发展，粮食越送越远，运输线长达数百里。淮海战役期间，正值阴雨连绵，天寒地冻，途中道路泥泞，车马、民工规模空前，处处人欢马叫，入夜后灯笼火把，成串成行。前方炮声隆隆震天响，后方车轮滚滚支前忙，形成了人民战争的广大战场，广大民工圆满完成了运输任务。与此同时，广大妇女在家为解放军不分昼夜赶做军鞋。有的刚出嫁媳妇把给婆家做的鞋拿出来支援队伍，有的刚结婚的小伙子把媳妇给做的“新夫鞋”献出来。妇女们高兴地编出了支前歌谣：“眼熬红，手磨烂，赶做军鞋送前线；里也新，表也新，献给亲人解放军；献鞋如同献了心，彻底消灭蒋家军。”

此外，台前人民在护河、修路等后方勤务方面也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整个战役中，每村、每户、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以不同的

形式参加了支前工作，充分显示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台前翻身农民的高度政治觉悟。在冀鲁豫军区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寿张县还积极动员组织基干民兵参战。

台前和鲁西北广大人民一起，为夺取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第六节 组织干部南下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解放区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开辟新区工作。根据上级指示，从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至1948年秋冬，寿张县先后有两批干部南下开辟和加强新区建设。

1947年8月下旬，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8万余人，由山西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并开辟了江汉、桐柏两大解放区。根据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晋冀鲁豫组成南下干部支队。寿张县长兼战勤指挥长张云峰带本县一批干部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主要任务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开展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征粮征款、支援前线、建立政权、扩大革命武装等工作。在开展新区的工作中，他们克服了情况复杂、斗争激烈、人地两生、生活不习惯等难以形容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有不少干部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7年秋，根据上级指示，寿张县又动员40余名干部参加冀鲁豫

区党委组织的第二次南下支队,1948年初随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一纵队南下,2月到达豫皖苏边区后,就地分配了工作。

在解放战争进入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任务。同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定从华北等老解放区抽调现职干部随军前进,到新解放的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开辟工作。1949年1月8日,冀鲁豫区党委就南调干部问题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九地委从现职干部中抽调一个地委机关架子、4个县架子,28个区架子,共437人。

寿张县委为了完成这次抽调干部南下工作任务,层层组织发动,加强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和组织管理工作。同时,对拟调干部进行了调查分析,确定哪些干部可以外调,哪些干部不能外调,哪些干部应在原地坚持工作,对被调干部的家庭生活问题、生产代耕问题等都有明确的安排,解除了被调干部的思想顾虑。经过政治动员与组织准备之后,在干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召开会议,公开动员,以自愿报名南下和服从组织调动相结合方式,确定人选,严禁强迫命令、欺骗等办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将抽调干部南下的任务落实到了人。

寿张县批准了以县委副书记、县长何进,组织部长陈伯文率领的王子典、钱继尧、赵大中、郭志淑(女)、周淑贞(女)、罗布等第三批72名南下干部。这些被抽调的干部大多是中共党员,骨干多,能

力强,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经受了战争的锻炼与考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丰富的武装斗争、群众工作经验。1949年3月1日,南下干部到达菏泽城南晁八寨一带参加时事政策学习和行军训练,使全体南下干部对国内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有了比较正确的全面了解,,阶级觉悟、政策观念、大局观念普遍提高,进一步坚定了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工作的决心。

冀鲁豫区南下干部支队被编入军队序列,对外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以下简称南下支队),支队下设中队,寿张县中队长王之典,何进任政委。

3月26日,冀鲁豫区党委在晁八寨举行热烈欢送全体南下干部大会。3月31日,南下支队从菏泽晁八寨一带随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徒步南下。4月23日深夜渡过长江天险。经过20多天紧张的行军,按时到达了目的地—江西。其中一批南下干部开始了对所辖各县市新解放区的接管工作。此次南下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各级政权,收缴散兵游勇和各级国民党政权的枪支弹药,征借公粮支援大军过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创办军政干部学校,以便扩大干部队伍,还要与明的、暗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工作接管不久,不少县的土匪就开始了活动,有的南下干部在与土匪战斗中牺牲了。尽管工作环境十分恶劣、残酷,但南下干部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县、区、乡三级人民政权。

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中南、华东广大地区。党中央为彻底消灭华南和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及时作出了具体的指示和部署,命令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继续向西南进军。1949年9月11日,南

下支队除留江西的一部分外，其余的集中在江西上饶，经过十多天的整训，又开始向西南进军，到贵州后很快建立起从地到县、区的各级领导班子。

第七节 抢建黄河浮桥，迎送四野南征

1949年元旦，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动员全国人民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动员令。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是年3月14日，“黄司”司令员曾宪辉、政委郭英向寿张县县长谢惠玉传达了冀鲁豫军区、冀鲁豫行署的通知，要求寿张县协同“黄司”务必于4月20前在孙口渡口处架起一座浮桥，保证第四野战军顺利渡过黄河，挥师下江南。具体任务是：帮助筹集物料——船只、木板、绳索、铁丝、秫秸等，协同“黄司”架桥；大部队到来后，确保部队的茶水、食宿、战马草料等供应。

接到指示后，寿张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财粮科室人员、战勤指挥部人员、各兵站站长等。谢惠玉首先传达了冀鲁豫军区、冀鲁豫行署的指示，接着布置了任务，明确了要求，然后进行分工。

参加会议的一部分人负责筹集安排搭桥物料，另一部分人负责筹集安排过河部队的食宿。分工完毕，当晚谢惠玉等人就分头深入到基层，向群众讲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历史，分析解放军渡黄河下江南的形势，使群众看到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斗多年的愿望——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彻底翻身得解放即将实现；向群众讲明任务与

要求,使群众感到肩负着历史的重托,义不容辞。经过充分而广泛的宣传发动,很多群众主动送来一些架桥物料,有的甚至连名也不留。在发动筹集物料的当天晚上,80万斤秫秸全部凑齐,并送到县里3个兵站。计划5天完成的40万斤小米筹集任务,第二天(3月15日)一大早便筹集到一起。3月14日夜晩,整个县境内夜会一般,灯笼火把一片通明,全县上下人声鼎沸,人民支前情绪更加高昂。有的拆下自己的门板,有的拆掉自己的檩条,有的锯掉自己院中的树木,有的揭下自己的炕席……沿黄河几个区的群众也很快把各自村中船只集中到一起。计划10天筹集好搭桥的物料,结果5天就完成了。接着,几个兵站和各区把筹集的物料,或牛车拉,或小车推,或人抬,或肩扛,人车往返,络绎不绝,很快运送到黄河司令部的料场上。与此同时,集聚的船只或顺流而下,或逆水而上,轴轳相继,浩浩荡荡,云集孙口。仅载重1万斤以上的大船就有200余只。

搭桥物料集结齐备后。县里组织几百名水性好、有技术、觉悟高的民工专门负责运送,由“黄司”统一指挥,安排调遣。

驻寿张的航运大队和驻东阿的航运五大队的广大水手在孙口渡口附近,在群众的协助下,紧张地开始了搭建浮桥。

时令虽然已是仲春,但黄河岸边仍很寒冷。河中流淌着从上游融化的雪水冰冷彻骨。尤其是夜晚,北风顺着空旷的河床吹来,河岸上的人们尽管穿着棉袄,仍感到寒气逼人。为了确保工期,确保浮桥的质量,水手和民工不畏严寒,跳入冷冰冰的水中打桩、系绳,时间稍长便冻得手脚麻木,疼痛难忍。水中的人们不得不爬上河岸,喝几口老烧酒,

暖暖身子，活动活动筋骨，随即又跳进滚滚河水中。“哼啊，海呀，咱们搭桥啊，支援解放军呀……”他们喊着高昂的自编的劳动号子大干起来。

经过十几个昼夜奋战，终于把 180 余只大船连结一起，横跨河面，船与船之间竖压门板檀条，然后用扒钉扒牢，用揽绳、铁丝捆紧，每船下抛锚稳定，浑然成为一体。最后，上面用秫秸铺平，加上泥土，犹如一条平坦的大道，从黄河北岸直伸到南岸。浮桥全长 200 米、宽 20 米，两端还用柏枝、芦苇扎起了两座大牌坊，牌坊上贴了许多五颜六色的迎送大军南下的标语，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画像挂在横额坊的正中间。

1949 年 4 月 26 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一个军沿着聊（城）荷（泽）公路开来。他们一踏入寿张县境，便受到寿张人民的热烈欢迎。北起四棚、南到孙口沿途 30 余华里的公路两旁，站满欢送部队的人群，并设置了一个挨一个的茶水站，有的老百姓从数十里之外赶来，将煮熟的鸡蛋和新作的干粮递向解放军战士……他们说：“哪怕是解放军能喝上俺烧的一口水，也算尽了俺一份儿心；哪怕解放军能吃上俺亲手蒸的一口馍，也算尽了俺一片情。”

当解放军踏上桥头，鞭炮齐鸣，鼓声震天，桥头两端的空地上更是热闹非凡，秧歌队扭呀扭，高跷队踩呀踩，锣鼓点打呀敲，浮桥南、北、中 3 台大戏同时开演，浮桥走道两侧的船头上，民间艺人在演唱大鼓书、快板书，部队文艺宣传队抑制不住激动之情同群众一起联欢，

军乐迭奏,此起彼伏,声闻数里。整个浮桥上空响彻着锣鼓声、弦乐声、快板声、儿童团的歌声和迎送群众的口号声,欢歌笑语交织在一起。

在激越的气氛中,第四野战军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开来,步兵排着四路纵队阔步行进,骑兵队战马奔腾向前,汽车、坦克、装甲部队驶上桥头,铁流滚滚,朝南急驶,一辆辆大车载着满满的弹药接连从浮桥上通过,四匹骡马拖着炮车一排排接连不断踏上浮桥,特种部队簇拥向前。第四野战军50万大军从孙口黄河浮桥上浩浩荡荡,英姿勃发地过了十几天。他们踏过黄河,沿着通往进军江南、通往结束“几千年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来的帝国主义压迫”的征途,踏去,踏去!台前人民又一次完成了支援大军南下作战的历史任务。

第八节 设立兵站, 救护伤员

刘邓大军过河后,寿张县为支援解放战争,在支前指挥部的领导下,在县境内设有医院、兵站、食宿站。当时组织了两个食宿站,第一个由李景贤负责,设在第一区某村,第二食宿站由王芳瑞负责,设在祝口明堤村。食宿站的任务是照顾转送伤病员,招待抬担架的民工。

冀鲁豫军区医院设在祝口、莲花池一带。寿张县组织的担架队,将负伤的指战员从前线抬下来,经过食宿站,分送到冀鲁豫军区医院各点去疗养。

兵站设在黄河中心渡口孙口附近的刘桥、桥北张等村,每个兵站

下设招待、供应、总务三个股,工作人员平时 40 人,战勤繁忙时增加到 180 人。兵站的主要任务:一是护理伤员,在鲁西南战役中,负伤的战士很多,担架队从前线将伤员抢救抬回后,转送到医院和兵站护理。国民党政府的红头飞机整天在县境黄河北岸侦察扫射,轰炸封锁沿黄渡口。农民白天在地里干活它扫射,夜里暴露一点灯光它轰炸,我们的伤病员只得在白蜡行里、树底下、防空洞里治疗。全县招待伤病员最多时达千余名,抬担架的民工达 6 千余名。当时,负责看护伤病员的县妇委会干部——妇女队长王风兰时常带领区、乡妇女到兵站救护伤员。她们提出的口号是“招待伤员就是报答我们的恩人。”在全县数百人的看护员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报恩运动,每次伤员来到兵站时,大家都争先恐后地热情招待,送水送饭。有的战士伤势重,膳食不能自理,在兵站工作的妇女即用小勺伺喂,端屎端尿,洗血衣,上药;有的妇女用自身的乳汁抢救病危的伤员,出现了不少“红嫂”,表现了军民一家亲的鱼水深情。伤员们都感动地满眼热泪地说:“亲爹亲娘也不能照顾这么周到!”在 1947 年和 1949 年两年中,寿张县共招待伤病员约 6000 人次,出动民工 30000 多人次。仅刘桥兵站就接待护理和转送伤员 1200 余人。二是补充军需供应。各乡把部队所需的物资筹备齐后送到兵站,由兵站分配给支前运输队送往前线。三是接待往返的担架队,保障战勤人员的食宿。四是接待部队后勤机关中往返于前线和地方上的工作人员。

在解放战争中,台前人民在寿张县委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支援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华北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征战,支前活动持续 4

年之久，台前境内各兵站光荣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第九节 深入开展参军归队运动

1949年春，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寿张县根据冀鲁豫区党委的统一部署，掀起了参军归队（因各种原因从战场上回来的解放军士兵）的热潮。

1月31日，冀鲁豫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动员参军工作的指示》，对动员参军的方针、方法、要求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随后冀鲁豫九地委根据全区参军运动动态先后发出了1至3号《通报》，及时指导运动的发展。寿张县在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上，主要采取了以下作法：一是由结束土改和村级整党的工作组具体组织指导，无工作组的由上级另派工作组；二是深入动员，重点突破，带动一般，不大轰大干；三是在具体发动中，1、坚持从胜利形势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教育入手，克服“歇歇脚”的和平安逸思想及半途而废的思想。在全县召开干部大会，各区召开群众大会，同时还利用宣传队、盲人说书等形式，宣传革命战争的大好形势，明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艰巨任务，为参军归队打下良好的基础。2、检查落实优军工作和归队政策。各村普遍建立健全优军归队委员会，落实代耕工作，解决群众参军归队后的后顾之忧。对逃离者分清情况，区别对待，清理一切悬案和矛盾。3、坚持自愿和自报公议相结合，不强迫命令，不威胁，不摊派，精密计算兵源实力，公平合理分配任务。4、坚持村党员干部、积极分子自愿带

头。

由于思想发动充分,工作深入扎实,全县迅速掀起了参军归队的热潮,涌现出许多参军的动人事迹。全县有 300 名青年被批准参军,圆满完成了参军归队任务。

第十节 大力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寿张县的教育工作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开始了恢复和发展。1946 年 9 月,冀鲁豫建国学院由菏泽迁至台前境孙口毛河一带,不久迁往阳谷县境。秋,寿张县成立县剧团,配合政治中心工作,在农村巡回演出,进行宣传工作。冬,县委在陈楼召开活动积极分子大会,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大力向群众进行形势教育,积极支持反蒋自卫战争。12 月,《冀鲁豫日报》社、冀鲁豫第一中学分别迁至台前境王集村和刘奎斋村。

寿张县在土改、整党及战勤工作基本结束后,文化教育工作提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县委、县政府按照冀鲁豫行署先后发出的一系列关于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指示,认真纠正“左”的倾向,要求凡在土改与“三查”中,因家庭成分关系被清洗的教师或被错划为地富成份的教师,一律动员其复职,或经过训练分配其工作;凡被清洗的地富家庭出身的学生,一律动员其返校学习;任何机关或干部不准随便拉教师出勤或做其他妨碍教学工作的事情,在学校内不论家庭是何成份,一律平等对待,不得歧视等等。全县教育

工作又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寿张县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举办了为期半年的全县教师训练班，提高了教师的政治思想素质和教学水平。二是对校址的固定，教具图书的添置及卫生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三是增加教育投资，扩大教育规模，基本达到了小学普及，一个区都有一处或几处高小，县里有中等学校。四是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教育的同时，县委、政府还普遍利用举办民校、冬学和工人、市民补习班、夜校等形式，开展人民教育工作。为加强冬学运动的领导，县、区、村都成立了冬学委员会。冬学在课程的安排上有文化课、政治课、珠算和生产知识。冬学教员以小学教员为主，同时聘请本村有教学能力的人作为义务教员。文化课、珠算和生产知识由小学教员和聘请的义务教员担任，政治课由村干部担任。在教材上既有统一的冬学课本，又有根据形势任务自编的教材。在教法上灵活多样，有的把报纸上刊载的大好形势、胜利消息编成故事，有的用教歌方法教群众识字，有的把教材编成快板或小调。有的冬学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参加冬学教育的村占全县村数的32%，入学人数占全县人数的0.9%。参加冬学的人通过政治学习，懂得了划分阶级的基本原则，进一步了解了胜利的形势及生产支前的重要性，明确了个人的责任，提高了对生产支前的热忱。在文化学习方面，通过参加冬学，曾上过学但无阅读能力的人可读通俗读物，学会了记帐、写信、珠算，大多数学会了加减乘除；过去没上过学的，多者认字100多个，少者识字30多个，大多学会了珠算加减法。

寿张县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一样,进入了新的恢复发展时期。县政府健全了教育科,专门负责文化教育的组织领导工作。为配合形势任务,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动员人民参加解放区建设,支援自卫战争,寿张县建立了民众文化教育馆,开展图书报纸阅览、广播和举办黑板报、教唱革命歌曲等文化宣传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异常活跃。在广大农村,传统的民间艺术如高跷、竹马、龙灯、狮袍等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这些文化艺术活动在活跃农村生活、配合参军支前、土改、大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947年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文化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民间艺术进一步活跃。寿张县注重加强民间艺术工作的领导,1947年秋,组织全县民间艺术骨干人员,参加了冀鲁豫九专署在南峰县程庄开办的长达3个多月的民间艺人训练班。训练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有:时事政策、艺术理论、艺术实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等。训练班在教育民间艺人明确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觉悟和艺术水平的基础上,为了广泛发动民间艺术为群众服务,还印发了《〈告民间艺人书〉》。训练班结束后,寿张县成立了民间文艺宣传队,活跃在广大农村。宣传队下设坠子、山东琴书、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刻印、绘画、唢呐、洋片、魔术等组。农村剧团也迅速发展起来。另外,木刻、绘画等艺术形式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各种艺术形式在服务群众、服务党的中心任务的方针指引下,推陈出新,自编自演,改编创作演出了大量内容新、战斗性强、深受群众欢迎的文艺作品。在戏剧方面,移植和改编了《〈兄弟开荒〉》、《〈白毛

女》、《三打祝家庄》、《打渔杀家》、《贫女泪》；在曲艺方面，编演了《大反攻》、《李二发家》、《保卫家乡》、《大生产运动》、《土地法大纲》等；木刻、绘画摒弃了过去那些庙画、门神画，而代之以毛主席像、参军图、五谷丰登画、全家福、日历画等。这些文艺团体为进一步动员组织群众完成各项任务、加强各项事业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1948年9月，冀鲁豫区行署召开文化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了恢复发展文化工作的方针。寿张县组织培训了一大批新型的艺术人才，原有的文艺团体进行了整顿提高，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团体先后创立和发展起来，全县文化工作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十一节 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

1949年初，冀鲁豫区土地革命和整党任务已基本完成，淮海战役后繁重的战勤任务也基本结束，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寿张县的紧迫任务。为此，寿张县根据冀鲁豫行政公署关于“大力恢复农副业生产，争取3年内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指示，组织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

首先，全县各级党组织利用多种形式，采用多种措施和方法，广泛深入地宣传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提出“生产光荣、发家致富”的口号，解除群众怕“冒尖”、怕增加负担的顾虑，纠正干部中存在的“生

产不用领导”的自流思想，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建立健全各级生产机构，制定生产计划，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第一线，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建立生产互助组，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解决了畜力不足问题。对劳力较强的农户，组织其采取代耕代种代收计工的办法，帮助军烈属和孤寡老人解决种地的困难。为保证生产不误农时，对困难较大的农户拨发救济粮，发放低息或无息贷款，扶持其购买牲畜、农具和打井、开荒；对受灾较重的农户，通过募捐、捐物、捐农具和种子等方式协助其解决困难。号召农民消灭村头荒，开垦一切可耕地，扩大耕地面积。对部分干部、党员和民兵进行转思想弯子的教育（长期的战争环境，习惯重视抓武装斗争，轻视抓农业生产），把农村工作的重心移到发展生产上来，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大生产运动，保证农业获得较好收成。提倡养猪和繁殖牲畜，以解决牲畜和肥料的不足；提倡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实行科学种田。

在抓思想发动和各种具体措施的同时，全县各级党委、政府还狠抓了季节性的生产。针对春季旱象严重、许多农户断炊等严重情况，全县各级党委、政府认真组织打井点种，抗旱度荒。抽调一批干部分赴各村，组织抗旱生产。全县广大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千方百计改善水利条件，度过了灾荒，夺取了夏粮丰收。

进入7月份，县境普降喜雨，旱情解除。为了抓紧时机突击秋播，

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全民总动员,较好地完成了秋季作物的播种任务。随后,全县各级党委、政府又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进行了锄苗、积肥、灭虫、防涝等工作,从而为秋季大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1949年,寿张县在领导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商业,进一步贯彻人民政府制定的工商贸易、税收政策,加强了财政、金融和物价的管理工作,调整充实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人员。在贯彻工商业政策中注重了调查研究,对生产中的问题通过协商和调度加以解决,对倾向性的问题加强引导。在发展工商业中,还普遍对国营企业进行调整改组,统一了经营管理,改善了技术和设备条件。在各公、私营工商业中开展生产竞赛运动,各工厂、商店及个人普遍制订生产计划,互相挑战、应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和保护工商业政策的指导下,开展了工商登记和商标注册工作。在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形势下,除加强县税收机构外,县以下普遍建立税务所。为活跃市场,寿张县于夏季在城乡普遍设立集市交易所。另外,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寿张县供销社筹备处于1949年成立。随着工商业政策的调整和落实,工商业人员的积极性得到了较充分发挥,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产品种类和数量大幅度增加。同时,县委、县政府有计划地扶持倒闭或行将倒闭的商店、作坊、工厂,逐步安排失业人员就业,对从外地返回城镇的各类人员,通过调查登记,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妥善予以安置,有效地促进了城镇经济的顺利恢复和发展。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一套人民币(俗称旧

币)，次年在台前境内流通。1949年10月10日，黄河水猛涨，台前境东部报道了夹河白铺村互助拉耩伙种泥耩麦的消息。1949年8月28日，黄河枣包楼控导工程决口，全县被淹成灾。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民积极开展抗洪救灾和生产自救。

1947年，冀鲁豫分区第九禁烟分局在寿张县金斗营成立，即日发出通知，严厉禁烟。寿张县成立禁烟股，对贩毒户进行严厉打击，收缴其烟枪、烟灯、吗啡灯等，并明令严禁非法种植罂粟、海洛因等。

第十二节 台前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巨大贡献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台前人民，在解放战争中，在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自卫战争胜利”的口号激励下，同心同德，加强解放区建设，全力以赴支援自卫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全县先后掀起的3次大参军运动中，台前有7000余名翻身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转战大半个中国，其中有数百人壮烈牺牲。同时，台前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识大体，顾大局，竭尽全力地肩负起人民解放战争赋予的艰巨而光荣的战勤任务。从1946年陇海战役开始，先后抢运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渡河南下，多次组织担架队、轮战团随军出征，配合主力作战。3年中，寿张县支前民工民兵先后参加了20余次战役、战斗。从1948年开始到1948年底，据冀鲁豫九地委的调查统计，寿张县支差情况如下：

一. 前方战勤支差:

担架 6008 副, 民夫 35656 人, 工日 403916 个; 民兵 12403 人, 工日 66852 个; 民工 14463 人, 工日 119586 个; 大车 1529 辆, 车夫 4471 人, 工日 25375 个, 牲畜 6938 头(匹); 小车 528 辆, 车夫 1056 人, 工日 15576 个。

二. 后方支差:

担架 4150 副, 民夫 24701 人, 工日 127024 个; 民兵 3627 人, 工日 56564 个; 民工 12656 人, 工日 60438 个; 大车 12111 辆, 车夫 36516 人, 工日 167883 个, 牲畜 48678 头(匹); 小车 3198 辆, 车夫 6396 人, 工日 22863 个。

三. 地方支差:

担架 1305 副, 民夫 7804 人, 工日 29317 个; 民兵 7433 人, 工日 53750 个; 民工 14498 人, 工日 84384 个; 大车 21885 辆, 车夫 87462 人, 工日 104809 个, 牲畜 86501 头(匹); 小车 8083 辆, 车夫 10365 人; 修码头 11522 人, 工日 38322 个; 拉船 27002 人, 工日 63902 个; 修路 16574 人, 工日 30504 个; 架桥 3553 人, 工日 7720 个。

四. 村内勤务:

碾米 132846 人次, 工日 153104 个, 牲畜 129511 头(匹); 磨面 74767 人次, 工日 109309 个, 牲畜 7134 头(匹); 缝衣做鞋 30916 人, 工日 97437 个; 带路 52170 次, 送信 79094 人次。

除以上支差, 还有站岗放哨, 医院、兵站救护伤员零差, 武装保护仓库, 为军烈属代耕者等不计其数。台前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台前人民的革命史充分证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组织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打赢战争。正如刘伯承元帅所说：“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源泉，如果不是人民战争，许多奇迹是不可思议的”。

孙口乡前满村部分支前情况统计表

| 时间 | 支前种类及数量 | 支援部队及战役 |
|----------|----------------------------------|------------------------------------|
| 1945年5月 | 出动担架6副、民夫36人 | 军分区部队解放东平 |
| 1945年8月 | 出动大车5辆、民夫10人 | 军分区七团解放阳谷 |
| 1947年2月 | 出动大车2辆、民夫4人 | 华东野战军解放卫辉，历时1个月 |
| 1947年4月 | 输送子弟兵17人 | 刘奎斋大扩军入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一纵独立旅 |
| 1947年6月 | 出动担架3副、民夫18人 | 冀鲁豫军区部队鹅鸭厂战斗 |
| 1947年7月 | 出动担架6副、民夫36人 | 冀鲁豫军区部队万福河战斗 |
| 1947年7月 | 出动担架5副、民夫30人 | 晋冀鲁豫野战军解放郓城 |
| 1947年9月 | 做军鞋55双 | 农会长李云西带一区民兵连(挑夫)120人奔赴大别山运送全区制做的军鞋 |
| 1948年8月 | 出动大车2辆、4人、牲畜4头 | 支援华野部队解放济南 |
| 1948年9月 | 出动挑夫18人 | 随华野部队运送炮弹、炸药 |
| 1948年12月 | 18~25岁劳力全部出动，担架10副、民夫62人、粗粮面700斤 | 淮海战役，历时40余天 |

注：前满村时有55户，410人。

打渔陈乡梁集村部分支前情况统计表

| 时间 | 名称 | 数量 | 起点 | 终点 | 备考 |
|-------------|----|-----------|-------|-------|-------|
| 1945年~1946年 | 军鞋 | 250双 | 梁集 | 部队 | |
| 1946年2月 | 大车 | 2辆(2人牛2头) | 昆山兵工厂 | 堂邑祁寨 | |
| 1946年6月 | 担架 | 6副、12人 | 郓城附近 | 黄河南岸 | |
| 1946年7月 | 担架 | 2副、12人 | 郓城 | 被敌人追散 | 浮河而还 |
| 1946年9月 | 担架 | 2副、12人 | 巨野林官屯 | 郓城 | |
| 1946年秋 | 大车 | 2副、4人 | 梁集 | 前防部队 | 送机枪 |
| 1946年10月 | 担架 | 2副、12人 | 郓城郭官屯 | 巨野西南 | |
| 1946年冬 | 挑夫 | 10人 | 梁集 | 前防 | 送军毯 |
| 1947年2月 | 担架 | 4副、24人 | 卫辉府 | 清丰一带 | 死1人 |
| 1947年4月 | 参军 | 10人 | 张秋县四区 | 新八团 | 牺牲2人 |
| 1947年6月 | 大车 | 4辆(4人4畜) | 影唐 | 范县附近 | 送炮车炮弹 |

| | | | | | |
|-------------|-----|---------|-------|--------|-------|
| 1947年7月 | 担架 | 4副、24人 | 郓城黄垓 | 阳谷县罗楼 | |
| 1947年8月 | 担架 | 10副、60人 | 郓城北 | 范县北 | |
| 1947年8月 | 担架 | 3副、18人 | 金县 | 黄河北 | |
| 1947年9月 | 担架 | 5副、30人 | 范县李翠娥 | 阳谷东 | |
| 1947年10月 | 挑夫 | 30人 | 阳谷郎集 | 鄄城野马集 | |
| 1947年 | 挑夫 | 6人 | | 郓城以北 | 送军鞋 |
| 1948年秋 | 民夫 | 20人 | 梁集 | 黄河南不详 | 送炮弹 |
| 1946年~1948年 | 面 | 5500斤 | | 过往部队 | |
| 1945年~1948年 | 联防队 | 25人 | 守河岸 | 到河南带俘虏 | 浮河死2人 |
| 1945年~1948年 | 草料 | 无数 | | | |

注：梁集村时有600人。

1949年8月,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中共中央对华北行政区划作了新的调整,决定撤销冀鲁豫、冀南等区,并以冀鲁豫为主建立了平原省。20日,平原省在新乡宣布成立,共辖湖西、菏泽、聊城、濮阳、新乡、安阳6个专区。寿张县隶属平原省(省会在新乡)聊城地区领导。至此,寿张县完成了民主革命阶段的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的伟大时代。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阶段的开始。从此,英雄的台前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附:

(以下在《中国共产党台前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印刷出版时再打印)

1、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寿张县组织分布示意图

- 2、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寿张县、张秋县组织隶属关系序列表
- 3、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寿张县组织机构设置示意图
- 4、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张秋县组织机构设置示意图

〔JZ〕〔HT4H〕中共寿张县委书记、副书记名表（1939年7月至

1949年10月）〔HJ0mm〕 〔HJ〕〔HT9.75SS〕

〔BG(BTXDF)〕

〔BHDFG29, WK22, SK20W〕

〔ZB(〕〔BHDG2, WK4, K4, K14W〕

姓 名 〔 〕 职 务 〔 〕 任 职 时 间

〔BHDG2, WK4, K4, K14ZQ2W〕

徐 坤 〔 〕 书 记 〔 〕 1939 7~1940 2 〔BH〕

季 丕 显 〔 〕 书 记 〔 〕 1940 2~1940 6 〔BH〕

杨 岗 〔 〕 书 记 〔 〕 1940 6~1941 5

〔BHDG4, WK4, K4, K14ZQ2W〕〔HJ1mm〕

陈 亚 颀 〔 〕 副 书 记 〔 〕 1940 秋~1942 9 期间 1941年5月至1941年6月任代书记〔HJ〕

〔BHDG5, WK4, K18W〕

高 黎 光 〔 〕 〔ZB(〕〔BHDG3, K4, K14ZQ2W〕

书 记 〔 〕 1941 6~1943 1 1945 3~1946 5 〔BHDG2〕

副 书 记 〔 〕 1943 秋~1945 3 〔ZB)〕

〔BHDG2, WK4, K4, K14ZQ2W〕

李 仲 勋 〔 〕 书 记 〔 〕 1943 10~1945 3 〔BH〕

邵 汝 群 〔 〕 副 书 记 〔 〕 1942 10~1944 春 〔BH〕

刘 汉 勋 〔 〕 副 书 记 〔 〕 1943 秋~1943 冬 〔BHDG4〕

杨 村 夫 (赵恩波) 〔 〕 书 记 〔 〕 1946 5~1948 3

〔 〕 〔BHDG2〕

何 进 〔 〕 副 书 记 〔 〕 1947 6~1949 1 〔ZB)〕〔 〕

〔ZB(〕〔BHDG2, WK4, K4*2, K11*2W〕

姓 名 〔 〕 职 务 〔 〕 任 职 时 间

〔BHDG2, WK4, K4*2, K11*2ZQ1W〕

籍 献 西 〔 〕 书 记 〔 〕 1948 3~1952 春 〔BH〕

〔LM〕〔KH-*2〕 〔HT4K〕附 〔JZ〕中共张秋县委书记、副书记（1941

年 9 月至 1947 年 6 月) 名表 [HJ0mm] [HJ

] [HT9.75K]
[[BG[
[[BHDFG8, WK21, SK21W]
[[ZB[[BHDG2, WK4, K4, K13W]
姓 名 [] 职 务 [] 任 职 时 间
[[BHDG2, WK4, K4, K13ZQ3W]
王化先 [] 书 记 [] 1941 9~1945 8
[[BHDG4, WK4, K17W]
雷 震 [] [ZB[[BHDG2, K4, K17ZQ3W]
副书记 [] 1945 6~1946 12 [[BH]
书 记 [] 1946 12~1947 6 [[ZB)] [ZB)] []
[[ZB[[BHDG2, WK4, K4, K13W]

[LM] [HT4'H] [JZ] 寿张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 (1939 年 8 月至

1949 年 10 月) 名表 [HT9.75SS]

[[BG(BTXDF)
[[BHDFG3, WK10, K5. 2, K11, K11W]
机关名称 [] 职 务 [] 姓 名 [] 任 职 时 间 [] 备 注
[[BHDG7*2, WK10, K5, K27W]
寿张县抗日 民主政府 [] 县 长 []
[[ZB[[BHDG2*2, K5, K11ZQ, K11ZQW]
杨朴民 [] 1939 8~1940 10 [[BH]
郭少川 [] 1940 10~1945 5 [[BH]
张云峰 [] 1945 5~1946 夏 [[ZB)]
[[BHDG12, WK10, K32W]
寿张县民主政府 []
[[ZB[[BHDG2, K5. 2, K11ZQ, K11W]
县 长 [] 张云峰 [] 1946 夏~1947 6 [[BH]
代县长 [] 王 克 [] 1947 6~1947 7
[[BHDG4, K5, K27W]
县 长 []
[[ZB[[BHDG2, K5, K11ZQ, K11W]
何 进 [] 1947 7~1948 3 [[BH]
谢惠玉 [] 1948 3~1949 9 [[ZB)]
[[BHDG4, K5, K27W]
副县长 []

〔ZB〕〔BHDG2, K5, K11ZQ, K11W〕
谢惠玉〔〕1947 7~1948 2〔BH〕
张建寅〔〕1948 3~1949 9〔ZB〕〔ZB〕
〔BHDG8, WK10, K32W〕
寿张县人民政府〔〕
〔ZB〕〔BHDG4, K5, K27W〕
县 长〔〕
〔ZB〕〔BHDG2, K5, K11ZQ, K11W〕
谢惠玉〔〕1949 10~1952 7〔BH〕
司振东〔〕1952 7~1955 12〔ZB〕
〔BHDG4, K5, K27W〕
副县长〔〕
〔ZB〕〔BHDG2, K5, K11ZQ, K11W〕
张建寅〔〕1949 10~1953 3〔BH〕

〔HT4"K〕附 〔JZ〕张秋县人民政府县长（1941年6月至1947年

6月）名表

〔HT9.75K〕〔BG〕
〔BHDG2, WK10*2, K10*2, K11, K10W〕
机 关 名 称〔〕姓 名〔〕任 职 时 间〔〕备 注
〔BHDG6, WK10*2, K31*2W〕
张秋县抗日 民主政府〔〕
〔ZB〕〔BHDG2, K10*2, K11ZQ1, K10W〕
夏仲远〔〕1941 6~1942年春〔BH〕
柏洁民〔〕1942年春~1943 6〔BH〕
李克东〔〕1943 6~1945 8〔ZB〕
〔BHDG4, WK10*2, K31*2W〕
张秋县民主政府〔〕
〔ZB〕〔BHDG2, K10*2, K11ZQ1, K10W〕
袁 舒〔〕1945 8~1946 5〔BH〕
王 克〔〕1946 5~1947 6〔ZB〕〔BG〕F〕

后 记

编写地方党史正本，是中央和省委的要求，也是党史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实现党史资政育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台前县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冀鲁豫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揭示台前作为革命老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干部提供一部较为生动实际的历史教材，为深入开展群众性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服务，为建设和谐台前服务，台前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与台前县委党史研究室一套机构）在中共台前县委、台前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在中共濮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下，于2004年3月底开始正式组织编写本书。

此前，编者于2003年，就该书的编写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由主编拟定编写计划和本书的框架以及编写要求，副主编着手试写初稿，至2005年底，完成初稿编写任务。随后，编者广泛征求老干部、老同志、当事人和专家学者的意见。最后，由主编对初稿进行系统的修改、充实和完善，数易其稿，并送市委党史研究室终审定稿。

本书编写过程中，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赵勤山和第一研究科科

长胡聚坤给与了大力支持，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县档案局为本书出版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图片，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书中记载的历史时限内，台前县境区划多变，情况复杂，加之台前建县时，县档案馆一无所存有关革命历史资料，尽管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历经千辛万苦，费时 20 余年，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仍存在许多有关历史资料缺漏等问题，因而给编者在记述上造成一定困难，致使有些地方或方面的内容仍显得很薄弱，更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经验不足，书中错讹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9 年 3 月 26 日